

莫言《白棉花》版本考辨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作为“《红高粱》的姊妹篇”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早公开发表在《花城》1991年第5期,是为“初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为“初版本”。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明显的文本差异,以至于后来“花开两朵”——后来的“转载本”属于“初刊本”序列;200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2004年当代世界出版社“莫言文集”第10卷《白棉花》等则是“初版本”的延续。而2004年民族出版社“名著彩绘·莫言精品系列”的《白棉花》,虽以“初版本”为“底本”,但已经过全面修改,可称之为“改定本”,202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一方面,我们力倡作家的版本意识,即尽可能保持作品文本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作品的一次次修改、打磨,又确实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就结果而言,当代文学的作品文本与版本,往往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而读者也是版本“最优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关键词:莫言;《白棉花》;初刊本;改定本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01-07

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无疑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而他的中篇小说创作更独具艺术魅力。1986年3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发表,震动了整个文坛;此前,该刊1985年第1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爆炸》,让编辑朱伟看到了作者叙事中那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更早刊发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的《透明的红萝卜》,朱伟说,他“至今仍认为,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中篇小说”^[1]。

但从版本学的视角来看,中篇小说《白棉花》则更具典型意义。《白棉花》首先公开发表在《花城》杂志1991年第5期(出版时间:9月20日),即“初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为“初版本”。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文本差异。之后,两个版本各有延续。2002年,在“初版本”的基础上又有经过重要修改的“改定本”,“改定

本”则又有新的版本延续。对该文本三十年间的延续、变迁以及多种版本形态的不断出现加以考察,将同时具备文学与出版学的双重意义。

一、“《红高粱》的姊妹篇”

莫言的中篇小说《白棉花》,虽然被视为“《红高粱》的姊妹篇”,而且“没有人这样写过棉花”,但它所获得的声誉和关注度,显然与《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这部“为张艺谋而写”的作品却最终未被这位大导演搬上银幕,而在台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后也未达到预期的成功。

如前所述,这部似乎“命运欠佳”的中篇小说最早公开发表在《花城》1991年第5期,该期《中篇小说》栏目还刊发了王朔的《谁比谁傻多少》。顺便提一句:王朔在此期间还有另外一部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发表在《收获》1991年第6期,后来改编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由女明星宁静主演;而在台湾

收稿日期:2024-05-10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编辑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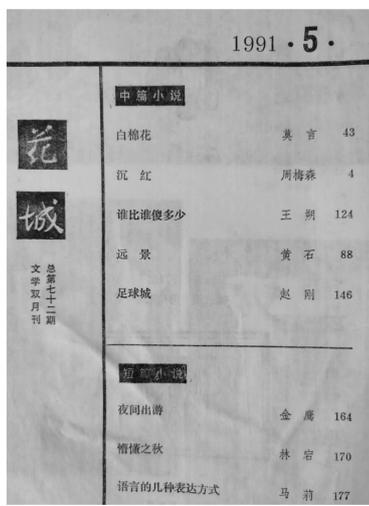


图1 《白棉花》初刊本封面及目录

上映的电影《白棉花》(导演:李幼乔)也是由宁静担任女主角。

主人公方碧玉是个充满传奇的姑娘,她从小没娘,跟着爹习武,一身功夫,走起路来像全身安了弹簧,不但长相俏美,而且“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同俗人的气质”。那年“我”17岁,她22岁,“我”和她一起去县棉花加工厂报到,“我”在暗恋着她,她却与支书的儿子订过婚。而到了棉花加工厂之后,她却移情别恋,对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青岛知青李志高。

据《莫言文学年谱》记载,莫言在故乡高密县的一家县棉花加工厂做“农民合同工”期间,因为字写得漂亮,负责给厂里出黑板报;因为看的书多,文笔好,口才好,他还当上了工人代表,在全厂大会上发言,被公认为是厂里最有才华的临时工;也因此,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当上了职工夜校的老师,负责教语文。“在厂里工作的,还有来自各地的青年,有干部子弟,有青岛等大城市的知青。”^{[2]6}

“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可以想见当年的青年作家莫言创作热情如此饱满。对于这部《白棉花》,莫言当年的那段生活与他的这部小说可以看作“互文”的关系。

小说里的青岛知青,除上面提到的李志高之外,还有一位炊事班长大江田,是公认的厂里“第一美男”。

小说中写到的“干部子弟”包括:扞样员赵一萍(绰号“一撮毛”),父亲是“县水利局的头头”;那位被人叫作“电流”的姑娘,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孙红花,公社团委书记的妹妹;门卫冯结巴家庭贫寒,但他舅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所以他“干了轻松差事”;那个黑瘦脸庞叫宋金鱼的姑娘,“也是个书记的女儿或儿媳之类的角色”……

莫言在棉花加工厂期间,学过棉花检验,当过司

磅员,干过杂活儿。小说中的“我”(马成功),靠着叔叔的关系当了司磅员,后来因为在李志高、方碧玉中间“通风报信”,被调去干杂活儿(也是重活儿)——抬大篓子,他的搭档正是那位青岛知青李志高。

在进厂之前,作者说自己在村里跟棉花打了好多年交道,“对于棉花,我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的红高粱是梦幻中的东西,白棉花却是实实在在的”^[3]。能够看得出,小说的第一部分《楔子: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就是对这段生活的一个“交代”。

那么,方碧玉是否有生活原型?到目前为止笔者仍未看到作者有过清晰的表述。倒是《莫言文学年谱》中提到他写“武侠”的一个细节:这年(1990)暑假,“在高密的家里,他种了一院子的葵花,每日在葵花丛里转来转去,困惑着、思索着。这一时期,他用戏谑的手法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改写成了一篇四万五千字的武侠小说,旧人物阿庆嫂、郭建光都成了身怀绝技、会使暗器的武林高手。他将小说寄给《花城》,但遭到退稿,他便将这篇‘不合时宜’的手稿烧掉了”^{[2]37-38}。

二、初刊本与初版本:文本辨异

1991年10月,莫言小说集《白棉花》作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之一种,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集收录的莫言作品包括: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原载《花城》1990年第1期,并获第五届“花城文学奖”)、《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原载《人民文学》1989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你的行为使我们感到恐惧》),短篇小说《人与兽》(原载《山野》1991年第4期)、《遥远的亲人》(原载《时代文学》1989年第4期)、《爱情故事》(原载《作家》

1989年第6期),排在最后的是《白棉花》。该版本我们称之为“初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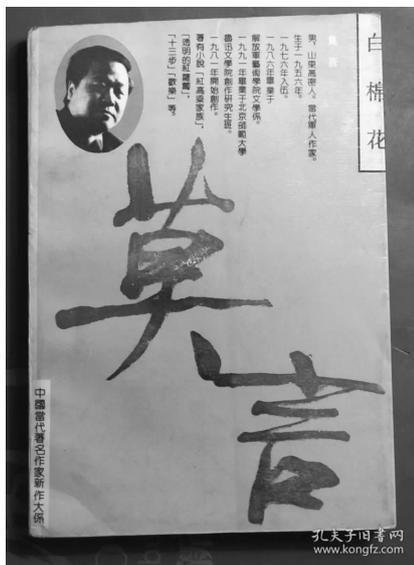


图2 《白棉花》初版本

与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张一弓《流泪的红蜡烛》等作品初刊本、初版本保持着“高度一致”不同,《白棉花》的初刊本与初版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小说“楔子”第四自然段为例——

初刊本:

农历三月中旬,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冰融化……

初版本:

农历三月中旬,由于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水开冻……

更显眼的是,《楔子》中涉及“郭老肚子”的下面这部分将近三百字的内容,只见于初版本而不见于初刊本——

有一天,郭老肚子让我去找保管员领二两麻给牛套上搓一根鞅绳,我便到仓库里找。到了那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嫂子,把你那家什给我用一下。”

“你的家什呢?”

“我的家什满了。”

“你那个家什就那么小?”

“你那个家什大!”

“保管员进去正好!”

于是便哄堂哈哈笑。

其他如:硬、软、粗、细、长、短、上来、下去等等,都变成隐语。

据说有一李姓的中年女人,疯得厉害,男人们也都说她性大。有一次她说疯话说了劲,坐在棉花籽上,把一条裤子都尿湿

了。几年后,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发现,一群大姑娘聚了堆,疯起来不比娘们差,只不过稍微含蓄,不那么赤裸裸罢了。

仍以《楔子》这一节为例,涉及“我”对女主人公方碧玉的感受,增加的文字也较多。如“我经常回忆起二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数千亩棉田里与方碧玉她们给棉花喷药灭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浪漫的岁月呵,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后面,又增加了颇具抒情色彩的如下文字:

你额头光光,好像青天没云彩;双眉弯弯,好像新月挂西天;腰儿纤纤,如同柳枝风中颤;肚脐圆圆,宛若一枚金制钱——这是淫秽小调《十八摸》中的词儿,依次往下,渐入流氓境界。

再如,在“农村姑娘以高乳为丑,为羞,往往胸脯一见长时,便用布条儿紧紧束住,束得平平的,像块高地”之后,初版本又进一步“发挥”:

一般农村姑娘的胸脯是高地,方碧玉那家伙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啦。

上面谈到的是改与增的情况。

初版本与初刊本相比,“删”的情况也很普遍。比如,第二节关于毛红灯这个人物——

他原名毛志东,改成毛红灯。他改名时全中国鼻子眼里都唱《红灯记》。他这个名字算是改出了高水平。

但是,初刊本却将这段颇有趣味的“人物背景”删去了。

其他如第十一章删去了二百余字内容:“(皮辊机)吞噬着我和我的李大哥,连骨头渣子也不吐出来。而方碧玉她们,现在已不是我们的同类而是皮辊轧花机的帮凶。不,她们是这些吃人巨兽的爪子,就是她们把我和李大哥送到了巨兽嘴中。”“她们是活着的机器死去的人,她们是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间静止不动,地球停止旋转……”

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方言词的改动。“大嫚”是一个地方色彩鲜明的方言词,在《白棉花》初刊本中多次出现。如:第三章孙禾斗故意对老蔡的老婆说“老蔡天天搂着大嫚困觉”;第八章,“厂长说这个大嫚(指方碧玉)真不是盏省油的灯”;第二十四章,郭麻子对李志高说:“你要大嫚不要紧,别误了我的活呀!”“大嫚”指年轻姑娘、女士,在高密、诸城一带更被直接称呼为“嫚”;据称这个词源于德语 damen。在青岛,有很多方言与德语有关,比如“古力盖”就是“井盖”的意思。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嫚”在山东方言中很早就有。2006年,山东文博会的“吉祥娃”

被称为“山东大嫚”。

但是,很遗憾在初版本中均被改为“大妮”——后来的“改定本”中,又被统一改回“大嫚”。

还有关于字、词的细部改动。比如“(把牛蹄印)抹平”,初版本改为“搂平”;“绣毯”在初版本中改为“绣毡”;“把一泡热尿泄到牛的鼻孔里”,初版本将“泄”改为“滋”;较为典型的是“像”和“象”的处理:初刊本一律用“像(……一样)”,初版本统一用“象”。

这里要交代一下背景,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像”不再作为“象”的繁体字处理,据此规定,《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3版)做相应修订。在此期间,各出版单位(期刊、出版社)采取的编校标准并不完全统一。

最后我们对两个版本的先后顺序进行具体考察:就标注的时间来看,“初版本”比“初刊本”晚了一个月,但众所周知,从出版专业角度而言,图书出版周期一般要远比在刊物上发表长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推定这两个版本于作者而言,是同一时段的一文本(那个年代复印机已普遍使用,像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完稿后,作者就复印了不止一份)。但最终读者所看到的,却是差异明显的两个版本,并进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

三、转载本、文集本及其他

《白棉花》被《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1期转载,这个“转载本”是忠实于“初刊本”的(指小说正文部分),甚至保留了原刊所配的插图(作者:黄穗中)。要说“副文本”的增加,一是配发了作者的一篇“创作谈”《还是闲言碎语》(前文中已有引述),二是增加了“作者简介”。

先说“创作谈”。为什么标题叫《还是闲言碎语》呢?因为这部小说的开头原为《楔子: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此次转载被删去了)。该文讲:“去年(按:应为1990)年底”,久违的张艺谋找到他,想让他把看中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莫言看后“感到很难改出什么新意来”。张艺谋又让他想想看,有没有“适合在电影里表现的、既好看又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他谈到了当代的和古代战争,还有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然后话题转到家乡那一望无际的棉田,“每年的秋季,农民排着长队交售棉花,棉花加工厂里白棉如山,一片洁白里,活动着一些穿红穿绿的、为了挣点钱托亲告友进了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的姑娘。在洁白的棉花垛里有爱情悲剧、有

死亡事故、有打架斗殴、有勾心斗角。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前来加工棉花的农村姑娘其实被棉花加工了”^[3]。这也是小说《白棉花》的基调和故事背景。

当初,“张艺谋当即表示‘有意思’,让我赶快写。我说我要先写成中篇小说给他看,如果好,再改成本子,他很赞成”^[3]。另据莫言自称,写方碧玉这个人物,他一直没能摆脱巩俐的影子,甚至说为其量身定做。确实,当我们读到《白棉花》中方碧玉与李志高在巨大的棉花垛里为情痴狂的大段描写,总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红高粱》中“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至于最终张艺谋并未将其搬上银幕,那是后话。

再说“作者简介”。让我们回到文学的历史场景,那时莫言虽因《红高粱》(主要是电影)已红遍全国,但他还远不是后来获得诺奖之后的顶级作家,而且该刊也是从“自身立场”来介绍莫言的: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6年出生,祖籍山东高密。1976年入伍,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有《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红高粱》获《中篇小说选刊》1986—1987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为解放军某部创作干部。^[3]

2004年1月,十二卷本“莫言文集”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第10卷为中篇小说卷《白棉花》,收入《白棉花》《爆炸》《野种》《红耳朵》《怀抱鲜花的女人》《金发婴儿》《梦境与杂种》《模式与原型》《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球状闪电》《野骡子》11部中篇,是为“文集本”。该版本与华艺出版社的“初刊本”为同一版本,但请注意:彼时《白棉花》虽作为集名但排在最后一篇,而此次不但作为文集名,还被排在了第一篇。

但是,2002年1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收录的《白棉花》等三部中篇,像“转载本”一样,与“初刊本”是同一版本系统。另外两部作品是:《幸福时光好幽默》(原名《师傅越来越幽默》)和《红高粱》。

四、“改定本”的增、删、改

2004年4月,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莫言精品》,包括《白棉花》《红蝗》《筑路》《欢乐》《牛》《战友重逢》六部中篇小说单行本。这里只说《白棉花》,其版本特点一是增加了十几幅彩色插图(插

图:刘毅)——是谓“彩绘名著”,二是在卷首增加的广告词:

《红高粱》的姊妹篇——没有人这样写过棉花。

一部农村走向工业化的血泪史诗。^[4]

但上述这些都是属于“副文本”范畴的。就正文本来来看,作者亦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甚至重写。我们仍可以从增、删、改三个方面来说明。

先说增。

《白棉花》的初版本开头第一自然段是这样的: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上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

该版本则增加了:“知道炸药吗?就是董存瑞举着炸碉堡那种东西,那东西里有一种重要的配料,就是从棉花里边提炼出来的。”

第二自然段增加更多。初刊本、初版本原为: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改定本则将这一句全面铺陈开来:

……说有一年朝鲜领导人跟中国要棉花,周总理给高密县长打了一个电话,说高密县,你们弄点棉花支援一下朝鲜吧。高密县就把全县的棉花集中起来,往朝鲜运。刚运去一半,那边就说,够了够了,不用运了,再多就没地方放了。周总理很高兴,说高密县真是好样的。全县人民至今还为此事感到骄傲。

再说删。

第三章,删去了初版本“‘铁锤子’是‘业务组’组长,屁虱子大的官”,该章最后一段还删去了“棉花加工厂有意思的人和事很多,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说清楚,让我们在下面诸节里再谈”。

第十二章,“我”与方碧玉搭乘本村一个同学开的拖拉机回家,“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旗,显得诡异而神秘”。改定本删去了初刊本“像农家的炕席那般大的”“旗上绣着星星、月亮、太阳、白虎、青龙等图案”等文字。

第十八章,“我们曾在一起议论,说领导真是瞎了眼”,改定本删去了“曾在一起议论”。

总的来说,纯粹删去的内容远比“改写”要少得

多。

最后说改。

《白棉花》初刊本第八章第一段,原为:

打架事件后,方碧玉成了众人注意的中心。亲眼目睹了打架过程的人,在向别人转述时,都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把方碧玉描绘成了一个侠女十三妹一样的人物。改写后:

打架事件后,方碧玉成了公众人物。亲眼目睹了打架过程的人,在向别人转述时,都毫不吝啬地添油加醋,把方碧玉几乎描绘成了侠女十三妹。

初版本第二章的结尾:

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她的呼吸声抚摸着我的面颊。

再看改定本:

我知道,那是方碧玉在展开她的被褥。虽然隔着一堵冰冷的墙,但我能感到她的呼吸正在抚摸着我的面颊。

类似的改动,还有第三章的第一自然段结尾:“幸好,方碧玉就在我的身边。”改写后为:

幸好,方碧玉就在我的身边,隔着墙壁,我也能感受到她的温度。

与初刊本相比,初版本有多处对话,由直接引语变成了间接引语。而改写本与初刊本相比,许多段落重新分段后,层次更加分明,也更利于读者阅读,如第八章的一段,初版本为: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电流”大声说:“与我们干部女儿没有关系,我们有专用器材抢险救灾。”众人龇牙咧嘴怪笑。“防洪排涝!”一个男工说。“电流”说是农村来的女工干的,让我们跟着受牵连。方碧玉说:“你有什么证据?是哪个农村来的女工干的?休要一网打尽满河鱼。另外厂长说的也不对,男工碰破皮肉、走火流鼻血不也能用皮棉擦吗?”

再看改写后:

……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电流”大声说:

“与我们干部女儿没有关系,我们有专用器材抢险救灾。”

众人龇牙咧嘴怪笑。

“防洪排涝!”一个男工说。

“电流”说:“是农村来的女工干的,让我们跟着受牵连。”

方碧玉站起来,冷冷地说:

“你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是哪个农村来的女工干的?休要一网打尽满河鱼。另外厂长说的也不对,男工碰破皮肉、走火流鼻血不也能用皮棉擦吗?”

经过重新分段——当然也有少量的文字改动,显然实现了文本更优。



而这个改定本显然是以初版本(而不是初刊本)为“底本”的。例证之一就是前述“郭老肚子”那段近三百字的文字,几乎与初版本完全一致(也就“其它”“其他”之类的差别),但该部分内容恰恰不见于初刊本。还有,202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在此不再论述。



图3 《白棉花》改定本

五、结语：“改”与“不改”

一般而言,作者修改的过程,也是作品文本精益求精的过程。事实上,作家都是在一直寻找最恰切的表达。在“郭老肚子”那段内容前面有一段文字,我们来看不同版本的表达——

初刊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男人和女人展开,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初版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改定本:

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那点事物,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其他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改动,也能体现出这种“精益求精”。比如第三章,“初刊本“泡沫灭火器”,改定本为“泡沫灭火器”;第十七章,“奖给我们每人

五元人民币”,改定本把“五元”改为“十元”;等等。

但也不排除修改后反而更逊色之处。前述初版本通篇将“大嫚”改为“大妮”即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因为作者的亲身经历,作品中“抬大篓子”的描述极其生动,给人印象深刻。第九章,“那种大篓子用竹片编成,长方形,宽约一米半,长约三米,高约一百二十厘米……”(初版本“高约一米二十厘米”。这里的“高约一百二十厘米”,也是修改并不到位的一例(宜表述为“高约一米二”)。

最后要说的是小说结构方式的改动。这种改动可能出于作者的修改,也可能出自编辑之手:

该作品前有“楔子”,后有“尾声”;正文部分共34章:初刊本采用阿拉伯数字:1、2、3……;初版本使用汉字:一、二、三……;改定本则改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发表在《风筝都》的“早期本”,则是把“楔子”作为“第一章”,从第二章起,章下再分1、2、3……但基本上与后来的各章内容相对应。

此前,《白棉花》还曾“不公开”发表在山东潍坊《风筝都》杂志上,1991年第1期、第2期连载,时间为1991年4月、6月。这是一份内部发行的刊物(鲁新出报刊字第201号),而这个版本也许是最接近“创作原生态”的版本。因将另文,此不赘述。



图4 《白棉花》首发本封面及内文

就结果而言,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也许往往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不过,即便我们对《白棉花》的不同版本加以最详尽的考察,即便对多方当事人(作家、文学期刊编辑、图书编辑、责校等)再进行“复盘”式的访谈,我们也难以回到文学现场、回到作品的原生态中。但我们始终坚信,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淘洗会愈加闪出自己的光彩,而就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来看,经过一代代读者的“层累”和选择,也往往会有一个文本趋向“最优化”的过程,或者是经过不同年代、不同阶层的读者选择,会最终形成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

参考文献:

- [1] 陈华积. 他用灵性激活历史, 弘扬民族创作[N]. 光明日报, 2019-09-27(14).
- [2] 李桂玲. 莫言文学年谱[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3] 莫言. 还是闲言碎语[J]. 中篇小说选刊, 1992(1): 192.
- [4] 莫言. 莫言精品: 白棉花[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封面.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nalysis on the Version of Mo Yan's *White Cotton*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52, China)

Abstract: As the sister piece of *Red Sorghum*, the novel *White Cotton*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5th issue of *Huacheng* in 1991 as the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included in the *White Cotton*,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of the same name published by Huayi Publishing House in October 1991, as the “original edition”. These two versions are close in time, but are obvious different in text. So later “two flowers blossom”——the later “reprinted version” belongs to the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sequence; while the “original edition” was later collected in *Happy Times Good Humor* published by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in 2002 and Mo Yan Collected Works volume 10 published by Contemporary World Publishing House in 2004. In 2004, the *White Cotton* of the *Masterpiece Painting · Mo Yan Fine series* of the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edition” but is modified comprehensively, so it can be called “modified version”. In May 2020, the *White Cotton* (Mo Yan novel fine series) published by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dopted this version. On the one hand, we advocate the writer's version consciousness, that is, to keep the text of the work as stable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vision and polishing of the work over and over again is indeed a process of excellence. As a result, the text and vers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often jointly completed by writers and editors, and readers are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of the version.

Key words: Mo Yan; *White Cotton*;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modified version

“行人”杜牧的乡愁情事

——以《旅宿》《清明》为例

黄理兵

(伊犁师范大学 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 新疆 伊犁 835000;
北京语言大学 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 北京 100083)

摘要:唐代诗人杜牧在《旅宿》和《清明》这两首诗里,书写了他作为“行人”的乡愁,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前人的解说不尽如意,值得我们来重新细读。《旅宿》是诗人杜牧从夜间投宿到清晨离店这个时间段内的所见所思,尾联所写并非记忆中的家乡景致,而是离店后路上所见景象。《清明》尽管也有令人不满意之处,却有明白如话、朗朗上口、内容丰富、画面感强、感情动人等优点,不愧为古代诗歌中的优秀篇章。

关键词:杜牧;《旅宿》;《清明》;乡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08-05

晚唐诗人杜牧有很多作品脍炙人口,其中也有一些作品的归属受到了研究者的质疑。比如五言律诗《旅宿》和七言绝句《清明》就被怀疑不是杜牧的作品。笔者支持他们的怀疑和求证,同时也保留自己的观点,主张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应该先将《旅宿》和《清明》视为杜牧所作,并不断深入研究作品本身。因此,本文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对这两首经典作品的深入解读。在我们看来,《旅宿》和《清明》的主题书写的都是诗人——“行人”杜牧的乡愁,这两首诗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准,前人的解说不尽如意,因此值得我们重新细读。

一、《旅宿》的文本细读

蘅塘退士将杜牧的五言律诗《旅宿》编入了《唐诗三百首》,但是历代文人和当代学者对它的关注度并不高。原因可能是,本诗不见于杜牧身后由其外甥裴延翰编辑的《樊川文集》二十卷,而是迟至宋

熙宁六年才由杜陵田概辑录在《樊川别集》一卷之中,这也使得一部分学者对它是否出自杜牧之手产生了怀疑^[1]。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上来看,笔者相信只有杜牧这样的优秀作家才能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唐诗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有必要对这首诗多加关注,把它读懂读透。

诗是这样写的:

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
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

尾联上句的平仄格式本应为“平平仄仄仄”,“沧江好烟月”实际上是“平平仄仄仄”,这是拗救中的一种,即“本句自救”,可视为正格。

(一)几处文字的理解

首先要说到的是“家书到隔年”。很多人理解成诗人在旅馆里收到了家人去年写给他的信,我不

收稿日期:2024-05-15

基金项目:伊犁师范大学提升学科综合实力专项社科一般项目“唐诗所见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及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路径启示研究”(22XKSY10)

作者简介:黄理兵(1967—),男,湖北恩施人,伊犁师范大学边疆中华文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学生教育政策与评价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唐诗学。

同意这种理解。人在旅途,行踪不定,家人去年给诗人写信时,怎么可能知道诗人此刻会投宿在这家旅馆?写“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杜甫(《春望》),尽管是被乱军解送长安,也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居有定所,家书才能送到他手上。那么,杜牧是否长期租住旅馆,把这家旅馆当成了他的通信地址?这也不太可能。古代的确有读书人或仕宦者长期在外客居的,但一般不在旅馆长期包房间,因为住宿费太贵,而且客来客往,鱼龙混杂,环境不好。还有一些读书人是免费借住在道观、僧舍,或者在无主的空房、废园栖身,那就跟《旅宿》所写有所不同了。当然,也有个别富人在妓院里长住包月,比如跟杜十娘厮混的李甲(不过那是小说,不足为据)。杜牧也有寻花问柳的雅好,不排除经年累月泡在妓院里。但是他“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之时(《遣怀》),应该是快活逍遥、乐不思蜀,而不是如诗中所写的那样悄然凝情、寒灯远梦。而且把青楼写成“旅馆”,把出入风月场所写成“旅宿”,杜牧不会如此轻慢。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是诗人收到了家人的信,也不会是一大早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旅馆里,“远梦归侵晓”的时候,只有有住客退房出行,而不会有旅客或邮差抵达。

综上所述,这一句诗最合理的理解是:诗人写了信要寄给家乡的亲人,并且由于路途遥远,路径不畅,诗人推测这封信要明年才能传递到亲人手里。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可能是昨晚在灯下所写,也可能是今早起床后所写。正好有客人要离店,诗人把这封信交给客人,托他捎带到自己的家乡。

唐朝时没有民间邮政,驿邮由官方专营,只用来传递政府公文,还可能为杨贵妃传递新鲜荔枝(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老百姓寄信,多为请远行顺路的客人互相捎带,所以王昌龄才会请辛渐给洛阳亲友捎口信(《芙蓉楼送辛渐》)。如果与官家的“入京使”或者“驿使”相熟,也可能请他们带个口信,如岑参《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或者顺便捎带一点东西:“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南朝宋陆凯《赠范晔》,唐朝想必也会有此类做法)

杜牧这封信应该是请远行的客人捎带到家,不会那么迅捷,推测下来,家人应该是翌年才收到信。

然后我们要说到“沧江好烟月,门系钓鱼船”。有人说这两句写的是诗人家乡的景色,以表达思乡

之情。杜牧是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他的家乡并没有这样的景致。在另外的版本中,“沧江”写成“湘江”,有的学者认为这两句表明作者“家居潇湘”“怀归潇湘”^[2],而杜牧并非潇湘人氏,因此此诗并非杜牧作品。

我认为,无论是“沧江”还是“湘江”,都不足以判定此诗作者归属。尾联所写,并非旅宿之人思念故乡风物与生活,而是诗人出门(可能是从旅馆退了房,继续上路奔波)所见景色。怀乡的事已经写过了,远梦已归,家书已投,如果回头再写怀乡,未免画蛇添足。而且,沧江烟月、渔船系门,其实不能算是特别值得夸耀的美景,它是在任何河边小村都随处可见的日常景象。在我看来,这两句写的是拂晓的行程中在村头所见:江上烟云缭绕,空中晓月依稀,人家门口小船有绳子系着,船上无人,一片静谧,想来钓鱼人现在正在屋内安睡。常年漂泊无定、孤苦抑郁、睡眠质量不高的诗人,出得门来,见到的却是这样一种安详静谧、恬淡闲适的乡野生活情景,这种因鲜明对照而产生的强烈心理冲击正是从上文内容自然发展而来,到这两句正好在欲言又止之中形成了一个反转式的高潮。

假设杜牧所写的确是“湘江”而非“沧江”,那么他是否到过湘江呢?查杜牧行踪可知,大和元年(827),杜牧曾经游涪阳(大概在今安乡县、澧县),因为地近湘江流域,完全有可能顺路在湘江旁边投宿。他的诗作中有二十余首出现了“湘”字,如“潇湘”“湘南”“三湘”“湘江”等。即便除去其中的伪作或疑似伪作,仍有足够数量的篇目可证实杜牧对湘江、潇湘是比较熟悉、比较喜爱的,也从侧面证明他完全有可能到达湘江过。

(二)《旅宿》有哪些优点

《旅宿》的遣词用字看似不事雕琢,却字字轻巧老成,举重若轻。

全诗时间线索非常清楚,从投宿、入夜一直到天明、启程,是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

逻辑思路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投宿旅馆,必然与很多陌生人打交道。与这些人攀谈的结果,是跟谁都谈不到一起。于是情思郁结,默然无语,在寒灯下一遍遍怀想往事。然后因天冷、人困而试图入睡,却屡被惊醒,听到的是孤雁的哀鸣,想到自己也是离家远行,于是愈加愁闷,愈加思念家人。后半夜总算睡着了,梦中终于回到了故乡,很可惜窗外的晨曦又让自己回到了现实。起床后赶紧写了一封信,

托早行的客人辗转捎寄给家人。自己也随即收拾行李,重新踏上行程。一路上看见烟波晓月还笼罩着安闲的村庄,村民都还在酣眠,钓鱼的小船安静地系在门外的岸边,可是这样的生活离自己又是多么遥远!

《旅宿》的主角写的是诗人自己,但是他的思绪却牵扯进来若干其他人的身影,参差浮现,若即若离,像是一部抒情的电影:旅馆中的旁人,回忆中的故人,睡梦中的家人,还有只记其事的捎信旅客,只见其物的村舍渔民。

如果说这首诗是一部电影,电影的主要拍摄场景就是诗的开头两个字所交代的:旅馆。电影中道具、背景精当,近景只有寒灯一盏,家书一封,中景是村舍一所,渔船一只,远景是江上烟云一带,空中晓月一轮。音效则是万籁俱寂之中不见其形、只闻其声的断雁数声。虽然时间集中,只在一暮一朝之中,场景简单,只在旅馆内外、沧江岸边,但是因为还有旧事、远梦,所以思绪所及,在时间、空间上都完全不受任何限制。著名歌曲《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则很适合做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因为它的歌词与《旅宿》一样,都有若即若离的场景描写,并且表现了主人公怅然若失的隐秘思绪。

二、清明节与《清明》

说到杜牧诗歌的真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清明》,它到底是不是杜牧的作品,学界至今还在争论^[3]。我们还是先从作品说起吧。

(一)清明与寒食

清明是一个尴尬的日子。

它本来只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并不比其他节气更值得庆祝。大约从宋代开始,清明逐渐成了一个节日。之所以成为节日,不是它本身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跟“寒食节”合并了。寒食节在冬至之后105天,而清明通常是在冬至之后104—108天,两个日子距离太近,先后次序不固定,有时候还可能重合,推算起来太麻烦。所以,二者合并,能够避免普通群众犯糊涂。

寒食与清明,最初是有不同的主题。

相传,寒食节是晋公子重耳为了纪念手下人介子推而设立。介子推对重耳忠心耿耿,甚至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来给落难的重耳吃,可是后来却被重耳遗忘,经人提醒后想起来了,打算封赏介子推时,

态度又不够尊重,介子推一气之下躲进了山林里,没心没肺的重耳被人教唆,放了一把火把山林烧了,以为能把介子推逼出来,没想到后者坚决不出来,结果和他的老母亲一起被活活烧死(我觉得不能怪介子推死心眼儿,他哪知道重耳放这么大的火是真诚邀请他出山接受表彰封赏,还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重耳于是设立了寒食节这么一个节日,每年这时候不许老百姓烧火做饭,并且让大家都去墓地祭奠亡故的亲人。

明明是重耳这个昏王自己犯了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还有那些出馊主意的手下)绝食、悔罪的,没理由让老百姓陪绑,所以老百姓过寒食节也不是太严肃,除了扫墓、祭奠,顺带也在春天刚发芽的草地上吃凉菜、喝冷酒、看行人,很多人甚至兴高采烈、心里暖洋洋的。发展到了唐朝,唐高宗李治看到老百姓越来越没出息了,忍无可忍之下,下了一道诏书,非常严肃地说:“……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楸,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4]意思就是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当然,我们知道底层百姓不太听这一套。

其实唐朝的老百姓够幸福了,他们有专门的日子踏青、郊游,具体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拔河、蹴鞠、斗鸡、赛马、野餐、打望等等,不一而足。这个专门的快乐日子就是清明。那时候,清明被老百姓过成了节日。都已经这么幸福了,还不肯放过寒食节,非要在寒食节里也像清明一样开心,真的有点得寸进尺了。其结果就是,到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凄清寒冷、不宜欢乐的清明节。

我们现在的清明节是这样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首诗,很多人认为是唐朝杜牧写的。但是上面说了,据考证,唐朝的清明时节没有任何理由让人“欲断魂”——欲断魂的意思,是说灵魂快要离开肉体了,这是形容人极度悲伤。这看起来很奇怪。

其实也不奇怪。因为,据专家研究,这首诗根本不是杜牧写的,它是一首伪唐诗。

可是,人民是多么热爱这首诗啊!孩子们从小就学会背诵,每到清明总有人吟诵它,画家们给它配了诗意画,书法家把它写成了条幅。20世纪末,香港回归之前,市民还把它评选为“十佳唐诗”的第二

名,仅次于孟郊的《游子吟》。

真是令人尴尬。

(二)《清明》的缺点及作品归属

除了作者问题,《清明》这首诗的形式和内容也很尴尬。有人喜欢得不得了,也有人对它颇有微词。

我们来看看它收到了哪些差评。

第一,语言啰嗦。既然写的是清明这个明确的日子,“时节”就该删掉。“行人”自然是在路上,“路上”二字就不必保留。后面的“借问”其实也属多余。后世读者之所以敢动手修改它,主要跟它的这个缺点有关。没人能改杜牧的《赤壁》《江南春》《泊秦淮》吧?因为少了一个字都不行。

第二,内容矛盾。诗歌所表现的内心感情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一个极端是悲伤不禁,以至于“欲断魂”,是因为行人离家,难以团聚;另一个极端是赏心悦目,因为有开满杏花的村庄。悲喜两个极端之间,是两可的雨和酒。先说雨。春雨一般都惹人怜爱,使人心波荡漾,例如“沾衣欲湿杏花雨”(志南《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春雨又常使人惆怅伤感,无可奈何,例如“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再说酒。人们开心如意的时候要喝,例如“白日放歌须纵酒”(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悲伤难过的时候也要喝,例如“午醉醒来愁未醒”(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

第三,格调不高。远行之人如果情绪低落,一般都独自饮恨,“寒灯思旧事”(杜牧《旅宿》),不会漫山遍野找酒家买醉。就算找地方喝酒,也应该自己闷头寻觅,不会在路上逮着一个不认识的放牛娃问路。就算要跟他问路,也不宜直接打听哪里有酒家,毕竟在孩子面前暴露出酒鬼的面目,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好吧,就算这些都没问题,你在乡间小道上跟一个牧童问路,哪里犯得着文绉绉地使用“借问”这么庄重的礼貌用语?倒显得自己不懂世故,跟孔乙己一样迂腐可笑。

至少基于以上三点,让人怀疑《清明》的真正作者不是杜牧。

当然,学者们提出这个怀疑,还有更加过硬的理由。那就是,杜牧身后,由他外甥编辑的二十卷《樊川文集》中没有这首诗。北宋人搜罗杜牧遗诗,标准极为宽松,甚至混入了很多他人作品,编为《樊川别集》《樊川外集》各一卷,其中也没有收入《清明》。最早收录这首诗的,是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当

时这首诗的题目叫《杏花村》,未署作者。学者根据《锦绣万花谷》的成书年代以及其他史料,判定此诗可能产生于宋孝宗十五年后至理宗年间。可能是一位民间诗人所作,伪托唐诗。到南宋末年《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这首诗才改题《清明》,署名杜牧^[5]。

此后,这本书被南宋末年的谢枋得大刀阔斧地删减,最后编成了一本儿童通俗读物《千家诗》,其中保留了署名杜牧的《清明》,此诗遂广为人知。清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没有收录此诗,可见该书编者对这首诗的态度与谢枋得不同。

(三)《清明》的优点及杏花村的方位

《清明》一诗也有很多优点,普通群众不妨继续喜欢它。

第一,明白如话。不看注解就能懂,让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人们争先恐后地改写这首诗,其实也说明它符合大众口味,人们跟它特别亲近。

第二,朗朗上口。虽说作诗的人认为它押韵押得不好,但是我们用普通话或自己的方言来念的话,音韵基本上都很和谐。这就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容易记住,很多人读小学时就会背诵它了;二是读起来很好听,所以我们经常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听到人们朗诵它,使我们对它更加熟悉。

第三,内容丰富。只有4句28个字,却写到了很多领域、很多具体的元素:人物、场所、节令、天气、心理状态,还有一些不在现场的元素:村庄、杏花、酒家。那个全篇核心、像电影《盗梦空间》里面的陀螺一样有定海神针效果的重要道具——酒,却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这是非常巧妙的处理。至于为什么要喝酒,喝酒之后会怎么样,这完全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默契。

第四,画面感强。诗歌里面有静态的布景(近景雨中路,远景杏花村),有动态的场景(雨纷纷),有人物出场时的特写(行人欲断魂),还有随后的人物对白和肢体动作(借问,遥指)。这些静止画面和连续画面,每一个都是诗意的存在。这首诗如果让宫崎骏来改编成动画片,一定会跟《天空之城》《千与千寻》一样优美。

第五,情感动人。清明的雨水,常让人平添愁绪;远行的游子,节日里总会心绪不宁;无论扫墓还是踏青,都让不能参与其中的人倍感落寞;杏花烟雨,往往勾起人的家国之思;碌碌风尘中的酒家之问,更是显得潦倒困顿,楚楚可怜。牧童扬手一指,

却在阴郁沉重的氛围下渲染了一抹亮色,让人略微有了一点希望。

以上五点理由,能让我们喜欢《清明》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一些。

有些人找出了一些比较奇怪的理由来证明这首诗写得就是好。比如,为了证明这首诗的内容并不矛盾,他们把“欲断魂”解释成“乐极”^[6],甚至是“想喝酒”,其中“断魂”是一种酒的名字^[7]。这样的解释,作为学术观点当然是可以提出,但要说服大家接受,恐怕难度比较大。

就我个人来说,我一方面尊重学者们辛苦劳动的成果,接受学者们对这首诗的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还跟以前一样喜欢这首诗。就算没有前面总结的那五点理由,我们也可以喜欢一首诗,喜欢不一定要有理由。

《清明》这首诗中的杏花村到底指的是哪里?我的结论是:“杏花村”多半指的是开着漂亮杏花的村子,而不一定是村庄的名字。

如果村子真的叫这个名字呢?也不是绝无可能。果真如此,它就应该真有杏树,并且在清明期间开着花。那么,这个村庄在哪里呢?杏树是中国很常见的一种果树,花好看,果好吃,全国各地多有栽

种。名叫“杏花村”的村庄,全国至少有十个,比较有名的有山西汾阳的、安徽池州的、湖北麻城的、江苏南京的,等等。清明期间,江南的杏花早就过了花期,人们正忙着看满山的杜鹃花。因此,我的进一步的结论是:《清明》中写的那个杏花村,只能是在秦岭——淮河以北。

参考文献:

- [1] 吴在庆. 杜牧集系年校注(全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张金海. 樊川诗真伪补订[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
- [3] 罗漫. 文献辨伪的歧路与杜牧《清明》的追踪认证[J]. 江汉论坛,2022(3).
- [4] 王溥. 唐会要(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5] 卞东波. 《清明》是杜牧所作吗?[J]. 文史知识,2006(4).
- [6] 高连志. 从审美角度对《清明》《凉州词》再辨析[J]. 社会科学辑刊,1992(4).
- [7] 王青. 关于杜牧《清明》诗鉴赏的一点商榷[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Homesickness of Du Mu, a Pedestrian

—Take *Accommodation on the Way* and *Qingming* as Examples

HUANG Lib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Frontier,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li, Xinjiang 835000, China;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ang Dynasty poet Du Mu's two poems, *Accommodation on the Way* and *Qingming*, are written about the “pedestrian” Du Mu's homesickness, but both reach a very high artistic level. But the previous interpretation is not satisfactory, so it is worth us to re-read. *Accommodation on the Way* depicts the poet's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staying at night to leaving the hotel in the morning. The ending couplet does not depict the hometown scenery in memory, but rather the scenery seen on the road after leaving the hotel. In spite of its unsatisfactory aspects, *Qingming* has the merits of being clear, catchy, rich in content, graphic, and emotionally moving, and deserves to b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finest pieces of ancient poetry.

Key words: Du Mu; *Accommodation on the Way*; *Qingming*; homesickness

宇宙意象·诗画特质·共同体情感

——彭惊宇诗歌创作论

刘凯丽,张凡*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

摘要:作为《绿风》诗刊的第六任主编,诗人彭惊宇一方面继承了杨牧等新边塞诗人对西部自然物象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结合自身的学术志趣和兵团农场的居住经历,创造了以“蓝太阳”为核心的诗歌意象。诗人彭惊宇充分借鉴中西美术的创作技法 and 艺术理论,运用不同的色彩绘就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视觉的画面感,形成了“提取颜色——凝练形象——生发情怀”的三重审美逻辑。彭惊宇诗歌中所彰显出的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共同体情感,不仅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情,更表达了对地球家园的敬畏和呵护之情。

关键词:彭惊宇;诗歌意象;诗画特质;共同体情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13-06

《绿风》诗刊自创办以来,即为活跃在新时期诗坛的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刊发平台。《绿风》诗刊的每一任主编既是诗歌艺术的传承者,又是文学创新的推动者。继杨树、杨牧、李春华、石河、曲近之后,彭惊宇担任《绿风》诗刊的第六任主编,成为集编、评、写为一体的综合素养的诗人,沿袭了上一代诗人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人的豪迈风格,又在具体创作中有了新的理论突破。当彭惊宇从前辈手中接下兵团诗歌的接力棒,这种地域性诗歌的传承和自觉使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思考更多的是:兵团诗歌如何突出重围,如何用地域优势开拓西部诗歌的新辉煌等。

诗人彭惊宇已出版三部诗集:《苍蓝的太阳》是他最早的诗集,收录的是诗人2009年前的诗作,这些诗作呈现了出生在荒凉之地的少年一路成长、见证缤纷大地的心路历程。2016年出版的诗集《最高的星辰》,诗人彭惊宇以炽热又悲凉的“心灵歌者”形象抒怀高歌,颂扬新疆大地的自然万物,向着宇宙

星空发出生命的寻唤。该诗集获得了第六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还有2016年出版的《西域诗草》,则是有关新疆大地抒写的总集。此外,评论集《北国诗品》则凝结了彭惊宇关于诗歌创作经验的智慧硕果,系统地提出诸如“宇宙诗学”“暗意象”“大道之诗”等诗学理论。在此期间,彭惊宇勤恳务实地为《绿风》诗刊及兵团诗歌的发展贡献出他的才气和精力,推介了一批青年诗人。整体而言,彭惊宇的诗歌根植于西部壮美辽阔的山河,他用浓郁的色彩表现地域风景,用宇宙诗学表达崇高情怀,他的诗歌是当代中国西部新诗进程中一幅苍郁寥廓的画卷。

一、“蓝太阳”:诗歌意象的开拓创新

1980年代中期,以周涛、杨牧、章德益为代表所形成的新边塞诗派充分借助西北雄浑的自然物象和多彩的生活经验,创作出了野马、驼队、红柳、胡杨、马群、篝火以及蒙古族长调等极具地域性的意象。

收稿日期:2024-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汉语文学的现代性建构”(21BZW136)

作者简介:刘凯丽(2000—),女,甘肃陇西人,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通信作者:张凡(1982—),男,安徽舒城人,文学博士,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很多西部诗人都或多或少认为自己的创作与西部地域相关联。绝大多数诗人诗歌的地域标签主要由地域的风物表现出来。西部诗人对西部物象的普遍重视,说明他们普遍把意象置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位置,他们普遍具有意象美学追求的自觉意识。”^[1]正如上述所言,诗人彭惊宇将杨牧视为自己的诗歌“老师”,自然承袭了他对诗歌意象美学的自觉探索,因此他在创作初期同样是将新疆的自然物象转化为彰显地域色彩的审美意象。但综合归纳彭惊宇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诗人彭惊宇不同于杨牧等第一代新边塞诗人的地方。从荒原、大地再到宇宙,诗人彭惊宇不断开拓自己的诗歌疆界,最终建构了以“蓝太阳”为核心的诗歌意象及其表达。就诗人彭惊宇的创作阶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的“荒原”系列诗作,诸如诗集《苍蓝的太阳》第一辑“月色荒原”中《茫茫下野地》《北碱坡》《少年的荒原》等,无一不是对童年生活艰苦贫困的回忆和“下野地”荒远场景的描写。显而易见,彭惊宇早期的诗歌受到乡土经验和屯垦生活的多重影响。彭惊宇自一周岁随父辈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4团场“下野地”生活,早已融入兵团人身上坚毅和崇高的精神因子。“下野地”的经历带给诗人苦难的情感体验,由此增强了诗歌的厚重感。象征派诗人里尔克认为诗是经验,而不是情感。“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别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2]93-94}对于诗人而言,带有情感的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这既来自难以忘怀的童年岁月,也来自生活多年的此地此景。获得经验的前提,必定是诗人具有观察者的细致性和敏锐力。诗人的观察不仅依靠眼睛,更要能调动全身的器官,观察所见事物的声音、气味,甚至能察觉人内心的微妙情感。由此可见,诗人抓住了诗歌的独特之处,抓住了人类情感的本质,也就避免了诗歌语汇和意象的同质化,最终形成诗歌的个性化表达。

第二阶段,彭惊宇中期的诗歌呈现出新疆典型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既有对自然地理层面的抒写,也有对人文地理景观的抒情,这源于诗人不断游历带来的丰富感知。同时,彭惊宇也开始积极探索诗歌创作的多重面向,深入发掘个性化的表达。在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中,他向天文学、地质学、动植

物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习,发掘本土化的意象词汇;他提倡认识身边环境中的动植物,了解它们的分布状况、特点、习性等。“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有许多动植物的名称、习性都非常具有象征寓意,比如薰衣草、芨芨草、红柳、铃铛刺、猪毛菜、驼绒藜……比如草原斑猫、天山盘羊、新疆歌鸪、紫翅椋鸟、西伯利亚飞鼠……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诗歌,用以展现全新的意境。”^{[3]45}彭惊宇开始自觉思考并长期观察生活在周边环境的这些特有的物象,进而使这些日常可见的事物成为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抒情意象。如何将物象转化为意象?彭惊宇借鉴中国古代诗画中的创作方法,通过“以形写神”的手段充分凝练物象的外在特征和内在神质,予以诗歌抒情达意和形神兼备的审美意义。比如组诗《访罗布人村寨》中写道:“正午。白杏的太阳。”诗人借用新疆盛产的白杏以神统形、以意融形,无论是小白杏的颜色还是悬挂在树上的状态,都让读者能直观想象到正午太阳光线的明烈。“那些岁月深处/暴动的马群,洁白净朗的马群,撞开春天的围栏/跃上了丁香枝头,在碧蓝时空中往来飞度。”(《暴马丁香》)诗人驰骋想象力,由街道旁盛开的暴马丁香花联想到洁白的马群,诗人为观赏的丁香和闻嗅的花香赋象塑形,达到了“形准而神达”的意境。“诗人思想艺术的来源要多样化,艺术技巧的学习与创造也是一样,不可偏执,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自我成长与发展的东西,都需要了解与认识,从而让自我得到丰富的营养,接天地之灵气,系古今之文脉,大诗与大师才有可能产生。”^[4]正因如此,诗人彭惊宇积极借鉴中西方优秀艺术技法,将新疆特有的风情万物转换为感觉的语言化、形象化、直观化,从而让诗歌整体更加生动。

第三阶段,在行走新疆大地的途中,诗人彭惊宇将创作视野面向更广袤的宇宙空间,努力建构宏伟、高远、科学的“宇宙诗学”,向着更为成熟的宇宙意象体系和更为蓬勃向上的诗歌精神迈进。特别是诗集《最高的星辰》“幻象星语”“浩瀚星空”这两辑中,诗人放眼广袤无垠的宇宙,用自己储备的天文学知识,对新疆物象和中国古典意象进行陌生化改造和提升。“万物之灵的人类,向着最高的星辰举起我们的敬畏吧/跨过地质史上的灭绝和灾难,我们理应珍重这唯一家园。”(《最高的星辰》)他把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思索倾注到诗歌中,这实际上也是诗歌境界的进一步提升。“蓝太阳”作为诗人彭惊宇所有意象群中的中心意象,在这一阶段,其内涵意义得到丰富,它既是诗人对童年生活经历的艺术抽象化,也是他对宇宙天文学的学术志趣,彰显出他对新

疆生活的挚爱。此外,彭惊宇受朗吉弩斯的启发和前辈诗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索并提出了新诗美学的“新崇高”原则:“刚健质朴的诗歌,雄浑悲慨的诗歌,无限深情的诗歌,最能够打动人心,它们一下就抓住了崇高诗美的本质。”^{[5]18}无论是太阳、太空、星空、高原、草原等广袤空间,还是具有历史内涵的物象,都具有广与深的时空特质,由此形成了崇高深邃的诗境。总体而言,诗人彭惊宇的诗歌意象烙有鲜明的新疆地域特征和兵团屯垦戍边的生命经验。他自觉探索并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诗歌意象,构建了以“蓝太阳”为中心的核心意象群,总体呈现出新疆和兵团大地的风土人情和奋斗历史。他以正道情感震溃颓废萎靡之音,以富有视觉美感的色彩诗学传播西部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正如他在诗集《最高的星辰》自序中写道:“我毕生的奢望就在于,能够让我的诗歌不时迸射出遥远星子般的思想与艺术的光芒,给人以光明和温暖,以前行的动力和信心。”^{[5]2-3}在此基础上,崇高是他持之以恒追求的精神境界,也是他追求的审美意境。而彭惊宇提出的中国化超现实主义诗歌、暗意象、新崇高、宇宙诗学等诗学理论,实际上都是他对自己众多诗歌作品概括之后的归纳和创作理想。在此意义上,彭惊宇不仅是感性的写诗者,更是趋于理性的论述者。

二、诗画特质:创作技巧的跨界融合

跨艺术诗学在1960年代兴起,1990年代发展为一门显学,其中,对于诗与画的关系及其创作技巧的借鉴,一直是跨艺术诗学关注的重中之重。美国学者玛丽·盖塞在《文学与艺术》一文中写道:“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都随时意识到,文学与艺术间存在着‘天然的姻缘’,而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承认,这种姻缘本身就包含着构成比较分析之基础的对应、影响和互相借鉴。”^{[6]495-496}诗与画有“天然的姻缘”,但又各具自身的特性。回溯中国现代新诗史,李金发、闻一多、艾青等诗人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都曾学习过美术专业。李金发专长绘画与雕塑,因此他的诗歌中有着雕塑般冷峻的意象呈现;闻一多在创作中始终坚持诗画平衡,他的诗歌达到诗与画的和谐统一;艾青化用绘画技巧入诗,注重光与色的交错。比较而言,当代的彭惊宇侧重用自然的原色和光影的明暗对所写对象进行具象轮廓的描绘,诗画特质是其诗歌显著的特征。

通览彭惊宇的诗歌,他经常采用浓郁的色彩描绘多样的自然景物,而蓝色一直是彭惊宇诗歌构图中的主色调。苍蓝的太阳(《你犹然记得那青涩的

岁月》)、灰蓝的体背(《蓝鲸之歌》)、森蓝的大海(《座头鲸之歌》)、宇宙蓝的天穹(《博尔塔拉的星夜》)、湛蓝的天空(《看昭苏油菜花海》)、碧蓝的眼睛(《塔吉克鹰舞》)……“蓝蓝的赛里木湖,是你见证和蕴藏了/我们内心的冰雪与火焰。旌歌感伤地远去/一群高白鲑,托举宇宙蓝的梦境划向银河系。”(《蓝蓝的赛里木湖》)在上述诗句中,诗人熟练地运用具有不同明度与纯度的“蓝色”,描绘出一幅幅不同题材、不同意境的蓝调油画卷。在色彩心理学中,蓝色通常给人以冷静、理智、广阔、永恒甚至忧郁的心理感受。“任一些颜色,一些声音,一些香气,一些味觉,一些触觉,也都可以有诗。……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觉,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那儿有的是新鲜的东西。”^{[7]12-13}不同色调的蓝色,在诗人彭惊宇敏锐观察和细节捕捉之后,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色彩。《在额德克红叶林》一诗中,三百多字的短小篇幅有十一处色彩的描绘;《乌尔禾捡石记》百余字的小诗中,也有六处浓郁色彩的景物描绘。每一种物象的颜色构图都充分蕴含了诗人的主观感受,倾注了诗人浓烈的情感,从而使诗歌在视觉感官上具有更为丰富的层次与表达。

细细读来,可见诗人彭惊宇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重色彩构图和时空建构。在浓郁的色彩描绘中加以粗线条的勾勒,使得诗歌整体有诗画互融的艺术品格,所描之物与所绘之景皆寄托了诗人的情感。在《博尔塔拉的星夜》这首短诗中,开篇就建构了一个辽阔的画面——仰望是天穹,远处是高山,银灰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石头似的羊群与雪青马。随着诗人对此地的深入感知,诗篇的视角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想象的画面空间也从阔依塔斯的一隅天空转向另一星系的遥远家园。而此时,“银灰色的草原更灰了”,整首诗歌营造出星夜的色彩明暗变化,也映照出诗人内心由忧郁转为平和及深邃。从中可以看出,彭惊宇的诗歌在每一段都能构成一幅生动的油画截面,整首诗则充满了令人遐想的画面感和空间感。此外,诗歌整体的色调虽是暗调,但闪烁着银色的星辉,其间所蕴含的壮怀境界、崇高情感、坦荡胸襟、醇厚人性都在诗人冷静的叙述中成为催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正如上文提到,艺术是相通的,但不同类型的艺术表达各有特点。“美术技巧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可以随性横向移植的工具,反而成为一种潜在的矛盾蕴含在其诗歌创作中。诗人画家双重身份的纠结在这类诗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何在诗画之间

寻找平衡,找到最适宜的连接点成为此类诗人创作时思考的问题。”^{[8]130}应用到诗歌创作中,诗人彭惊宇经常以喻体颜色代替意象的运用,通过色彩的对比、明暗变化达到诗歌空间的纵深。因此,空间和色彩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并共同创造出诗歌在时空维度的深邃感和立体感。如《交河故城》一诗,是诗人来到交河故城遗址对历史巨变的感叹和遐想,他将交河故城比作“一片历史的落叶”,从曾经的金黄城池到如今的苍黄甬道,这种色彩的明暗变化鲜明地表达出这座“故城”的沧桑巨变——诗人之眼由古代跨越到了今朝,车师前国的国力羸弱,成吉思汗子孙们的铁蹄横行,到断壁残垣之后交河的一畔浅水。《荒原红》则是诗人关于团场秋天收获的短诗,虽描写了夕阳下的荒原景象,但这片荒原带着生活的气息和温馨,带着一代兵团人的勤劳和记忆。土地收获了玉米和黑盘葵花,马儿收获了干草,少年收获了一篓柴火和罢园瓜,天空收获了霞光。“夕阳下,猪毛菜正以璀璨的霞光映红荒远人间”,荒原之上,灰白的土路、青棕的马都不及天边那被猪毛菜映照的霞光,那是农场家园的底色,是诗人年少之时对生活的记忆和体悟。

诗歌的感性形式,不仅体现在以韵律、格调、节奏为主的语音形式中,更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所呈现给读者的视觉感官中。在诗歌中绘就的各类色彩词汇,既是诗人彭惊宇对自然万物的细致观察,也源自诗人对大美新疆的热爱。无论是彭惊宇“荒原”系列的诗歌,还是他关于山海、星云、宇宙万物的诗作,都描绘了万物自有的色彩。彭惊宇曾在自序中表达了对西方绘画艺术的喜爱,乃至他的诗集封面都采用了梵高的《星月夜》。总体来看,彭惊宇诗歌创作受益于绘画艺术的多方面影响,尤其表现在诗人对色彩的摄取和对风景的描绘,而呈现出的鲜明诗画特质。在广泛汲取新疆广袤大地呈现出的色彩魅力后,诗人彭惊宇将其转换成情景交融的诗歌色彩美学,形成了“提取颜色——凝练形象——生发情怀”的三重审美逻辑。

三、共同体情感:诗歌情感的终极关怀

当下时代语境中的“共同体”概念不再局限于地域和种族,而是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将人类的命运和自然界的兴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看,彭惊宇自一周岁随父辈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44团场生活,目睹了兵团各族群众集体生活奋斗、开创绿洲良田的壮举。在此基础上,诗人彭惊宇从兵团团结奋进的精神出发,“从现

实立场的表达对历史过程的关注判断,从一维的道德认识和单面的历史意识到多维文化视域中的审美选择,应当是1980年代前期到中期诗歌的一个历史飞跃,西部诗歌也是如此,而且更可贵的是,西部诗歌对文化历史形式的舍弃和超验欲望最终延伸为对于终极的关怀”^[9]。换言之,诗人彭惊宇并未将创作视野停留在新疆大地的地域景观和对各民族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描摹上,而是深入到人类生存和宇宙命运等终极关怀之境。在此意义上,诗人彭惊宇创作具有共同体情感的诗歌不仅表现着诗人个体的创作心理,也表达着和他有着一样生活经历的兵团人的群体心理。

具体而言,诗人彭惊宇的共同体情感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宇宙诗学”的诗学理论。他通过阅读和观看一系列有关天文宇宙的书籍和纪录片,从深奥的宇宙学理论中感悟出诗的境界。所谓“宇宙诗学”,是“以宇宙为总体框架和背景,诗意地展示人类宇宙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时间旅行和移居外星球的壮烈雄心,更多地反省人类自身在地球上的生活,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终极命运的新型的前沿诗学”^{[5]9}。彭惊宇的“宇宙诗学”兼容并蓄了中西方宇宙观,从“飞逝的星球、天体的演化和死亡、星际影响、无限嵌套的宇宙模式、对光明的向往和对黑暗的焦虑”^{[10]428},回归到中国古代宇宙观“观照人自身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国家的治乱”^{[10]434-435}。其情感内涵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要亲密无间、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共处,还饱含着他对地球家园的敬畏 and 爱护之情。“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框架之下,对生态环境单方面的控制应转变为人与环境中不同事物的多样共生。……不同的生命共同存在于地球之上,这是无法再继续化约的‘一体’。”^[11]也就是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趋于紧密,只有实现共生才能实现共荣。通过分析彭惊宇的“宇宙诗学”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正契合了我们当今时代的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

在创作初期,诗人彭惊宇书写了一系列以故乡和亲情为主题的作品,这一主题可谓一直贯穿在诗人的创作中,饱含了他对人世间的真挚深情。在《这一时刻的幸福》一诗中,诗人坐在公交车上偶然看到自己年老的双亲,“像可爱的老苍熊一样活着,当我足够老的时候/你们还依旧那么臃笨蹒跚,那么真实地走在我的身旁”。诗人在料峭冬春之际看见年迈的父母搀扶着走在街上,那种从内心涌上来的

暖流让他发自内心以“老苍熊”这种可爱的喻义称呼双亲,带给读者朴素的亲情暖意。基于此,诗人彭惊宇进一步提出了“宇宙诗学”的两种类型:即创作思想深刻和深蕴情感的“大道之诗”和“正道之诗”。彭惊宇指出:“大道之诗是一种大灵魂、大情怀、大胸襟、大境界的诗人所产生出来的诗歌;是集天地元气、自然法则和宇宙意识为一体的诗人所吐纳的心声。大道之诗是与正道之诗相关联的,只有行走在正道上,才有可能行走在诗歌的金光大道上,时代、人民和生活,永远是大道之诗最重要的基石。大道之诗人,还善于从宇航员的视角来关注我们这个星球,来观察和领悟我们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在宇宙中的终极命运。”^{[3]2}“道”在老庄看来是万物之源,在彭惊宇这里是更为深远丰茂的写作素材和诗歌境界。正道之歌给予人无限前行的勇气,大道之诗写尽世间人心人情。无论是正道之诗,还是大道之诗,它们最终都指向诗歌崇高的精神境界,指向诗歌警醒现实的灵魂效应,同样反映出人类命运和地球生命共生共存的伦理旨归。

“对于西部诗人来说,拓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对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在广阔的宇宙里汲取信息,是极为必要的。”^[12]诗人彭惊宇便是这样,怀着对西部山川大地的深厚情感,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担忧在诗歌中生发出人与自然、宇宙共命运的“共同体”理想。在此角度,他创作了一系列“宇宙”主题诗歌:《太阳系的演化》《第四纪大冰期》《太空人》《火星之旅》《木星:众神之王与欧罗巴》等。这些诗歌都以宇宙为背景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终极命运,彰显了诗人希冀建立人类与宇宙命运共同体的人文理想。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仅是现时代歌物咏志的“莺鸟”,更是未来世界的报信人。“可一觉醒过来,总是不忘记/使用电锯和斧子,罗网和猎枪/漫无表情地砍伐共存的家园/杀害我们这些弱小的金嗓子朋友。”(《禽鸟眼中的人类》)诗人将鸟类视为“金嗓子朋友”,痛惜人类对动物造成的伤害,呼吁人们珍视与动物的友好相处。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面对这种生存焦虑,彭惊宇对地球家园的痛惜和怜爱呼之欲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摇篮,唯一的家园/此刻,听不见世事纷纭的嘈杂与喧嚣/没有了心灵世界的一丝纤尘,甚至欲念/多么纯净的一只蓝眼睛,我只想久久地凝视它,把它当成初恋情人一样珍爱着。”(《从太空眺望地球》)彭惊宇从宇宙视角观赏地球母亲,他将地球比作“蓝眼睛”,以表达对生存家园的珍爱。即使《火星之旅》《星际迷航》这样

具有奇妙的天文想象的诗歌,其视点也落到了人类的终极命运和生存家园上。

正如彭惊宇在诗歌《蓝马车》中所写:“我看见那高头辕马的昂鬃仍持有不倦的热情/我感觉那日渐松散的辐轮仍持有不倦的热情。”诗人行走在辽阔的西部大地上,仰望着浩瀚的星空,在西部诗歌的沃土上勤耕不辍、精业笃行。他作为《绿风》诗刊的主编,努力推介西部诗人,为诗刊自身的繁荣发展贡献才情,这也是诗人彭惊宇“共同体”意识的另一体现。无论是写新疆的寥廓山河、童年的记忆、宇宙的浩瀚,诗人彭惊宇总是以更广阔的视角思考现时代诗歌的诗学意义,心系故土家园,并超越地域、种族,思考人类的命运。

结语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心境下产生的文学风格迥异。大境界成就大诗人,境界不仅靠诗人自身的修炼,同时也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在1970年代以来的兵团文学发展进程中,董立勃、黄毅、彭惊宇都是从“下野地”走出来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不乏对“下野地”那段艰苦岁月的回望。从某种角度来看,那段困苦的童年生活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实践,让他们始终关注现实境况与人类命运。从董立勃的小说《白豆》《飞雪如蝶》、黄毅的散文集《新疆时间》《疼痛史》、彭惊宇的诗集《苍蓝的太阳》《最高的星辰》等,我们不难看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人性关怀,其间彰显出西部作家所持有的“苍凉、粗犷、孤寂、浑厚、辽阔、悲怆、坚忍、雄壮的美学风格”^{[13]24}。艰苦磨炼出坚韧,辽阔锻造出永恒。进一步讲,诗人彭惊宇行走与仰望的人生姿态绘就了其苍蓝的人生底色,正如诗人所言“我的蓝马车”行驶在“寥廓人间”“荒远的中途”。

综上所述,诗人彭惊宇通过“提取颜色——凝练形象——生发情怀”将新疆本地的物象艺术转化为足以彰显地域色彩和个人化风格的诗歌特质。就彭惊宇诗歌的表现形式来看,他充分结合了中西方绘画的技法,注重色彩与绘画的主观情感融合,但诗歌的情感本源依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与历史。彭惊宇以新疆大地崇高壮美的风景和生动鲜活的风俗为诗歌蓝本,将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物象充分凝练,使得诗歌更富感情色彩和乡土情怀。在此过程中,诗人以联想和移情的方式,将符号性的现实物象艺术转化为情感性的审美意象,由此构建了以“蓝太阳”为中心的诗歌意象群。从感性的知觉到审美的艺术,彭惊宇的诗歌随着“荒原——大地——宇宙”

创作空间的推移,彰显出诗人超越个体、关心集体、关怀宇宙家园的“大道”之情,形成共同体情感的终极关怀。作为集编、评、创作于一体的诗人和《绿风》诗刊主编,彭惊宇自觉肩负起推介兵团诗歌的重任,力图摆脱诗歌无力乏味的窠臼,不断开拓当代中国西部诗歌的艺术疆域,并努力促成其艺术风格的形成。

参考文献:

- [1]王四四.西部诗歌意象探索[J].民族文学研究,2017(1).
- [2]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M].冯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3]彭惊宇.北国诗品[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 [4]邹建军.《幻河》给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启示[J].中州大学学报,2014(2).
- [5]彭惊宇.最高的星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 [6]玛刚·盖塞.文学与艺术[M].张隆溪,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7]朱自清.新诗杂话[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8]申欣欣.美术背景·艺术理念·诗歌创作[D].上海:复旦大学,2010.
- [9]张玉玲.中国当代西部诗歌的终极关怀[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 [10]张鸿.《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 [11]吴思敬.从诗歌地理学的角度看西部诗歌的建构[J].当代文坛,2022(6).
- [12]武宁.人类学视角下“地球生命共同体”初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
- [13]丁帆.中国西部新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Cosmic Image, Poetic and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ty Emotion

—Peng Jingyu's Poetry Creation Theory

LIU Kaili, ZHANG F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r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Abstract: As the sixth chief editor of the Green Wind Poetry magazine, poet Peng Jingyu inherit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western natural objects of the new frontier poets such as Yang Mu, and on the other hand, combines with his own academic interests and living experience in the army farm, develops and innovates the poetic image with “blue sun” as the core. Peng Jingyu fully draws on the creative techniques and artistic theor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ine arts, uses different colors to depict the depth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visual sense of picture, and forms the triple aesthetic logic of “extracting color, condensing image and generating feelings”. Peng Jingyu's poems show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emotion, the harmonious blend of beauty and painting manifested in poems is not only the harmonious feeling between man and ma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expresses the reverence and care for the earth home.

Key words: Peng Jingyu; poetic image;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and painting; community with shared emotion

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丁佐琴^{1,2}, 千东必², 汪小龙¹

(1. 无锡太湖学院 会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64; 2. 国立釜庆大学 技术经营大学院, 韩国 釜山 612022)

摘要:针对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问题,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142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依据波特假说理论和财务分析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经贸摩擦显著提高了企业财务绩效;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股权结构以及高管特征显著调节了组织韧性对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即当企业为国有持股或高管为硕士及以上学历时,经贸摩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减弱。研究揭示了经贸摩擦对企业微观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以及经贸摩擦下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治理作用,为制定双向所有制改革政策,构建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实现科技创新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关键词: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企业财务绩效;波特假说理论;财务分析理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4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19-07

一、引言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中国半导体上市公司面临产品出口和技术进口双重压力。据海关总署2023年4月17日公布的1—3月份集成电路经贸数据显示,中国半导体产品出口同比下降13.5%,芯片产品及技术进口同比下滑23%,半导体产业面临经营增长放缓、产业链外迁等多重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开篇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其中,涉及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关注重点。因此,研究经贸摩擦环境下如何促进半导体产业企业经营增长,特别是财务绩效能力提升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经贸摩擦影响产业发展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出口总额,全要素生产率,价值链分工以及产业政策等“宏观—中观”层面,针对半导体产业企业财务绩效能力指标的“微观—超微观”层面研究稍显不足,即使少量的研究探讨了经贸摩擦环境下,企业规模和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影响路

径^[1],但是未能构建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完整财务绩效指标,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程度尚未得到证明。

组织韧性是企业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重要属性,是企业危机环境下生存、适应、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的动态能力,波特假说理论也指出了这一能力在环境规制情况下对于受限制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者围绕旅游企业如何在新冠疫情下通过组织韧性促进企业经营增长问题^[2],构建资源整合、资源行动等组织韧性指标框架,但是,未能从实证角度计量各指标影响程度,结论的政策建议稍显不足,而且,研究并未就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以及组织韧性的中介效应深入展开。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142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以企业财务绩效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为切入点,以组织韧性的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为中介路径,构建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

收稿日期:2024-03-1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JL020);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JSGX004)

作者简介:丁佐琴(1982—),女,江苏盐城人,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韩国国立釜庆大学技术经营大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

效的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为：

第一，拓宽了波特假说理论在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适用范围。以往经贸摩擦的后果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经济、农业和轻工业特定行业等课题上，并未充分认识经贸摩擦作为外部环境规制，企业通过激活组织韧性可以促进企业经营增长，特别是企业财务绩效能力提升。本研究还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直接对比经贸摩擦前后半导体产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变动差值的均值，有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经贸摩擦与财务绩效的关系。

第二，丰富了组织韧性中介效应的文献。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了组织韧性的部分指标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认为创业导向、创业拼凑和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应急管理体系、企业融资成本和科技创新补助对企业经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等。但是，上述研究基于新冠疫情环境，其结论在经贸摩擦背景下是否适用有待检验。而且，本研究可能是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较早系统研究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文章。

第三，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价值。虽然经贸摩擦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文献较为充足，部分结论也测度了经贸摩擦并未降低中国制造业GVC总体水平，只是短期内抑制了我国高技术制造业GVC攀升，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是有效应对手段等，但是，政府在推动半导体上市公司财务绩效提升的过程中，优先通过金融政策、人才政策或者科研政策，结论尚未细化。而且，半导体上市公司不同的产权结构、地理位置、高管特征和股票市场等因素在促进企业财务绩效能力方面具有哪些异质性也需进一步考察。

二、文献综述

（一）经贸摩擦与组织韧性

关于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影响的研究，学者们观点仁者见仁、百花齐放。部分学者认为，经贸摩擦能够激发组织韧性，而反对的观点认为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具有抑制作用。一方面，持正向作用观点的研究者基于2000—2014年WIOD反倾销数据库，依据技术赶超理论，运用SFA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以全要素生产率差值为因变量，产业类型、贸易逆差和政治捐献为自变量，研究发现美日经贸摩擦中，日本采取了向上延伸价值链环节和提高产品多元化的手段提升了组织韧性^[3]。国外研究者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角度研究认为，经贸摩擦环境下，受限的经济体会通过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在

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和人才互认等方面提高要素供给，帮助企业增加组织韧性^[4]。另一方面，持负向影响的学者认为，经贸摩擦主要围绕关税、非关税壁垒而展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和企业的政治经济行为，直接的经济后果是被限制的企业减少出口、技术受限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所以经贸摩擦天然地抑制组织韧性。尽管负向影响观点的学者也部分赞同经贸摩擦环境下，低附加值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迫使低端半导体产业关联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国家进行转移，有利影响包括扩大原料市场、增强产业互补性以及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但是仍应加强供应链敏捷性和韧性，并寻求政府层面的支持，预防供应链鲁棒性破裂^[5]。

（二）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现有研究表明，组织韧性不仅是企业经营增长的关键因素，而且在稳定企业经营状况方面，包括提高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发挥重要作用。偿债能力指标方面，学者基于2020年1—7月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票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年限、规模等组织韧性指标对企业流动比率、清偿比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面对外部疫情冲击，政府应及时、准确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营运能力指标方面，研究者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38个国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组织韧性之中小股东保护机制，能够有效提升企业营运能力，包括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及总资产周转率等，其作用机制为防止大股东掏空和少数人控制^[6]。盈利能力指标方面，新三板上市公司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探索性创新投入在保持组织韧性的同时，也防止资源挤占，增加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和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水平。

综上，现有研究单独讨论了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或者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但是，鲜有讨论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及程度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三、研究假说

（一）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

经贸摩擦本身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加大了摩擦双方的贸易不确定性。基于避险情绪，企业通常选择更稳健的经营策略，进而在“超微观”层面影响企业财务绩效水平。偿债能力方面，国外学者以美国与巴西棉花产品经贸摩擦为例，解释了美国对巴西棉花进口不合理制裁的对等报复行为，即允许巴西拥有5.91亿美元商品部门和2.38亿知识产权报复性制裁，此举意味着经贸摩擦双方都需要应对出口减少带来的流动比率下降的风险^[7]。营运能力

方面,基于2018年中美两国商品关税数据,运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预测经贸摩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福利损失更大,中国社会福利可能会损失或略有收益,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可能会获得更多好处^[8]。盈利能力主要体现在净利润规模和比率方面,学者依据2013年WIOD数据库,基于供求平衡理论,构建对称的两国贸易模型,研究发现经贸摩擦能增加被制裁国与第三国贸易往来,进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同时,也刺激了被制裁国的消费水平,成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贸易结构的契机,最终体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率的提升^[9]。

因此,为缓解经贸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流动资产以防止偿债风险、严格信用政策、加强应收账款收回以提高资产周转效率,以及增加研发投入以应对技术外购不足的问题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经贸摩擦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二) 经贸摩擦与组织韧性

持续的经贸摩擦增加了企业的外部风险和挑战的同时,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也给企业激活组织韧性提供了基础。产品韧性方面,针对经贸摩擦环境下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出口竞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学者基于比较优势理论,依据2000—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面对国际经贸摩擦外部环境变化时,主动优化进口结构,发展服务型制造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10]。供应链韧性方面,中美经贸摩擦环境下,中国企业加强了供应链敏捷性和韧性,并寻求政府层面的支持,预防了供应链鲁棒性破裂。政策韧性方面,学者依据2014—2018年投资半导体的国家大基金数据,实证测算了经贸摩擦环境下国家大基金对半导体组织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换是由政府产业政策推动的,以国家大基金为代表的市场政策工具,引导了社会资源向战略性、先导性产业集聚,增强组织韧性^[11]。

因此,现有研究普遍支持经贸摩擦正向影响组织韧性,本文基于现有框架,将产品韧性、供应链韧性和政策韧性合并到一个分析框架中,并进一步细化为科研韧性、人才韧性和金融韧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经贸摩擦提高组织韧性。

(三) 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

经贸摩擦提高组织韧性,而组织韧性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较早的研究者以“欧盟—中国”

经贸摩擦为例,分别测算了经贸摩擦对欧盟列示的中国“好—中—坏”三类供应商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经贸摩擦整体拉大了欧盟与中国生产商的竞争差距,但是提高了幸存的“坏”中国出口商的生产力能力,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提升^[12]。国内学者提出破解经贸摩擦的有效方法,即破解半导体霸权的三个基石: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进而提升组织韧性,发展中国半导体产业^[13]。也有学者将企业家精神纳入组织韧性的范畴,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效率为因变量,经贸摩擦为自变量,研究发现经贸摩擦提高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组织韧性在配置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国有产权发挥正向调节作用^[14]。

因此,经贸摩擦环境下,组织韧性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能力,更专注于企业发展本身,从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142家半导体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初始样本,行业分类以Python大数据工具Tushare数据库为依据。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删除了样本数据的异常值;(2)缺失值按照该上市公司近5年移动平均值进行补充;(3)使用对数、数据标准化和变换单位的方法,缩小变量之间差值。

2. 变量定义

因变量为企业财务绩效(FINA),包括偿债能力(MOCA)、营运能力(TOAS)、盈利能力(EQIN)以及发展能力(DEVE)四个指标。其中,偿债能力为资产负债货币资金数值;营运能力为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数值;盈利能力为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发展能力为资本积累率,是资产负债表所有权权益环比增长比率。

中介变量为组织韧性(ENRE),包括金融韧性(STBO)、人才韧性(PAYR)和科研韧性(INTA)三个指标。其中,金融韧性为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数额;人才韧性为利润表职工福利费数额;科研韧性为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数额。

自变量为是否经贸摩擦的类别变量(TRFR),2013—2017年期间,为非经贸摩擦类型,二元数值为0;2018—2022年期间,为经贸摩擦类型,二元数

值为1。

控制变量(*CLAS*),包括经营年限(*YEAR*),地理区位(*CITY*),股权结构(*STRU*)、高管特征(*EDUC*)以及股票市场(*STOC*)。其中,经营年限为公司注册日期截至年报公告日期的年限数值;地理区域为是否东部城市企业,是为1,其他为0;股权结构为十大流通股东中是否有国有资本参股,是为1,其他为0;高管特征包括管理层平均学历,硕士及以上为1,其他为0;股票市场为是否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为1,其他为0。变量定义详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名称	符号	含义
偿债能力	<i>MOCA</i>	2013—2022年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
营运能力	<i>TOAS</i>	2013—2022年资产负债表总资产数值
盈利能力	<i>EQIN</i>	2013—2022年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发展能力	<i>DEVE</i>	2013—2022年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环比增长率
金融韧性	<i>STBO</i>	2013—2022年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数额
人才韧性	<i>PAYR</i>	2013—2022年利润表职工福利费数额
科研韧性	<i>INTA</i>	2013—2022年资产负债表无形资产数额
经贸摩擦	<i>TRFR</i>	2013—2017年期间为0,其他为1
经营年限	<i>YEAR</i>	2013—2022年公司注册日期截至年报公告日期的年限数值
地理区位	<i>CITY</i>	2013—2022年东部城市企业,是为1,其他为0
股权结构	<i>STRU</i>	2013—2022年十大流通股东中是否有国有资本参股,是为1,其他为0
高管特征	<i>EDUC</i>	2013—2022年董事会平均学历,硕士及以上为1,其他为0
股票市场	<i>STOC</i>	2013—202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是为1,其他为0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总效应*c*系数、直接效应*c'*系数,经贸摩擦影响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a*系数,以及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间接效应*b*系数,步骤如下:

首先,为检验研究假说H1: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总效应*c*系数,构建基本模型见公式(1)所示,观察系数*c*是否具有显著性。

$$FINA_i = \beta_0 + c * TRFR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FINA_i*为企业财务绩效的类别; β_0 为截距;*c*为经贸摩擦的总效应系数;*TRFR_i*为经贸摩擦的类别; ε_i 为残差。

其次,为检验研究假说H3:组织韧性对于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以及作用程度如何?构建模型如公式(2)(3)所示,考察直接效应系数*c'*以及间接效应系数*a*、*b*是否具有显著性。

$$ENRE_i = \gamma_0 + a * TRFR_i + \varepsilon_i \quad (2)$$

$$FINA_i = \delta_0 + c' * TRFR_i + b * enre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ENRE_i*为组织韧性类别; γ_0 为截距;*a*为经贸摩擦的间接效应系数;*c'*为经贸摩擦的直接效应系数;*b*为组织韧性的间接效应系数; ε_i 为残差。

通过观察系数*c'*是否具有显著性,来判定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如果系数*c*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c'*不具有显著性,则组织韧性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如果系数*c*和系数*c'*均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c' < c*,则组织韧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量为*a * b*,见公式(4)所示,则有:

$$c - c' = a * b \quad (4)$$

最后,为检验控制变量在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作用中的异质性,构建公式(5):

$$FINA_i = \varphi_0 + c' * TRFR_i + b * ENRE_i + d * CLAS_i + \varepsilon_i \quad (5)$$

其中:*CLAS_i*为控制变量的类别,*d*为回归系数。进一步,检验主效应回归方程(5)中各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3及以下,证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偿债能力平均值为10.26,最小值为0.0068,最大值为866.67,单位为亿元;营运能力平均值为45.25,最小值为0.068,最大值为2299.32,单位为亿元;盈利能力平均值为27.14,最小值为-8.70,最大值为1619.74,单位为亿元;发展能力平均值为0.89,最小值为-246.03,最大值为33.85,单位为百分比;金融韧性平均值为2.99,最小值为0.000073,最大值为90.98,单位为亿元;人才韧性平均值为0.49,最小值为0.000085,最大值为12.23,单位为亿元;科研韧性平均值为1.74,最小值为0.000030,最大值为45.27,单位为亿元;经贸摩擦平均值为0.6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单位为百分比。限于篇幅,本文未展示控制变量数值,详见表2。

(二)基础回归

表3汇报了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经贸摩擦促进偿债能力8.87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营运能力30.81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盈利能力20.30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发展能力31%,具有显著性;模型整体拟合优度*F*值均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1。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偿债能力	10.26	1.42	0.0068	2.75	866.67
营运能力	45.25	4.32	0.068	13.94	2299.32
盈利能力	27.14	2.82	-8.70	8.96	1619.74
发展能力	0.89	0.29	-246.03	1.09	33.85
金融韧性	2.99	0.20	0.000073	0.50	90.98
人才韧性	0.49	0.035	0.000085	0.15	12.23
科研韧性	1.74	0.15	0.000030	0.35	45.27
经贸摩擦	0.63	0.01	0	1	1
经营年限	14.41	0.20	1	14	40
地理区位	0.90	0.01	0	1	1
股权结构	0.26	0.01	0	0	1
高管特征	0.66	0.01	0	1	1
股票市场	0.63	0.01	0	1	1

表3 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MOCA	TOAS	EQIN	DEVE
	公式(1)			
TRFR	8.87*** (3.00)	30.81*** (3.44)	20.30*** (3.46)	0.31** (2.20)
截距	4.60** (1.95)	25.61*** (3.58)	14.19*** (3.03)	1.10** (2.24)
F值	9.03***	11.85***	12.01***	10.40**

备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01$,分别在10%、5%和1%置信水平下显著相关,下同

表4汇报了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1)偿债能力方面,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组织韧性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2)营运能力方面,金融韧性影响不具显著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正向影响营运能力,具有显著性,这一结论与现有学者研究相符。(3)盈利能力方面,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组织韧性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4)发展能力方面,金融韧性、人才韧性和科研韧性影响均具有显著性,组织韧性对发展能力的影响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F 值均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3。

表4 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MOCA	TOAS	EQIN	DEVE
	公式(3)(4)			
TRFR	-1.34 (-0.60)	-5.67 (-1.06)	-1.80 (-0.45)	-0.35 (-0.57)
STBO	-1.08*** (-5.94)	-0.14 (-0.34)	-1.56*** (-4.80)	0.01 (0.26)
PAYR	28.68*** (22.97)	82.42*** (27.56)	53.84*** (24.25)	0.04*** (24.71)
INTA	0.60*** (2.44)	5.92*** (9.96)	3.66*** (8.30)	0.0094*** (3.51)
截距	-1.01 (-0.56)	-2.20 (-0.51)	-0.33 (-0.10)	1.04** (2.08)
F值	228.46***	531.21***	352.45***	13.94***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三)稳健性检验

1. 滞后一期稳健性检验

考虑经贸摩擦对组织韧性和财务绩效的滞后影响,本文将经贸摩擦滞后一期,重新进行检验,表5汇报了回归结果,本文结论未发生实质改变。组织韧性大多数指标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3。

表5 稳健性检验:经贸摩擦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变量	MOCA	TOAS	EQIN	DEVE
	公式(3)(4)			
TRFR _{t-1}	-0.45 (-0.18)	-4.84 (-0.80)	-0.89 (-0.20)	0.11 (0.16)
STBO _{t-1}	-1.29*** (-6.12)	-0.12 (-0.23)	-1.61*** (-4.38)	-0.0024 (-0.04)
PAYR _{t-1}	33.05*** (21.47)	92.37*** (24.60)	62.29*** (23.06)	0.025*** (5.86)
INTA _{t-1}	0.62** (2.08)	6.29*** (8.67)	3.83*** (7.33)	0.00082*** (9.86)
截距	-0.63 (-0.33)	0.61 (0.13)	0.65 (0.19)	0.95* (1.77)
F值	194.42***	418.97***	310.42***	88.34***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完全 中介效应

2. 政策外生性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17年中美经贸摩擦作为政策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主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2017—2022年期间,取值为1,其他为0。样本期内所属行业受到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企业为实验组,取值为1,其他为0。设置交互项 DID 对财务绩效进行效应检验,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6 稳健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MOCA	TOAS	EQIN	DEVE
	公式(3)			
DID	9.40*** (3.26)	32.07*** (3.66)	20.87*** (3.64)	-0.39 (-0.65)
截距	4.63** (2.11)	26.26*** (3.90)	14.78*** (3.35)	1.13*** (2.45)
F值	10.63***	13.45***	13.29***	4.35***

六、机制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表7汇报了进一步检验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经贸摩擦促进金融韧性1.04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人才韧性0.37亿元,具有显著性;经贸摩擦促进科研韧性0.95亿元,具有显著性,模型整体拟合优度 F 值均具有显著性,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2。

(二)控制变量的调节作用

表8汇报了控制变量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

表7 经贸摩擦影响组织韧性回归结果

变量	STBO	PAYR	INTA
	公式(2)		
TRFR	1.04*** (2.42)	0.37*** (5.18)	0.95*** (2.90)
截距	2.32*** (6.72)	0.26*** (4.49)	1.32*** (4.30)
F值	5.86***	26.87***	8.44***

表8 控制变量影响组织韧性回归结果

变量	MOCA	TOAS	EQIN	DEVE
	公式(5)			
YEAR	0.92*** (4.31)	4.05*** (6.38)	2.30*** (5.49)	0.02*** (4.97)
CITY	5.28 (1.09)	17.43 (1.21)	12.04 (1.26)	1.21 (1.18)
STRU	17.54*** (5.34)	70.77*** (7.27)	42.84*** (6.65)	1.49** (2.14)
EDUC	5.21* (1.72)	10.58 (1.17)	5.46 (0.92)	0.13 (1.20)
STOC	7.15** (2.31)	20.87** (2.27)	13.13** (2.16)	0.24 (1.36)
截距	-20.48*** (-3.36)	-67.86*** (-3.76)	-40.24*** (-3.37)	-0.99 (-1.07)
F值	13.74***	25.14***	20.07***	6.75***

第一,经营年限方面,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年限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为正,具有显著性。其中,经营年限提高偿债能力0.92亿元,提升营运能力4.05亿元,增加盈利能力2.30亿元,以及提高发展能力2%。第二,地理区位方面,经贸摩擦环境下,组织韧性影响财务绩效的过程中,是否东部城市企业对于结果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该结论也指出经贸摩擦对于经济体全境产生影响,区域内企业不存在影响的异质性。第三,股权结构方面,国有股权由于天然具有政府属性,在市场资源获取能力上存在优势,因此,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现为:提高偿债能力17.54亿元、营运能力70.77亿元、盈利能力42.84亿元和发展能力1.49%。第四,高管特征方面,半导体上市公司管理层学历特征仅在偿债能力方面具有正向显著性,其他企业财务绩效影响效应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第五,股票市场方面,“先发优势”在经贸摩擦、组织韧性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表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相比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效应系数分别高出7.15、20.87和13.13,具有显著性。

上述结果表明,控制变量除地理区位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均显著调节了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经营年限较长、国有资本参控股、高管硕士及以上学历,以及沪市上市的企业,经贸摩擦环境下组织韧性促进企

业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显著。

七、结论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3—2022年中国沪深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企业财务绩效”的研究框架,考察经贸摩擦、组织韧性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经贸摩擦显著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2)经贸摩擦提高了组织韧性,而且,经营年限、股权结构、高管特征和股票市场显著调节了组织韧性在经贸摩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半导体上市公司经营年限较长、国有资本参控股、高管平均学历较高以及沪市上市时,组织韧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上述结论拓展了波特假说理论在经贸摩擦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适用范围。

(二)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经贸摩擦在给经济体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应对,能够激活组织韧性,产生波特假说理论下的企业财务绩效“不降反升”的结果。中国应继续加快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格局,拓展新兴市场、延伸产业链以及提高产业科技创新程度,以应对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缓解经贸摩擦带给实体企业的负面冲击。(2)金融机构应为受经贸摩擦冲击的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为受冲击企业提高人才吸引能力;提供政府、产业与企业配套的科研支持,既包括资金资产、也包括开放重点实验室,建立合作科研中心等。(3)政策制定的优先顺序和程度方面,对于经营年限较短的企业要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对于面临财务绩效困难的企业,可以考虑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双向所有制改革,以提高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和保障披露程度增强股东信心。对于高管层平均学历较低的上市公司,要重视管理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防止出现大股东掏空和少数人控制的情况,构建促进企业管理者发展的长效机制,激活管理层活力,引导企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提升财务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麻靖涓,张敦力,赵丽娟.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经验证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11):108-120.

- [2] 邹永广, 吴沛, 李媛, 等.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韧性: 进阶机理与复苏路径[J]. 中国软科学, 2023(2): 125 - 135.
- [3] 杨飞, 孙文远, 程瑶. 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10): 99 - 117.
- [4] Renuka M, Anda N. Ca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minimize the har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 Trade War? [J].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11): 3148 - 3167.
- [5] 王海全, 吴德进, 陈燕和. 中国产业向东盟转移的动因、影响及趋势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2): 100 - 110.
- [6] 胡海峰, 宋肖肖, 郭兴方. 投资者保护制度与企业韧性: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 经济管理, 2020, 42(11): 23 - 39.
- [7] Lakatos C, Walmsley T. Dispute settlement at the WTO: Impacts of a no deal in the US - Brazil cotton dispute[J]. The World Economy, 2014, 37(2): 244 - 266.
- [8] Guo M, Lu L, Sheng L. The day after tomorrow: Evaluating the burden of Trump's Trade War[J]. Asian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8, 17(1): 101 - 120.
- [9] 姜卫民, 夏炎, 杨翠红. 关税壁垒真的是限制对手的武器吗?[J]. 管理评论, 2022, 34(9): 47 - 59.
- [10] 张峰, 战相岑, 殷西乐, 等. 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5): 133 - 151.
- [11] 王宛秋, 张若凡, 鄒海拓, 等. 国家大基金投入对半导体产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机制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6): 101 - 110.
- [12] Jabbour L.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Chinese imports, European Union anti - dumping measures and fir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17(1): 1789 - 1797.
- [13] 李巍, 李琦译.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 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2, 39(1): 22 - 58.
- [14] 吴娜, 白雅馨, 刘聪慧, 等. 中美贸易摩擦、企业家精神与金融资产配置[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22, 36(3): 15 - 3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rade Fricti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DING Zuoqin^{1,2}, CHUN Dongphil², WANG Xiaolong¹

(1. School of Accounting, Wuxi Taihu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06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Pukyong National University, Busan 48547, Kore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ssue of trade frictions affecting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data of 142 semiconductor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 shares from 2013 to 2022, and based on the porter theory and financial analysis theor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friction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equity structure and executive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regul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fric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at is, when the enterprise is state - owned or the executive has a graduate degree or abov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rade friction on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weakens. The study reveals the impact path of trade frictions on the micro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as well as the governanc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under trade friction.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two - way ownership reform policies, constructing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achieving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orient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trade frictions;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entrepreneurial financial performance; porter's theory; financial analysis theory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易田,李媛

(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00)

摘要:作为数据要素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动力引擎。在构建2012—2020年黄河流域66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沿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且对不同区域、不同政府支持力度下的城市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以期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和分区域、有重点推进流域内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关键词:数字经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5

中图分类号:F49;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26-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而城市作为人口、资金、信息等资源要素的集聚地,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到了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1.5%^[2]。数字经济凭借自身的高渗透性,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不仅引发了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也成了近年来各个国家重点支持的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黄河流域最大的短板在于高质量发展不充分^[3]。《中国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沿黄城市发展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理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黄河贡献”,是黄河流域八大省份共同面对和亟须解决的紧迫课题。鉴于此,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能否凭借自身高渗透性、高增值性高效匹配各类要素,为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如果能,其传导机制是什么?另外,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沿线不同区位、不同政府支持力度的城市产生的是同质化影响吗?区域内各城市又将如何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完善自身要素配置,进而形成区域多元合作、协同创新的新格局?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黄河流域科学布局数字经济,释放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对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内涵、水平测算和发展现状3个方面。就数字经济的内涵而言,杨伊静(2020)通过借助2020年的《数字经济白皮书》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作了全面概括,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得以阐明^[4]。就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水平的测算而言,初丽霞、岳远媛(2023)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20个二级指标测算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5]。就黄河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而言,李媛(2022)研究发现黄河流

收稿日期:2024-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66);西安财经大学2022年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22YC053)

作者简介:易田(2000—),女,陕西镇巴人,西安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

域的数字经济基础相较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稍显薄弱,但从发展速度来看却具备极大的数字化发展空间和潜力^[6]。

(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对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评价指标和路径选择3个方面。就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而言,金碚(2018)基于经济学基础理论,阐述了新时代经济发展应有的质态,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性质及促进体制机制^[7]。就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而言,安树伟、李瑞鹏(2020)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市场有效、动能转换和产业支撑等,还应积极贯彻落实生态优先、区域协调和以人为本的理念^[8]。徐辉等(2020)以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环境和生态状况5个维度共同构建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还从时间、空间两大方面分析了该区域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而言,他们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该进行精准有力的宏观调控、健全高效的市场机制和培育更具生机的微观主体^[9]。任保平、巩羽浩(2023)指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应以数字经济为依托、以全域统筹为导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安全稳定为目标^[10]。

(三)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现今,学界对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机制和门槛效应、溢出效应两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王军、王帅(2022)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11]。周清香、李仙娥(2022)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转换动力、优化结构、共享成果、保护生态四个方面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12]。就门槛效应、溢出效应而言,宋跃刚、郝夏珍(2022),周清香、李仙娥(2022)指出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作用呈现出一种非线性边际递增的态势^[12-13]。

现有的丰硕成果剖析了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内涵,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水平和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了测算,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亦有可延伸的空间。现有对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重点为中国整体及长江流域,且研究视角侧重于省际。鉴于此,本文基于城市视角,将数字经济和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采用多种实证方法验证其影响效应和中介机制,以拓展现有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和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数字经济以新兴通信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为物质条件,通过大量的信息和数据在互联网上实现互联互通,凭借其广覆盖性和高渗透性重组区域要素资源。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黄河流域城市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从而提高了城市运行效率。

第一,数字经济通过增强城市经济活力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创新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唤醒了传统商业生态的革命意识,加速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与其他行业的先进技术交叉融合使得技术产生重大突破,从而催生一系列新兴经济业态,有助于促进各类资源要素在黄河流域的高效流通和有效配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开发,给诸多中小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数字产业,引进大批优秀企业形成规模集聚效应,使得行业综合竞争力增强,这将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向着平稳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经济活力。

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产业数字化的深度与广度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凭借其较强的正外部性加速了区域间数据、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通,使产业数字化的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的深化,倒逼沿黄部分落后城市加强与西安、青岛、郑州等新一线城市的数字技术交流,并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力度,从而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广度不断增强,数字乡村建设有效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通过发挥数字经济的跨时空交流优势有效优化城乡结构,通过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衍生出诸多全新业态,从而激发乡村地区的发展潜力,赋能城乡融合,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生态治理能力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绿色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凭借自身特性可以精准捕捉一定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发展动态,从而为科学、系统的环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智能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工监测,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的重大变革,数字效能的充分发挥是沿黄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贯彻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提供

了崭新的工具探索和路径选择。

第四,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对外贸易水平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开放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广泛运用于对外贸易各个环节,主要包括广告营销、物流仓储、报价磋商和委托报关等,从而赋能于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数字经济凭借其高渗透性使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中小企业以低成本快速进入国际市场,进而以更为便捷的态势融入全球产业链。数字经济通过为交易对象提供数字化平台使买卖双方直接沟通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破除了信息壁垒,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上下游供需匹配效率。

第五,数字经济通过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动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共享发展。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科技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科技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效力,满足广大市民对各类基本民生保障的迫切需求。数字技术为打造资源要素整合、业务高效协同、流程优化与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营模式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企业、智库、科研院所、非正式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使公共政策的实施效能得以提升,还体现了对社会各界的人文关怀,这有利于建设普惠均等的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加速推进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强化民生领域上的供需高效对接,从而赋能于沿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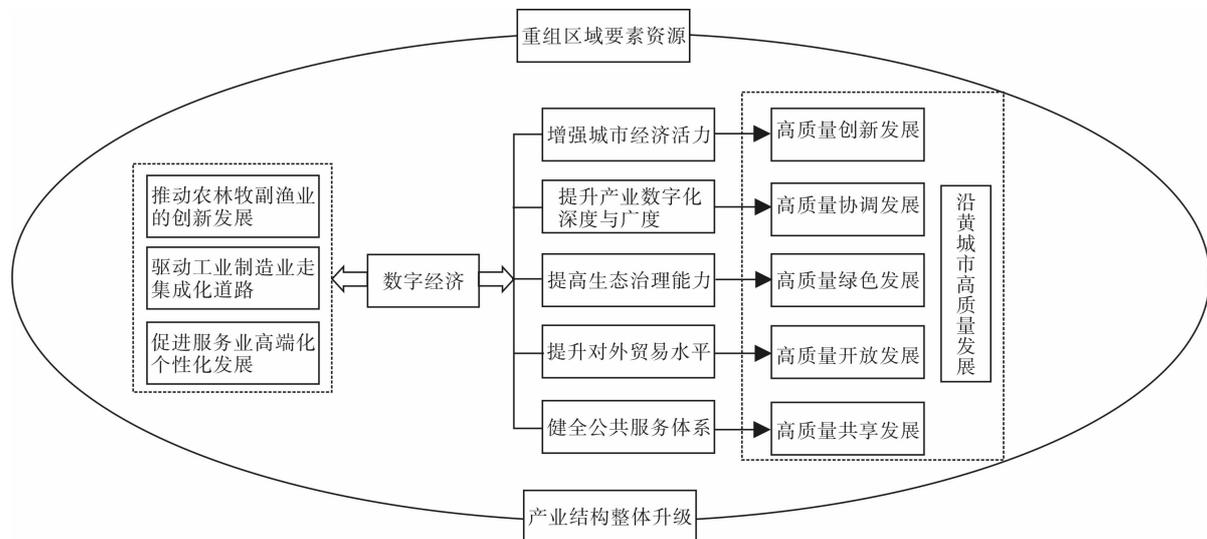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二)数字经济对沿黄城市产生的异质性影响

黄河流域的各大省份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各自具有鲜明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特征。上游主要流经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海拔较高,气候寒冷,地形复杂,水资源丰富,主要产业为畜牧业和林业。上游是黄河文明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游位于黄土高原和山地丘陵区,地形起伏较大,气候干旱,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也有一定的工业发展。中游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游位于平原地带,气候温和,水资源相对匮乏,但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和工业。下游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地区,经济发展迅猛,具备丰富的现代文化特色。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结构、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经济发展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影响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升、数据体系的建设和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区域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就省域而言,山东、河南和陕西与流域内的内蒙古、甘肃和宁夏等省区相比,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网络应用和数字科研支撑力度3个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就市域而言,城市间的知名度、规模等级、综合影响力和辐射力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因此,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城市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对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会产生异质性影响。

(三)数字经济促进黄河流域沿线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

黄河流域城市半数以上为资源型城市,产业低

质低效情况突出,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区域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恶劣。因此,产业结构走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是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凭借其高传播性、高融合性、高增值性成了整合区域要素资源、重构竞争新优势、重塑区域经济结构的关键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是产业发展必须顺应的发展趋势,产业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有效调整和持续升级。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技为产业走向数字化赋能。高新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融合渗透,可以提高传统第一二三产业的信息化水平,不仅可以延长众多产品的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创新能力和运转效率,增加相关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利用一系列传导效应带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可以加速形成新的产业,优化产业布局,助推产业结构向整体升级的方向行稳致远。就第一产业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农林牧副渔业的创新发展。通过智能化技术对林田湖海的环境进行精准化监控,对生产实现精细化管理,用电商渠道逐渐代替传统的买卖渠道,有效提升众多产品的交易范围和流通效率,在了解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后可以实现精准对接、有效供给。就第二产业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工业制造业走集成化道路。数字技术及智能设备的应用,使制造业降低了交易成本,减少了资源错配^[14],实现专业化生产和绿色生产,也推动了工业制造业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需求。就第三产业而言,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掌握了众多消费者的相关信息,使服务业走向专业化、个性化、精细化。第三产业产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高,意味着区域内构建了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也表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转变,这种趋势将会对经济、就业、人民生活等各方面带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也使城市趋向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

四、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沿黄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对学界现有研究的借鉴,以 *Digital* 为解释变量,以 *Hq* 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Hq_{i,t} = \alpha_0 + \alpha_1 Digital_{i,t} + \alpha_2 LnGDP + \alpha_3 Industry_{i,t} + \alpha_4 Density_{i,t} + \alpha_5 Univer_{i,t} + \alpha_6 Edu_{i,t} + \alpha_7 Tech_{i,t} + \alpha_8 Fdi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模型(1)

$$Oupis = \alpha_0 + \alpha_1 Digital_{i,t} + \alpha_2 LnGDP_{i,t} + \alpha_3 Industry_{i,t} + \alpha_4 Density_{i,t} + \alpha_5 Univer_{i,t} + \alpha_6 Edu_{i,t} + \alpha_7 Tech_{i,t} + \alpha_8 Fdi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模型(2)

$$Hq_{i,t} = \alpha_0 + \alpha_1 Oupis_{i,t} + \alpha_2 Digital_{i,t} + \alpha_3 LnGDP_{i,t} + \alpha_4 Industry_{i,t} + \alpha_5 Density_{i,t} + \alpha_6 Univer_{i,t} + \alpha_7 Edu_{i,t} + \alpha_8 Tech_{i,t} + \alpha_9 Fdi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其中 *Digital* 为数字经济, *Hq*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 *Oupis* 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LnGDP* 为经济发展水平, *Industry* 为工业化水平, *Density* 为固定资产投资, *Univer* 为教育水平, *Edu* 为教育投入, *Tech* 为科技投入, *Fdi* 为外商投资水平, ε 为残差。

(二) 变量选取及测度

1. 被解释变量:城市高质量发展(*Hq*)。借鉴刘佳等(2021)^[15]的研究,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选取21个指标共同构建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指标	次级指标	具体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创新发展	科教投入	科技投入/财政支出	%	正向
		教育投入/财政支出	%	正向
	专利水平	专利获得量	个	正向
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	金融存款余额/金融贷款余额	%	正向
	人民生活	单位人均收入	元	正向
		非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	%	正向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	正向	
绿色发展	三废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污物处理	工业烟(粉)排放量/工业产值	吨/万元	负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开放发展	外商概况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共享发展	社会福利	外资概况	亿美元	正向
		在外企概况	外资企业总产值	亿元
	消费水平	在外企数	个	正向
政府负担	政府负担	医师数/人口	个/万人	正向
		在岗职工工资	元	正向
政府负担	政府负担	城市绿化率	%	正向
		社会零售品消费/GDP	%	正向
政府负担	政府负担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	负向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ital*)。借鉴赵涛等(2020)^[16]的研究,通过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量、互联网相关产出情况、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和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共同构成城市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体系构成见表2。

表2 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权重
互联网普及率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	0.1904
互联网相关从业人员数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	0.3260
互联网相关产出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	0.2981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	0.0709
数字金融普惠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0.1146

3. 中介变量:通过借鉴王菡等(2023)、段鑫等(2023)、冯飞等(2023)^[17-22]的研究,本文选择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作为本文的中介变量,用 *Oupis* 表示(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2 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3 的总和来衡量)。

4. 控制变量:经济水平(*LnGDP*,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工业化水平(*Industry*,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Density*,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教育水平(*Univer*,当地高等学校的数量)、科技投入(*Tech*,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外商投资水平(*Fdi*,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见表3。

表3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或者描述
被解释变量	城市高质量发展	<i>Hq</i>	熵值法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	<i>Digital</i>	根据赵涛等人的研究测算数字经济水平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i>Oupis</i>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i>GDP</i> 比重 * 1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i>GDP</i> 比重 * 2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i>GDP</i> 比重 * 3
控制变量	经济水平	<i>LnGDP</i>	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工业化水平	<i>Industry</i>	工业增加值占 <i>GDP</i> 的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	<i>Density</i>	固定资产投资占 <i>GDP</i> 的比重
	教育水平	<i>Univer</i>	当地高等学校的数量
	科技投入	<i>Tech</i>	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外商投资水平	<i>Fdi</i>	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的自然对数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在参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流域范围做出划分的基础上,并结合沿黄城市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选取2012—2020年我国沿黄七省区(包括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因黄河流域只流经四川省的阿坝、甘孜两个州,流经范围较小且以上两个州的相关数据不具有连续性,所以在研究时剔除了该省份;因青海省的地级行政区数据缺失过于严重,

未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66个地级市(盟、自治州)的宏观数据为样本。借鉴《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中的划分方式,将黄河流域城市划分为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上游包括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中游包括山西和陕西所管辖的地级市,下游则是河南和山东所下辖的地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各地方统计局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马克数据网和各地级市的统计公报。针对部分地区的少量缺失值,基于相关地区临近年份的数据特征,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以拥有相似特征的其他地级市的数据进行嵌入匹配。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表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i>stats</i>	<i>sd</i>	<i>N</i>	<i>p50</i>	<i>mean</i>	<i>min</i>	<i>max</i>
<i>Hq</i>	0.625	610	0.0938	0.286	0.0109	4.409
<i>Oupis</i>	0.126	610	2.316	2.324	2.06	2.625
<i>Digital</i>	0.0346	610	0.070	0.076	0.017	0.338
<i>LnGDP</i>	0.930	610	7.435	7.371	0.693	8.572
<i>Industry</i>	0.930	610	17.01	16.99	14.391	18.94
<i>Density</i>	0.701	610	16.35	16.35	13.96	18.13
<i>Univer</i>	0.871	610	1.609	1.740	0.693	4.29
<i>Tech</i>	0.00857	610	0.0104	0.0125	0.002	0.0462
<i>Fdi</i>	1.30	610	2.40	2.549	0.693	6.864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5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i>Hq</i>	<i>Hq</i>	<i>Hq</i>
<i>Digital</i>	0.256*** (4.200)	0.264*** (4.246)	0.094*** (2.633)
<i>LnGDP</i>			0.093* (1.913)
<i>Industry</i>			0.009 (0.471)
<i>Density</i>			0.018 (0.917)
<i>Univer</i>			-0.064** (-2.456)
<i>Tech</i>			17.127*** (5.200)
<i>Fdi</i>			0.204*** (6.166)
<i>_cons</i>	0.300*** (11.443)	0.282*** (3.989)	-1.464*** (-3.032)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610	610	610
<i>R</i> ²	0.0394	0.0409	0.5037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 < 0.1, ***p* < 0.05, ****p* < 0.01

表5为数字经济(*Digital*)对城市高质量发展(*Hq*)的回归结果,其中回归(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未控制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回归(2)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的回

归结果,回归(3)为加入控制变量并进行年份和个体固定双重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从回归(1)到回归(3),回归的 R^2 从0.0394增大到0.5037,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显著性提高。同时,可以看到三组回归中,数字经济(Digital)对城市高质量发展(Hq)的回归系数均在至少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二)稳健性检验

为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本文借鉴鲍鹏程等^[23]、贺唯唯等^[24]、陈海鹏等^[25]的研究,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缩减样本区间和遗漏变量检验三种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其带入回归模型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回归(1)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次,本文将样本区间从2012—2020年缩减至2015—2020年,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回归(2)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最后,本文为了控制内生性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支持力度也是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将政府支持水平加入模型当中,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回归(3)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更换数字经济 的衡量方式	缩减样本区间	遗漏变量检验
	Hq	Hq	Hq
Digital	1.361** (2.234)	0.110** (2.147)	0.126*** (2.765)
LnGDP	0.092* (1.898)	0.027 (0.364)	-0.025 (-0.368)
Industry	0.009 (0.500)	0.025 (0.375)	0.011 (0.623)
Density	0.018 (0.921)	0.003 (0.307)	0.008 (0.532)
Univer	-0.062** (-2.368)	-0.092** (-2.554)	-0.105*** (-3.786)
Tech	17.025*** (5.135)	13.691*** (3.430)	19.628*** (5.607)
Fdi	0.203*** (6.152)	0.255*** (5.114)	0.188*** (6.341)
_cons	-1.545*** (-3.156)	-0.934 (-0.934)	-3.835*** (-5.07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10	338	610
R ²	0.5035	0.5429	0.519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上述三组回归的结果均与前述保持一致,由此可以证明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

(三)内生性检验

借鉴赵涛等^[16]和鲍鹏程等^[23]的研究,本文初步选取1984年各城市邮电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指数的工具变量。一个地区在以往发展过程中使用的通信方式会从技术水平、社会偏好等方面影响样本期内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接受程度,满足相关性条件;邮电作为社会基础设施,主要为民众提供通信服务,并不直接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分工过程,满足外生性条件。需要说明的是,选用的工具变量原始数据为横截面形式,不能够直接用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因此,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具体而言,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1984年各城市每万人电话机数量构造交互项,作为该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工具变量。

表7第一、二列的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之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以上检验说明了选取历史上各城市电话机数量与同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叉项作为数字经济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表7 面板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ital	Hq
<i>Iv</i>	0.337*** (6.88)	
Digital		0.339*** (3.53)
LnGDP	-0.010 (-0.14)	0.108** (2.44)
Industry	-0.013 (-0.36)	0.092*** (3.44)
Density	0.008 (0.85)	-0.001 (-0.37)
Univer	0.335*** (8.26)	-0.180*** (-5.31)
Tech	3.436 (1.22)	13.322*** (5.32)
Fdi	-0.037 (-1.33)	0.265*** (7.05)
_cons	-5.432*** (-5.09)	-1.130*** (-4.35)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64	364
R ²	0.370	0.521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四)异质性分析

1. 城市区位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在中游组,数字经

济 (*Digital*) 对城市高质量发展 (*Hq*) 的回归系数通过了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进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而在上、下游组的回归中, 数字经济 (*Digital*) 对城市高质量发展 (*Hq*) 的回归系数则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一方面, 黄河上游各省份受到资源禀赋的桎梏, 现有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数字意识及人才结构使数字经济的发展动力孱弱, 缺乏数字红利释放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进而导致数字经济对流域内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遭遇层层阻滞; 另一方面, 黄河下游的两大省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 它们受益于国家和本省颁布的一系列倾斜性的数字政策, 也对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贡献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发展、网络应用和数字科研支撑力度 3 个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 从而抢占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该区域本身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数字经济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便相对减弱。由此可以验证 H2。

表 8 城市区位异质性回归结果

	上游	中游	下游
	<i>Hq</i>	<i>Hq</i>	<i>Hq</i>
<i>Digital</i>	0.019 (1.602)	0.067 ** (2.401)	0.018 (0.214)
LnGDP	0.009 * (1.790)	0.059 * (1.793)	0.177 (1.472)
<i>Industry</i>	0.001 (0.126)	-0.007 (-0.231)	-0.010 (-0.534)
<i>Density</i>	-0.005 (-1.017)	-0.000 (-0.109)	0.365 *** (2.887)
<i>Univer</i>	0.013 *** (5.196)	0.052 *** (4.432)	-0.242 *** (-4.221)
<i>Edu</i>	-0.103 (-1.293)	-0.363 *** (-2.376)	-3.372 *** (-3.043)
<i>Fdi</i>	0.005 ** (2.040)	0.038 *** (3.764)	0.506 *** (9.782)
<i>_cons</i>	0.038 (0.853)	-0.285 (-0.819)	-7.151 *** (-4.44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4	261	295
<i>R</i> ²	0.9009	0.5972	0.6792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2. 城市政府支持力度

根据政府预算支出的均值, 将研究样本分为政府支持力度高、低两组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9 所示。实证结果显示: 相比于政府支持力度较低的城市, 数字经济对流域内政府支持力度更高的城市的高质量影响效应更为显著。由此可以进一步验证 H2。

表 9 城市政府支持力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政府支持力度高	政府支持力度低
	<i>Hq</i>	<i>Hq</i>
<i>Digital</i>	0.142 * (1.744)	0.017 (1.081)
LnGDP	0.123 (0.933)	0.041 * (1.813)
<i>Industry</i>	0.374 *** (3.041)	0.002 (0.318)
<i>Density</i>	0.051 (0.352)	0.005 (1.079)
<i>Univer</i>	-0.202 *** (-3.679)	-0.017 (-1.209)
<i>Tech</i>	7.922 * (1.758)	16.058 *** (4.562)
<i>Fdi</i>	0.399 *** (5.832)	0.046 *** (3.793)
<i>_cons</i>	-8.703 *** (-3.368)	-0.514 *** (-3.576)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i>N</i>	253	357
<i>R</i> ²	0.6429	0.4626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五) 机制检验

中介机制检验的结果如表 10 所示, 可以看出: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为正, 且均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在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该结论可以验证 H3。

表 10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i>Hq</i>	<i>Oupis</i>	<i>Hq</i>
<i>Digital</i>	0.094 *** (2.633)	0.080 *** (4.561)	0.077 * (1.844)
<i>Oupis</i>			0.330 * (1.929)
LnGDP	0.093 * (1.913)	-0.007 (-0.694)	0.106 ** (1.985)
<i>Industry</i>	0.009 (0.471)	-0.002 (-0.321)	0.012 (0.564)
<i>Density</i>	0.018 (0.917)	-0.001 (-0.166)	0.022 (0.942)
<i>Univer</i>	-0.064 ** (-2.456)	0.051 *** (7.365)	-0.085 *** (-2.901)
<i>Tech</i>	17.127 *** (5.200)	2.209 *** (4.776)	16.065 *** (4.574)
<i>Fdi</i>	0.204 *** (6.166)	-0.001 (-0.390)	0.212 *** (5.963)
<i>_cons</i>	-1.464 *** (-3.032)	2.229 *** (25.726)	-2.388 *** (-3.228)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610	607	607
<i>R</i> ²	0.5037	0.5330	0.4835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基于2012—2020年黄河流域6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得到以下结论: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可以有效助推黄河流域城市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已经成了构筑地区竞争力新优势,促进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依托,且能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对沿黄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并非同质化,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中游城市以及政府支持力度更高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更为显著;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是数字经济赋能黄河流域众多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实现黄河流域沿线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建议如下:

第一,利用好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大力发展沿黄地区数字经济。要不断深化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加强沿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夯实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要积极构建符合黄河流域特色的数字网络支撑体系,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持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黄河流域要以区域特色为抓手,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产业化提质,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加大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的宣传力度,及时总结数字经济发展应用的黄河经验,使黄河流域沿线人民更好地共享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把黄河打造为宜居共享的幸福河。

第二,黄河流域各城市应着眼于总体布局,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上游城市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资源,积极打造绿色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游城市应该坚持水土保持和环境治理同向并举,进一步增强能源化工的利用效率,着力推进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下游城市应该发挥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和创新人才的优势,不断推进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数实融合。另一方面,新一线城市应该抓住发展契机,加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积极培养数字经济新兴人才,郑州、西安、洛阳、济南、青岛等城市应尽力提升自身的辐射效应,打造城市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第三,持续强化各类要素支撑,推动黄河流域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要稳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压缩时空距离以扩大集聚优势,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大中小城市的合理配置。其次,应该认识到科技创新型人才不足的严峻现实,黄河流域相

关城市应该改进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为产业结构升级注入人才动能。最后,政府应该加强和完善金融财税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为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保驾护航。

第四,多措并举促进经济发展,并积极营造促进黄河流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软环境。首先,应该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对专利成果的转化力度和保护强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其次,应该积极吸引外资,沿黄城市应该结合自身比较优势,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时代大潮中,扩宽自身的发展空间。最后,应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政府应制定持续有力的金融政策,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数字经济领域倾斜,从而增强数字经济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2] 中国信通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R]. 汕头: 中国数字经济创新与发展大会, 2022.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J]. 中国水利, 2021(21): 3-16.
- [4] 杨伊静. 打造包容性数字经济模式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信通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J]. 中国科技产业, 2020(8): 5-7.
- [5] 初丽霞, 岳远媛.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的影响[J]. 人民黄河, 2023, 45(8): 47-53.
- [6] 李媛. 高质量区域经布局下数字黄河建设的目标及其实现[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1(6): 78-89.
- [7] 金磊.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5-18.
- [8] 安树伟, 李瑞鹏.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进方略[J]. 改革, 2020(1): 76-86.
- [9] 徐辉, 师诺, 武玲玲, 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 资源科学, 2020, 42(1): 115-126.
- [10] 任保平, 巩羽浩. 数字经济助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J]. 经济问题, 2023(2): 15-22.
- [11] 王军, 车帅.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来自城市异质性的经验证据[J]. 资源科学, 2022, 44(4): 780-795.
- [12] 周清香, 李仙娥. 数字经济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4): 15-20.
- [13] 宋跃刚, 郝夏珍. 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0(1): 48-58.

- [14]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 中国工业经济,2019(8):5-23.
- [15]刘佳,黄晓凤,陈俊. 高铁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2021(1):14-26.
- [16]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17]王嵩,吕本富,徐晓辰.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 城市问题,2023(7):73-83.
- [18]段鑫,陈亮. 产业结构升级对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生态经济,2023,39(2):92-99.
- [19]冯飞,吴明阳.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J]. 人民黄河,2023,45(1):13-18.
- [20]王珏,吕德胜. 数字经济能否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2(6):120-136.
- [21]张瑞,王格宜,孙夏令.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J]. 经济问题,2020(9):1-11.
- [22]吴慧,上官绪明. 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人民黄河,2021,43(9):14-19.
- [23]鲍鹏程,黄林秀.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北京社会科学,2023(5):66-79.
- [24]贺唯唯,侯俊军. 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改革,2023(5):41-53.
- [25]陈海鹏,彭思雨,沈倩岭.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J]. 统计与决策,2023,39(10):100-10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 –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YI Tian, LI Yuan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Shaanxi 710100,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economic form driven by data element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level of high –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66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2 to 2020,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 –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benchmark regression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its impact on cities with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vernment support levels. The overall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 – 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well as for the promotion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the basin through regional and targeted effort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Yellow River Bas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verall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 现实影响与实践探索

陈一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3)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规制对城镇化的影响从无到有,从缺失到逐步完善并在进一步加深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力。21世纪新阶段的来临,主张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理念的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影响更加多面、具体,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生态化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城镇化进程的过快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可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但由此产生的资源重置未必对城镇化发展起积极作用,也出现了因力度、强度、效率等不足使产业、居民理念、技术创新等方面发展形成阻碍,影响城镇化的演进效应。新阶段的环境规制应加强与理念贯彻、制度完善、科技防治、全社会主体等的协调配合,落实创新实践,共同推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关键词:环境规制;城镇化;生态环境;产业升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6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35-05

城镇化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环境、生态问题,从长远可持续发展来看不利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实现。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又通过环境规制等政策干预影响着城镇化的进程及方式。探索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互惠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其中,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是社会性规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实施行政命令等政策、措施抑制“以环境换增长”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恶化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社会主体所认可。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又反向制约和影响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镇化发展也将步入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转型发展新阶段。而如何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是回答新阶段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面临的关键问

题。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全面影响,并就出现的负面影响、障碍因素等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产生重要意义。

一、环境规制的内涵及相关研究

环境规制起初的目的是保护环境,但先行国家发现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应将会渗透到社会发展内部中,并会产生持续性影响^[1]。针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产业结构或经济效益^[2-3]。全面、深刻理解环境规制的内涵是正确认知环境规制影响的基础。一般而言,环境规制对外部环境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源头、中间、末端等途径。源头治理在于限制高污染要素资源投入,并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改革;中间治理则强调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优化与调整;末端治理则是采取直接手段控制污染物排放量^[4]。环境规制作为一种负外部性行为,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两种方

收稿日期:2024-05-28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增权视角下文化旅游助推河南省乡村振兴的机制与对策”(242400410530);2021年度郑州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旅游扶贫效率研究”(zks202102)

作者简介:陈一静(197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经济,市场营销。

式。前者主要包括制订环境标准、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以及技术标准等；后者主要包括建立排污收费或征税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等。两种规制方式配合发挥作用，共同作用于源头治理、中间治理和末端治理。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约束能源消耗，还能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模式转变、技术进步等^[5]。

我国目前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冲刺的阶段。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任何影响城镇化进程的因素、问题，都将成为我们攻克的难关、正视的瓶颈。理解并分析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全面影响，将进一步促进城市生态建设、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解决城乡一体化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二、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影响

（一）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绿色发展挑战

新阶段的到来，不仅引领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环境等各领域的发展目标发生深刻变革，更催生了社会各主体对社会建设的新要求与新期待。在这一背景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央及各级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升。相较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已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并更深入地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环境规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积极宣传生态文明观念、下达环境保护等行政指令，政府有效地遏制了一系列以空气污染、水污染、土质污染、工业污染为代表的环境问题。这些政策变革不仅促使企业、民众以及城镇中的其他行业纷纷调整其生产生活方式，开始以城市绿色发展为目标导向，还推动了整个社会向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迈进。

具体而言，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成功减轻了城镇化进程中绿色发展的不利因素，降低了已发生的负面影响。它促使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同时，也引导民众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此外，环境规制还推动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二）促进区域内各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发展建设

在城镇化进程中，环境规制等政策的实施对于

制约环境污染、减少污染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政策的落实不仅有助于提升城镇化的质量，还为民众打造了宜居的生存环境，实现了经济文化水平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环境规制作为政策调节工具，对企业这一行为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必然要求区域内的企业克制损公利己的行为，以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为前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这些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放弃粗放型的生产结构，通过技术创新或管理精细化等手段开发新型产品，以占据市场份额并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力的创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正确的发展指导，而且帮助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发展建设，完成产品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因此，环境规制在促进区域内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三）加速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质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经济增长原动力不断被城镇化这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所替代。城镇化发展速度及规模都呈现出成倍级的增长，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城市集群现象也逐渐出现，工业、服务业、商业等扎堆落户城市，催生城市人口密集化，为获得较快经济增长速率，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区域经济驱动力的不足，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一挑战，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是指，主动积极配合政府行为，服从顶层设计，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向标。由此，可从质的角度转变过去资源配置型的增长方式，逐渐形成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双向发力的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推进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

由此可见，加强环境规制政策落实，不仅是适应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更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质变的有力保障。

（四）保护不可再生环境资源维系人类健康生存

环境规制，主要是指政府为调节市场机制在环境外部性问题上的失灵，谋求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而通过颁布行政制度、利用市场机制并发挥公众作用的方式，约束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制度安排。

城镇化进程中,整个社会资源主要应用于经济生活等环节,也间接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趋于紧张。同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矿产、土地、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利用,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恶化。

为了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健康、宜居,政府必须采取行政措施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予以干预。而环境规制的有力施行,不仅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可以引导工业体系改进生产结构,学会合理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从而维护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发展,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进而保护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園。

(五)反映对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飞速增长,经济、科技、社会、人口等方面更是突飞猛进,而快速城镇化也带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差异性突出等问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综合性课题,也使得环境规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关于环境规制对经济、生态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实现大幅增长。其中,李泽众、沈开艳着重探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过程型和效果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各区域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方式的环境规制都可以促进区域内及区域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6]。从这些理论研究中,利用省份、城市数据及计量模型等,依靠实证分析获取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意义。这些文献对环境规制影响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从中反映出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新阶段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障碍分析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政府愈发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并更加强调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如何有效利用政策工具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成了政府面临的新问题与新目标。环境规制作为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政策工具,在推动城镇化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它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对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的企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居民消费模式等构成挑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形成了一定障碍。

(一)环境规制约束力不足,阻碍居民生态理念提升

环境规制是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以环保为目的、以个人和组织为对象的一种约束性行为,在环境

改善中起到积极作用,改善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我国环境规制政策调节行为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整体环境规制体系还不完善,初步形成的“行政命令、市场激励、公众参与”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体系还面临着不少难解的问题。涉及公众参与度方面,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基于公众自愿,不具有强制性,环境规制强制力及法律约束呈现出明显不足,也导致部分环境规制工具发挥效力弱化,让环境规制政策浮于表面、流于形式,不利于居民生态保护理念的贯彻及落实,严重影响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力度的不足,对民众指导性、引导力等都会产生影响,不利于生态文明观念的宣传,城镇居民思想意识上的不充分,将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二)环境规制制度缺陷,阻碍城乡隔阂动态消除

环境规制理念经历了从“污染防治观”到“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再到“生态文明观”“绿色发展观”的转变过程,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环境治理逐渐推进的过程,更是环境规制政策从量到质的突破发展。然而,环境规制理念的时空演变明显优于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的进程,环境规制制度体系完善程度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总体上仍处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转型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二元隔阂与分立依然存在,而环境规制制度存在的缺失,更易引发工业污染由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农村地区被迫演变为制造污染的更大源地,从而加剧城市与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产生更严重的城乡失衡问题,进一步阻碍城乡隔阂的消解。因此,要格外注重环境规制制度层面的建设、完善以及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三)环境规制效率降低,制约产业结构升级进程

环境规制效率是国家在行使环境保护的公共管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时所获得的环境效益同所投入的环境管理成本之间的比率关系,是评估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方式和途径^[7]。环境规制效率的高低不仅关乎政府环境治理成效的高低,也是政府投入管理成本高低的表现,更可体现政府推动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效。环境规制的实施让企业或者产业群体不断调整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理性评估自身的成本运作,并通过各类行政限制措施倒逼企业或产业规范生产、合理转移,迫使污染型产业慢慢消

退,环保高附加值的产业获得发展,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可见,强调环境规制效率,研究环境效益与成本比率,可进一步把控环境规制的干预度及严格度。没有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无法保障较高的环境规制效率。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复杂等原因,环境规制效率有所降低,已逐渐制约部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及效果。

(四)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影响治污技术创新成本

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关乎防污治污技术的创新提升。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发展进程中,最初的政府强制干预政策,主要包括污染物排放许可、行政处罚、征收排污税等强制性手段,政府过度追求环境规制政策效果致使企业成本不断提升,用于技术创新的成本也不断增加,当超过企业承受临界点之后反而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随之,以市场激励为主的环境规制政策,依靠市场经济自主调节作用,促进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刺激企业通过改善生产模式减少污染排放,通过防污治污技术创新加强环境管理,最终获得的经济效益远大于治污技术创新所投入的成本,并产生了较好的环境防治效果。从中可以看出,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效果应理性对待,过度追求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将影响治污防污技术开发成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抑制作用。

(五)环境规制强度与城镇化发展间协调性较差

环境规制,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规制。环境污染是一种负外部性行为,对这类行为进行规制就是要将整个社会为其承担的成本转化为其自身承担的私人成本。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低,将会影响整个社会需要承担的环境治理成本,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结合当前城镇化发展状况及环境规制强度,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如果两者之间协调性较高,将会维持两者的互相促进作用,减少负面效应对两者的破坏。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家早期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过分注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忽略了环境规制的建设,导致环境规制层面处于严重脱节,环境规制强度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近年来环境规制强度获得了短期的强化,但相较于城镇化发展质量仍有所缓慢。这也造成两者间协调性还处于摸索结合阶段,整体协调性不强,存在互相制约现象。

四、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新驱动策略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不断转换;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动作为、迎接挑战、积极

创新、精准施策的实践创造造就的。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国家现代化发展建设将起到越来越重要作用,是环境治理成效的重要手段。对此,应针对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部分弱发挥性问题,尝试从理念、政策执行、制度改革、科技进步等方面探索环境规制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驱动策略。

(一)秉持生态环境理念宣导,落实最广泛受众居民体

环境规制更大范围、更多区域的落实与贯彻,既离不开政府主观能动性,更需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宣传、守约、规范、执行等。其中,处于城镇社会中生存的每一个居民,都应主动了解环境规制概念、意义、内涵及核心目标,才能实现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保护群。首先,政府应做好引导服务,转变行政理念,提高政务服务意识,促使公职人员就环境规制政策做好入户、进社区、入农村、入企业的宣传,用高质量服务营造有利于政策执行的环境。其次,政府应加强生态环境先行理念,持续推行行政民主化,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积极维护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益,进而提升民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从思想到行动实现统一,助力政府、企业搞好污染治理,把利好政策实现最后一公里覆盖,促进城市、农村地区生态文明观优良思想氛围的形成。

(二)强化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美化城镇生态防治污染

任何政策的高效执行都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我国环境规制体制中缺乏激励功能与约束功能,也阻碍了环境问题解决和规制效率提高。我国能否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并加强制度执行与激励作用,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8]首先,应加强环境规制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做好整体性、系统性长远规划,确保制度建设的实效性、适应性,发挥好中央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平行管理双向作用,保证制度建设的全面性、指导性。其次,加强环境规制监管制度创新建设,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有责必担、失责必究,建立环境责任追究体系,监督环境部门将责任落到实处,避免执法不力、粗放执法等行为,维护被执法者权益。最后,在制度建设中补充激励机制方面内容,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调动环境污染企业整治污染、绿色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

(三)落实企业绿色转型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升级调整

中国面临新的发展阶段,生态、经济协调平衡发

展应成为主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 21 世纪的建设者，更应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建设的头等大事，加强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任何社会主体都应遵循自然规律，除了正式制度上的强制性还应遵循价值观、社会习惯、道德及风俗等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创新驱动策略探索，还应将重点集中于企业主体。首先，加强对企业绿色发展、健康壮大等生产理念的贯彻，安排区域内政府部门与企业内部进行交流、培训，提升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其次，强化企业转型发展驱动力，利用市场化调节机制调动企业转型发展的决心，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动企业主动创新、积极作为。最后，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利用产业升级及转移发展与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影响，改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破坏，减少抑制作用的发生。

（四）科技创新引领市场发展，实现生态经济驱动战略

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正向作用的发挥，还应强调对环境治理成本的投入，尤其应注重开发生态环境技术，增加科研技术投入，利用科技改变整个市场环境，减少重工业污染类型企业，加大环保技术研发力度，减少对稀缺环境资源的汲取，依赖可再生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提升。首先，利用科学技术的创新引领市场发展，重点围绕绿色生态经济建设搞科研，实现节能环保资源、清洁能源供给、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其次，建立生态经济为纽带的技术联盟，广泛与全球其他国家开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研合作，共同开发未知世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最后，政府给予绿色科研机构及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从金融资金、人才培养、税收减免、科研合作、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多项优惠，进一步提高市场主体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动力。

（五）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环境与城镇发展共赢

进一步探索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并作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应成为环境规制战略性发展趋势。首先，利用环境规制行政行为为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严格执行区域防污治污政策，大力在城乡一体化中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同向同行，充分考虑城市和区域间的空间联系与互动，以构建新的生态优势为目标，在无差别、整体化的环境规制基础上，打破行政壁垒，推进区域间的产业圈层升级和协同发展，实现不同区域间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共治。其次，坚决防范重污染型企业在转移出城市后，向农村、山区等乡村

地区聚集，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斩断错误走势，保留乡村地区发展潜力，最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保留无污染、原生态、绿意盎然的生态源地。最后，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环境生态等发展现状，实行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创造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局面。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新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影响与实践探索。通过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不仅有效抑制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推动了城市绿色发展和企业绿色创新，而且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保护了不可再生资源，对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然而，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挑战，如规制力度不足、制度缺陷、协调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加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改革环境规制制度、推动科技创新引领市场发展等新驱动策略，以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生态文明的共赢发展。这些发现不仅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也彰显了环境规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Becker R A.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lant - level productivity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1, 70 (12) : 2516 - 2522.
- [2] 边雪凤.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D]. 沈阳: 辽宁大学, 2022.
- [3] 杨建亮, 陈铮铮.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我国 30 省份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生态经济, 2021, 37 (6) : 165 - 171.
- [4] 夏海力, 叶爱山. 环境规制的作用效应及其异质性分析: 基于我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J]. 城市问题, 2020 (5) : 88 - 96.
- [5] 张国兴, 冯祎琛, 王爱玲.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作用研究 [J]. 管理评论, 2021, 33 (1) : 92 - 102.
- [6] 李泽众, 沈开艳. 环境规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 (2) : 21 - 32.
- [7] 孙钰, 宋雪瑶, 马建辉, 等.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 基于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J]. 生态经济, 2024, 40 (1) : 143 - 150.
- [8] 何宏庆, 鲁庆. 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 [J]. 江西农业学报, 2023, 35 (12) : 169 - 17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 47 页）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温家珠¹, 洪刚²

(1. 南京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8;

2.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1)

摘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关键词:新型经济犯罪;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模式;数字化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7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40-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经济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传统经济犯罪呈现出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特征,大量新领域的经济犯罪也不断涌现,对市场经济秩序、国家经济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造成了巨大破坏,有关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需求逐步攀升。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因其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要求主管部门在处置涉案虚拟财产时,既要坚持一般财产处置的基本规则,又要兼顾其特殊需求。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对涉案虚拟财产管理问题尚未作出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对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只能依靠间接性的规范依据。具体而言,一是扣押涉案虚拟财产,公安机关主要依据2019年公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7条关于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措施与方法的规定;二是涉案虚拟财产的保管,主要依据是2020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

案件程序规定》第236条关于“易损毁、灭失、腐烂、变质而不宜长期保存,或者难以保管的物品”的规定;三是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变现,主要依据是2020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6条关于“对冻结的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规定,而关于具体的兑付方式、处置程序均缺乏详细规则。总体来看,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在管理方面处于扣押难、保管难和处置难的“三难”境地,给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从司法实践来看,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产管理的工作要求,各地公安机关针对刑事诉讼涉案财产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改革。但是,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搜查与扣押、移送与接受、保管与处理、执行与返还,与传统涉案财产有所区别。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在新型经济犯罪治理中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缺少可借鉴经验,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从研究情况看,针对新型

收稿日期:2024-06-07

基金项目:2024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个人信息分析报告的司法运用问题研究”(KYCX24_0025)

作者简介:温家珠(1998—),女,山西晋中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

经济犯罪问题,学界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对于网络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界定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虚拟财产的程序性处置的研究还较为分散,仅将“涉案虚拟财产”作为“刑事诉讼涉案财产”内容意义上的组成部分^[1],研究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不足。规范涉案虚拟财产相关司法程序作为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司法改革项目,有待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管理为切入点,探究虚拟财产从保管到执行的流程环节存在的困境,明确管理模式转型的功能需求,进而构造一站式管理合规模式,以期对刑事涉案财产管理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二、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现状考察

近年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互联网高科技手段犯罪的频发,以虚拟物品、虚拟货币、虚拟账号为代表的新型虚拟财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刑事司法实践之中,成为信息网络犯罪的重要对象,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数字平台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网络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针对涉案虚拟财产处置的程序规制显得愈发重要。侦查机关为了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通常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手段暂时限制或剥夺涉案被追诉人对财产的控制、使用、处分等权利,对该类犯罪的涉案虚拟财产作出程序性处置^[2]。目前,虚拟财产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包括网络游戏账户及其关联的装备、角色、等级等,电商网店、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以及其下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虚拟货币等互联网金融投资。由于当前虚拟财产管理处于法律缺位状态,虚拟财产往往作为与刑事案件相关联的犯罪对象、犯罪工具、违法所得而被纳入涉案财产^[3]。在此过程中,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涉及查扣方式、保管方式以及处置方式等程序性事务。不少地区对涉案财产进行了跨部门涉案财产集中管理的探索,但是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运行方式。

关于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查扣。依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对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进行管理,包括涉案虚拟财产查证、提取、保管、处置全流程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处理模式:一是一体查扣模式。该模式是对虚拟财产的实物载体进行扣押,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资产进行查封、扣押或冻结,以确保虚

拟财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种模式与传统涉案财产的管理模式没有区别,通常由公安机关对涉案财产采取单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当事人对此只能被动接受,但是这种模式没有考虑如何将虚拟财产进行变现。因为,虚拟财产只有变现之后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而其实物载体本身并无价值。二是单独提取模式。公安机关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线上数据进行提取和分析,同时对其线下实物载体进行查封或扣押,线上线下分别提取。这种模式是对一体查扣模式的进一步优化,然而将涉案虚拟财产的线上数据从实物载体中提取对技术性要求过高,这往往需要当事人认罪认罚,予以配合。倘若当事人不配合侦查机关的工作,拒不交出私人密钥,那么单独提取的目的便很难实现。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州肯普滕镇的一名检察官表示从一名诈骗者手中没收了价值超过5000万欧元(约合6000万美元)的比特币,但因为无法破解密码而不能解锁这笔资产^[4]。三是强制划扣模式。该模式是对当事人控制的虚拟财产采取划拨款式扣押的方式,即重新设定私钥后转到执法机关的钱包或者地址。四是变现冻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安机关往往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托管和变现处理,委托第三方机构能够有效地解决困扰公安机关的技术性难题。当前的主流做法是通过劝说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配合公安机关将涉案虚拟货币委托第三方出售,将获得的款项进行退赔或上交国库,然而这一模式也会伴随着如何认定第三方机构的资质,由谁来承担高昂的处置费用,如何对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等问题的发生。

关于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首先,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依法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并对涉案财产进行整理、制作清单、财产保全等。其次,公安机关注重涉案财产的证据属性,按照“办管分离、分级管理、来去明晰、妥善保管、案结物清”的管理原则,在案件办结前,对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法律措施,或通过其他强制性手段进行及时有效的查控和保全,这些方式具有临时性和阶段性的特点^[5]。再次,由于虚拟财产具有特殊性,公安机关可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先行处置以实现财产保值。而对涉案虚拟财产的变卖、拍卖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原则,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会同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严禁暗箱操作。最后,公安机关有权对涉案的各种财产进

行扣押。但面对涉案虚拟财产,由于其虚拟特性,需要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交流,劝导其上交虚拟货币的密钥,并同意将电子钱包中的虚拟货币转移到公安机关或侦查人员所创立的电子钱包中,再对密钥以及创立电子钱包的设备进行分别保管。

三、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现有管理模式的实践困境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型经济犯罪日益增多,涉案虚拟财产在新型经济犯罪中既是犯罪工具,也是犯罪目标,给刑事案件的侦查、取证、追缴和追诉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我国法律没有为公安机关提供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明确规则指引,技术资源也有所欠缺,因此,涉案虚拟财产管理面临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多重困境。

(一) 忽视了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

由于虚拟财产具有匿名性、不可逆性以及跨境性的特点,传统的物证保管、犯罪所得追缴等方式不能有效应用于虚拟财产。例如,虽然提出了使用新私钥接收虚拟货币并进行物理隔离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遇到技术和程序上的困难,“占有私钥保管”模式无法确保固定比特币在账^[6],这影响了查控证据、保全财产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实际功效。随着虚拟财产技术的不断创新,新的加密货币、虚拟货币交易及挖矿技术层出不穷,区块链技术也存在不稳定性 and 诸多安全漏洞,导致虚拟财产载体容易被窃取和攻击。此外,若采取私钥物理隔离的方式,在公安机关采取扣押行动之前,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对“私钥”进行备份,进而在公安机关保管期间启动“备份私钥”转移和隐匿数字资产。相关部门在虚拟财产保管方面需要提升技术能力和安全防护水平,但现有管理模式常常忽视了这些特殊保管手段的重要性。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公开透明性,侦查机关搜查扣押涉案数字资产时,以及对链上的信息进行分析时,有极大可能会侵犯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

(二) 割裂了涉案虚拟财产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

现有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针对现实资产的处理,如现金、房产、股票等,在技术和程序上较为成熟。但随着虚拟财产在新型经济犯罪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管理模式开始暴露出技术性上的不足。由于虚拟财产具有数字化、去中心化和跨境流动的特性,它的收集、认定和处置过程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支持和专业知识。然而,现行的涉案财产管理模式

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技术性裂痕。首先,传统的取证和鉴定手段在涉案虚拟财产方面往往无法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例如,在对加密货币交易记录、数字钱包等数据的搜集和分析过程中,由于加密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拟财产的无形性和易变性增加了取证的难度,同时,虚拟财产的交易记录往往分散于多个平台或系统中,容易遇到取证困难、证据链的断裂等问题。其次,现有管理模式无法充分应对各类涉案虚拟财产收集中涉及的技术难题。例如,由于涉案虚拟财产交易记录可能存在多样化的公链和私链,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进行有效的收集和辨认。再者,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涉案虚拟财产追缴和处置方面面临重大挑战。涉案虚拟财产的追缴往往涉及跨国、跨部门的协作,这不仅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差异,还涉及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建设。传统的法律手段往往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数字化环境,不足以解决涉案虚拟财产的执行困难。此外,由于虚拟财产的价格波动和流动性较大,如何妥善处置这些财产以保护被害人和国家利益也是一个难题。最后,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涉案虚拟财产的保管和安全防护方面也存在不足。虚拟财产保管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将财产“锁定”在一个物理场所,而是需要依赖于技术手段确保其不被非法操控、盗窃或用于其他犯罪活动。

(三) 限制了涉案虚拟财产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

现有的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主要是针对现实资产,如现金、房产、股票等权益的分配机制。然而,在新型经济犯罪中,此类模式往往不能充分满足虚拟财产对犯罪事实证明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虚拟财产具备数字化、跨境性、匿名性等特点^[7],使得现有涉案财产管理模式的取证环节难以顺利进行,且容易受到国内外监管差异的影响,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成为一大难题。其次,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所依托的实体资产负债表和交易日志在虚拟财产领域难以发挥同样的作用。虚拟财产生成、转移和使用过程往往发生在数字世界中,难以通过传统的实体资产负债表和交易日志进行完整记录。传统手段很难获取涉案虚拟财产的完整、关联性强的信息链条,因而无法有效还原涉案虚拟财产的生成、转移和使用过程,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也会影响执法部门对涉案虚拟财产的认知和判断。再次,现有的传统涉案财产管

理模式对虚拟财产证明价值的挖掘具有局限性。虚拟财产依托于复杂的网络系统和算法机制,其存在形态、流转方式以及价值判断都与传统的实体财产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法定证据种类中,电子数据与虚拟财产的特征颇为相似,都具有虚拟性,形成或储存在电子介质中。有学者早在论述电子数据的搜查、扣押法律规制时就曾指出,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数据具有存储内容的海量性、形态的易变性、变动的可察觉性、内容的难以直接感知性等特点^[8],因此对于电子数据的管理要求更高。由于缺乏对虚拟财产运作机制和价值归属的深入了解,很难从技术和法律层面对涉案虚拟财产的认定和证明提供充分支持。最后,在保管和处置环节,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的落地执行效果受到挑战。虚拟财产的存储和保管依赖于高度专业的技术知识和先进的加密技术,同时,虚拟财产的流动性强、价格波动大,且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其价值的确定尤为复杂。当涉及加密货币、权益代币等虚拟财产时,衍生出技术保管、资产处置等诸多问题,而现有模式缺乏有效空间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 阻断了涉案虚拟财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

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处理涉案虚拟财产时,往往阻碍了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首先,涉案虚拟财产的特性与传统财产存在显著差异,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性大,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这些特性,导致涉案虚拟财产的收集、处置和保管环节存在很多不透明和不可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相关方很难充分了解和参与虚拟财产的管理过程。其次,虚拟财产往往体量较大,流动性强,形式多变,价值不定,传统的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对涉案虚拟财产的取证、追缴和处置能力有限,存在操作困难、证据链断裂等问题,利益相关方很难有效参与这些过程中,同时,利益相关方(如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虚拟财产交易平台、应用开发商等)在涉案虚拟财产的各阶段过程中,可能面临诸如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等问题,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充分融入虚拟财产的管理过程。再次,受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虚拟财产变现存在限制,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在涉案虚拟财产取证和处置时,通常忽略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隐私权和财产权等基本权益。这种做法削弱了涉案公民的法律地位,可能导致他们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传统涉案财产管理模式下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在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可能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这导致了各利益相关方及其代理人在虚拟财产的取证、追缴和处置过程中相互之间的信息获取和沟通受到限制,使得他们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架构转型的功能需求

针对新型经济犯罪涉及的虚拟财产管理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现有的管理架构。由于涉案虚拟财产较之现实世界中的财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刑事诉讼中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管理时,既要坚持一般财产管理的基本规则,又要兼顾其特殊需求,由此提出以下四个管理架构转型的核心功能需求。

(一) 需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

保管是涉案财产诉讼全周期的重要环节。作为证据的涉案财产关涉证据链的完整性,乃至定罪量刑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作为财产的涉案财产,关涉财产价值的大小、变化及作为基本人权的财产权。我国传统上对涉案财产主要关注证据价值,对其财产价值关注较少。对于涉案财产的保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随案移送”。长期以来,涉案财产的保管一直是采用分散模式。从纵向看,刑事涉案财产随侦查、起诉、审判阶段推进,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依次流动,公安司法办案机关对涉案财产分别保管。从公安司法机关内部来看,涉案财产在传统上也是由办案机关分散保管。以公安机关为例,在侦查办案环节,传统上涉案财产由派出所、刑警队等具体办案部门各自保管,甚至由办案人员自行保管。随着涉案财产管理过程中不断暴露问题以及执法规范化发展的趋势,涉案财产的集中保管逐渐成为趋势。

实践中,我国虽然有公安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侦破涉数字资产案件的实例,但属于临时性、特殊性的举措,搭建长效的数字资产刑事处置公私协作平台方为长远之计。公安部、科技部联合部署推进的科技兴警三年计划(2023—2025年)中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创新平台建设行动,通过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培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地方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公安领域技术创新平台,探索警民创新主体有机融合模式,引导科技创新资源向公安基础研究领域集聚。这为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除此之外,作为辅助机制建设,我国还应当完善相应的法律规则并加强国际司法协作^[9]。

（二）需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

流程控制和风险管理是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架构转型的重要需求。虚拟财产的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给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在管理流程中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性。例如,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电子存证进行全链条监管,同时,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以识别异常交易行为,从而提前预防和打击犯罪活动^[10]。此外,还需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对不同类型的虚拟财产进行分类管理,明确每种财产的风险特征和管理要求,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追溯风险源头,搭建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和监督反馈手段,聚焦风险评估、事前预防、监督反馈全流程,形成管理严密的风险评估和防控体系,以提高管理效率,确保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为了实现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统一管理,应设立相应的专业性机构。在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中,积极梳理并完善涉案虚拟财产从取证、追缴、保管到处置的全过程监管;制定符合法律法规和现实情况的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确保各环节的安全可控;流程应当明确,并涵盖各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保障,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均衡保护个人财产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得到贯彻落实。

（三）需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需要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主要原因在于虚拟财产的特殊属性使得传统评估方法不再适用。与现实财产相比,涉案虚拟财产的取证难度和价值评估的复杂程度较高,创新评估方式不仅有助于展现虚拟财产在犯罪事实证明方面的潜力,还能更准确地评估其价值,从而推动犯罪所得的追缴和公平处置。

首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将极大提高虚拟财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与效率,技术进步将帮助打破传统价值评估方法所受到的技术、法律和监管壁垒。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的自动化处理与分析,通过对用户行为、交易记录等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揭示虚拟财产的使用频率、流通情况等重要信息,为价值评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实时调整评估模型,确保评估结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通过关联分析,能够揭示出虚拟财产与犯罪行为的内在联系,识别虚拟财产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为监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其次,需要建立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性的评估指

南,将法律、经济、金融、技术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方法与实践相结合。深入分析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权属关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可以为评估工作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还需要关注虚拟财产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和判决,以汲取经验和教训,为评估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使得涉案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不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更体现了现代金融创新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再者,第三方评估机构具有专业知识、独立性和公信力,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虚拟财产价值的评估过程,可以有效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靠性,提高评估效果。

最后,应依法保护涉诉人员的合法权益。相关部门在取证、评估、处置涉案虚拟财产过程中,应遵循法律原则和程序,严格遵守技术规定,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保证其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同时,评估过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将有利于提高司法程序的公信力,保证个案正义,并为地方法治和社会公正提供支持。

综上,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亟待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这一创新将有助于提高价值评估的准确性及可靠性,确保犯罪所得追缴的效果以及涉诉各方的权益。

（四）需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

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改革需在维护法治秩序、打击犯罪的同时充分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虚拟财产与数字权益联系紧密,作为管理模式改革的核心,应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和法律原则来确保公民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安全、隐私权、财产权等得以充分保障。首先,在涉及虚拟财产取证、追缴及处置环节,执法部门应遵循法律原则和程序来确保公民的法定数字权益。特别是在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下,必须遵守相关数据保护法规,确保涉案公民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其次,改革过程中应注重公平原则,确保合法权益的平衡。在犯罪所得追缴后的虚拟财产分配环节,执法部门需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救济,并确保其他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在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审判和处置时,司法部门应确保公正、公平地对待所有利益相关方。此外,管理改革还需加强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监管,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虚拟财产交易进行实名制管理,以便有效追踪虚拟财产的交易记录和流转情况。同时,设立资金阈值,限制可疑

交易行为,以减小涉案公民在虚拟财产领域所面临的风险,防止虚拟财产被用于非法活动。最后,要及时完善与虚拟财产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与此同时,教育和提高公众对虚拟财产和数字权益的认识,帮助公民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五、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的合规模式

为应对新兴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前述需求,传统分散的涉案财产保管场所升级为现代化的统一的涉案财产管理中心,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一站式管理的基本理念、权责分配和管理对象。作为现代化的涉案财产管理中心,“物的看守所”应当遵循以下模式,以实现高效、安全和透明的虚拟财产管理。

(一)一站式管理的权责

基于现代化涉案财产管理中心(“物的看守所”)的功能定位,涉案财产管理中心应当是独立、统一的。“统一”是指将公检法等办案机关分散保管的涉案财产进行集中管理;“独立”是指涉案财产管理中心独立于公检法等办案机关。为了确保一站式管理模式有效实施,权责明确至关重要。首先,一站式管理机构需负责涉案虚拟财产的整体规划与协调。这包括制定完善的政策和法规,明确规范涉案虚拟财产的取证、追缴、保管和处置程序,以及协调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提高管理效率,确保涉案虚拟财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促进不同办案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提升整体办案水平,实现高效、安全和透明的虚拟财产管理。其次,该机构应具备对相关执法及监管部门的授权。这意味着一站式管理机构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可以对执法及监管部门发布要求,保证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合规性和实时监测。授权机制应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根据法律法规设立,并明确规定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在管理中心受到有效监管的同时,保证管理中心在履行职责时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能够始终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及其专业性和权威性。

(二)一站式管理的理念

随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虚拟财产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不断增大。这一特点要求公权力机关在对虚拟财产进行查封或冻结时要格外小心,以免损坏虚拟财产数据内容,侵犯相关人士的合法权益,导致刑事訴訟的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价值目标双重受损。因

此,涉案虚拟财产的保值增值便提上了日程,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仅止于“看住不丢”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涉案虚拟财产保值增值应当成为现代化的涉案虚拟财产管理中心的功能。首先,防止涉案虚拟财产贬值。由于涉案虚拟财产往往涉及较长的司法程序,长时间的存放和管理可能导致其价值下降。例如,一些游戏币、虚拟账号等,其价值可能随时间流逝而迅速贬值。通过现代化的涉案虚拟财产管理中心,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对涉案虚拟财产进行妥善保管和维护,确保其价值不受损失。其次,保护合法财产权。涉案虚拟财产往往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管理不当,可能导致当事人的财产权受到侵害^[11]。因此,涉案财产管理中心需要确保涉案虚拟财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防止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损失或损坏,并确保涉案虚拟财产的处置和分配符合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建立多主体之间的快速反应机制,以保证在发现紧急情况时能迅速启动协同行动。设立一个相关各部门组成的应急小组,根据案情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动相关人员和资源开展协同行动。这一应急小组汇集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等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应对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挑战。这种协作模式不仅提高了虚拟财产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降低了政府的负担和风险,实现了涉案财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三)一站式管理的对象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的管理对象,涵盖广泛的虚拟财产类别,以便全面应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挑战。这些管理对象包含以下四大类:一是虚拟货币。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中,虚拟货币是最主要和典型的管理对象。其中包括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等主流加密货币,以及各种其他小众加密货币。这些虚拟货币容易跨境、匿名交易,已成为经济犯罪活动中最常见的虚拟财产形式。二是游戏内虚拟物品。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还需重点关注游戏内虚拟物品。这些物品包括游戏角色装备、游戏道具、虚拟货币及其他虚拟物品。由于游戏内虚拟物品具有一定价值,犯罪分子可能利用这些物品进行洗钱、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三是虚拟服务。包括云计算服务、网络空间租赁、虚拟私人网络(VPN)服务以及其他在线服务。这些虚拟服务被转售、出租或用于犯罪活动,给管理机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需对付费使用者进行监管,以防止

恶意行为。四是其他虚拟资产。一站式管理机构也需要关注新兴的虚拟资产类型,诸如非同质化代币(NFT)等知识产权类资产,由于其价值和流通性较高,可能成为新型经济犯罪的目标。并且,虚拟财产的衍生、变化并不会止步于目前虚拟货币、NFT等形式,虚拟财产与现实世界存在天然隔离,又具备一定的互通性,极易成为不法分子洗钱工具。由此,在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目标应当是全面应对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挑战,抓住虚拟货币、游戏内虚拟物品、虚拟服务以及其他新兴虚拟资产等多种管理对象,建立有效监管机制,防止虚拟财产被用于不法用途^[12]。

(四)一站式管理数字化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一站式管理机构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溯源技术来加强对虚拟财产的管理和监控。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工具,该管理机构将大幅提升对涉案虚拟财产来源、交易和流转过过程的追踪能力,为打击犯罪活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综合执法部门、交易平台、境外金融情报机构的共享信息,还原虚拟财产对应的犯罪主体,对现实身份、虚拟资产账户和交易场景进行串联,有效打击涉虚拟财产经济犯罪。

数字化溯源技术的核心是利用数据驱动和智能化手段,构建一套透明、可信、可验证的虚拟财产追踪体系。通过将涉案虚拟财产的产生、交易和流转过过程记录在具有不可篡改、可溯源特性的区块链上,管理机构可以实时监测虚拟财产的动态,迅速查找出虚拟财产的源头,揭示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及其违法行径。同时,数字化溯源技术还有助于管理机构从大量数据中发现犯罪活动的规律,判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例如,利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一站式管理机构可以识别虚拟财产交易的异常行为、潜在风险以及涉嫌违规操作。此外,数字化溯源技术还可以提高涉案虚拟财产取证的效率和可靠性。借助区块链、加密技术等手段,确保取证过程在合法、公正、透明的前提下进行,为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提供高质量的证据材料。

六、结语

近年来,随着新型经济犯罪的高发频发,刑事诉讼中针对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显得愈发重要。而现行法律并未就涉案虚拟财产管理问题作出专门性规

定,通常以各地方自行探索和完善为主,因此,管理问题经常出现操作程序上的冲突与矛盾,这既不利于刑事司法机关办案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对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进行保护与事后救济。《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已经列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属于第一类项目“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13]。涉案财产制度改革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问题,公检法各方均给予了重点关注并积极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做准备。应以此为契机,积极完善涉案虚拟财产的管理模式,在遵循数字正当程序与数字人权的基础上,探讨涉案虚拟财产管理的法律规范进路。

参考文献:

- [1] 郑曦,段旭东. 刑事诉讼中涉案虚拟财物的处置:以元宇宙场景为例[J]. 阅江学刊,2022(3):51-58.
- [2] 余剑. 财产性数据的刑法规制与价值认定[J]. 法学,2022(4):78-87.
- [3] 韩红兴,王然. 论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处置程序的构建[J]. 犯罪研究,2023(3):82-90.
- [4] 新浪科技. 德国检方没收诈骗犯6000万美元比特币但破解不了密码[EB/OL]. (2021-02-05)[2024-03-15].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2-05/doc-ikftssap4267596.shtml>.
- [5] 李班. 涉案财物管理监督机制建设初探[J]. 公安研究,2022(2):41-46.
- [6] 田力男. 刑事涉案虚拟财产强制处分论[J]. 中国法学,2023(5):111.
- [7] 陈旭琴,戈壁壁.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J]. 浙江学刊,2004(5):143-147.
- [8] 陈永生. 电子数据搜查、扣押的法律规制[J]. 现代法学,2014(5):111-127.
- [9] 马明亮,徐明达. 数字资产刑事处置的公私协作平台建设[J]. 数字法治,2023(4):127.
- [10] 陈刚. 大数据时代犯罪新趋势及侦查新思路[J]. 理论探索,2018(5):109-114.
- [11] 洪刚. 数字平台犯罪治理责任的检视与完善[J]. 法律适用,2023(10):70-80.
- [12] 胡云腾,周维明. 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23(4):233-245.
- [13] 李玉华.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涉案财物制度改革[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24(2):92-10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haping Model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se – Related Virtual Property in New Economic Crimes

WEN Jiazhu¹, HONG Gang²

(1. School of Law,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2.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China Judicial Big Data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roperty involved in new types of economic crimes is generated and stored in virtual formations. However, China's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virtual property are in a blank state, and judicial practice varies. Virtual property in new economic crimes is characterized by centralization, anonymity, cross – border nature, etc.,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mode leads to the neglect of the specificity of the means of custody of the virtual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cas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technicality from collection to executi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rovability of the facts of the crime, and the blocking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terested parties. In order to meet this challenge,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for unified management, control the means and risks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nnovate the assessment of proof of value, and protect the digi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itizens involved in the case. To this end, a one – stop management model is advocated, and the concept,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object and digital management method of the one – stop management model are clarified.

Key words: new economic crimes; virtual property involved in cases; one – stop management mode; digital management

(上接第 39 页)

Practical Impact and Explo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CHEN Yij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urbaniz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and deepen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stage in the 21st centu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advocates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 more multifaceted and specific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mean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api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cause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resulting resource resettlement may not necessari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ization, and there have also been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residents' concep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ther aspects due to insufficient strength, intensity, and efficiency,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stag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ul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concept implementation, system improve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evention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and should implement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with ecologi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urbaniz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及其应对

张玉洁,王智能

(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作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有助于提高政府间政务数据的流转效率和政府工作效率,但现有制度制约着政务数据共享整体效能的实现。政务数据在共享实践中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难题:政务数据权属难题;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我国在政务数据共享实践及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基于政务数据“国家所有”来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以及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进行法律应对,从而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关键词:数字政府;政务数据;数据共享;法治难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8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48-07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务数据共享实践的不断推进,有关政务数据共享所面临的法治难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所有的这些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务数据本身存在的权属界定难题。关于此问题,有学者提出政务数据应当以数据来源主体为基础划分标准确定所有权^[1],也有学者将数据资源视为国有资产,认为政务数据应当属于国家所有^[2]。如何构建兼顾流通效率和权益保护的政务数据权属结构成为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二,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存在划定模糊的问题。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政务数据按照共享类型可以划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种类型。然而,有学者提出目前采取的三分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程度不够,从而提出两分法^[3]。囿于实践中对政务数据的划定不明确和不合理,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面临阻碍。第三,不同地域不同部门之间,由于物理空间和组织结构等因素,面临着政务数据共享时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困难。需要回应的是:如何确定政务数据权属?如何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的共享

类型?如何应对政务数据共享时的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如何更好地使政务数据共享助力数字政府建设?本文立足于当前政务数据共享的实践现状,将对以上法治难题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法律应对进行回应。

一、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存在的法治难题

(一)政务数据共享存在权属难题

政务数据共享时存在的权属难题主要是政务数据所有权界定不清晰,此难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的实现。政务数据资源所有权是政务部门实现对政务数据资源占有、使用和处分权利的基础。因此,政务数据权属明确与否对于政务数据能否实现有序高效共享十分重要。然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未就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应。政务数据权属制度顶层设计的缺位,导致地方在实践中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以“政务数据”为关键词,通过“北大法宝”检索现行有效的地方文件,得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共91份。其中明确政务数据资源

收稿日期:2024-05-29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新时代广州公共安全应急框架体系研究——以‘公共数据安全’为例”(2023GZYB70)

作者简介:张玉洁(1986—),男,河北石家庄人,法学博士,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法学、法理学。

归国家所有的文件有6份,明确政务数据资源归属政府的有6份,余下79份文件未就政务数据权属的界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就政务数据权属界定这一问题的应对存在较大差异。政务数据资源所有权不明确与不统一将对政务数据共享造成如下难题:第一,政务数据权属不明将导致政务部门对政务资源所有的合法性产生争议,基于政务数据政府所有论,某一政务部门认为某项政务数据来源于本部门的职权,属于该政务部门的“私有财产”,进而不愿意与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从而形成“数据孤岛”,这与《办法》中“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即“尽可能共享”)的原则性规定相悖;第二,政务数据权属不明将导致政务数据共享时政务部门之间的权益难以划分,在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用的背景下,基于政务数据国家所有论,无论数据如何共享,数据的收益分配权应当属于国家,实际收入应当计入国库^[4],而基于政务数据政府所有论,政府可以基于本单位对政务数据的所有权主张获得收益,将会产生跨地域或者跨层级共享数据的收益分配争议问题;第三,政务数据权属规定不统一,部分地方将政务数据资源归属国家所有,而部分地方则将政务数据资源归属政府所有,则无法回应政务数据权限在不同层级的政务部门之间如何划分的问题^[5],造成政务数据共享管理混乱,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不利于实现政务数据的有序共享。因此,为了发挥政务数据共享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亟须对政务数据的权属结构进行明确。

(二)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体现在其划定不明确与不合理,此问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的实现。就其划定不明确问题,尽管采取三分法的《办法》已经划分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三种共享类型,但并未对其范围进一步明确划定,仅仅对“不予共享”的法律依据要求等内容有所规定。虽然地方共享实践中也基本采取了这一划分方法,但各地在三分法之下的具体划定仍不明确,该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部分地方就共享类型划分采取的规定过于概括。以《广东省政务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为例,该文件第18条将“无条件共享”的政务数据规定为“可提供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的政务数据资源”。其他多地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概括表述,这种表述所规范的“无条件共享”范围模糊。尽管可以基于“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通过设定条件要求“有条件共享”和“不予

共享”需要提供有关依据,以排除例外情形的方式确定“无条件共享”的范围。但是“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的范围仍然存在相当的模糊性,“无条件共享”的范围依旧难以确定。

第二,地方就“有条件共享”以及“不予共享”所设定的准用性规则不一致。例如,尽管《办法》已经就其准用性规则进行了规定,但是河北省仍然要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不予共享”的范围,其明确程度显然不及《办法》规定。此外,地方之间的准用性规则也存在差异。比如广东省“不予共享”的准用性规则包括“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而河北省则规定为“有关法律法规”,二者之间在规章能否成为准用性规则方面产生了不一致,不利于政务数据的有序共享。究其原因,在于《办法》中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缺乏明确的划分标准。明确性的法律规范可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6],倘若不明确划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政务数据的共享也将囿于可操作性难题而难以推进。就其划定不合理问题,体现在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在性质上具有双重性,既应当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的规制,也应当受到政务数据共享有关规定的规制,而二者的价值导向却不相一致。

基于上述讨论,学界认为现行制度下政务数据类型划分采取的三分法不合理,应当采取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和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的两分法^[3]。此观点主张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以不共享为原则,突破了“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将使得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进行共享以获得合法授权或者进行合职责性判断为前提。尽管基于现有的三分法框架,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定作为“不共享为例外”的依据,在不突破“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能够对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进行规范。然而,此时仍然无法回应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足够与否,三分法划定的合理性仍需进一步讨论。

(三) 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

传统的部门间政务信息的共享受限于物理空间和科层制组织结构,存在着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难题^[7]。尽管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政务信息”的共享正转变为“政务数据”的共享,传统的协同难题似乎能随着数据的快速流转变换从而获得解决方案,但是物理空间上难以跨越的距离阻碍以及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所经历的数字化转型仍然使得政务数据的共享面临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难题。就政务数据共享的跨地域协同难题,问题之所在已然不是传

统的通信手段带来的技术上的落后,而是政策实施所存在的地域性差异,包括地方基于属地管理原则与本地利益的考虑就政策的具体实施存在差异,以及政企合作背景下形成的“政企绑定”模式导致因合作企业的差异构筑起政务数据的地域壁垒^[3]。政务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协同难题,包括同一层级各部门与不同层级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难题。基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下进行的政务数据共享,由于政府上下级之间存在严格的层级关系与权限界限,导致上下层级部门之间或者同层级部门之间政务信息共享效率低下。尽管数字政府的层级关系由科层制正转向更能适应治理效率要求的扁平化模式,政务信息的共享仍然因包括共享存在信任成本、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共享机制不健全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面临着协同难题^[8]。就以上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治理组织模式存在差异性。目前,我国政务数据治理组织模式兼有分布式治理与集中式治理二者的特征。在中央层面,随着国家数据局的设立,由分布式治理为主转向分布式治理与集中式治理共存的混合模式。而在地方层面则以集中式治理为主^[9]。其中,数据管理机构是集中式治理的重要体现。

就地方而言,实践中省级数据管理机构大致是通过职能整合设立新机构或者对其他机构赋予数据治理职能并挂牌两种途径成立的^[10]。以省级数据管理机构为例,在单位性质方面,省级数据管理机构的性质包括事业单位、直属机构、管理部门或者挂牌机构,不全然一致。集中式治理模式产生的纵向差异体现即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政务数据共享的衔接沟通障碍,横向差异体现即政务数据跨地域共享时数据管理机构在职责等级方面存在不协调,以上两类差异共同导致政务数据共享时的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为此,有许多观点主张借鉴域外经验引入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加强政务数据的共享管理,然而,政务首席数据官本身也存在着任职和考核的制度不确定性风险,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能否应对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的需求,需要对其进行法理分析。

二、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的争论、共享类型划定两分法对三分法的否定以及引入首席数据官制度回应协同难题的观点,关涉数字政府建设中行政壁垒、行政效能提升等问题。为此,需要对政务数据共享法治难题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 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在实践中的表现即政务

数据存在政府所有和国家所有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理论上,不仅存在着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两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主张以数据来源论回应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数据来源论主张根据数据来源的不同,政务数据还可以归属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1]。政务数据在权属安排上各派观点的不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务数据兼有公权属性与私权属性。有学者以政务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与否为标准区分出公共性和私有性的政务数据^[11]。实际上,政务数据是公权性与私权性的统一。其公权性的一面体现在政务数据是由国家或政府代表的公权力对其行使管理和控制的数据。而其私权性的一面则体现在政务数据涉及私主体的有关权益。比如户籍信息、税务信息等作为实践中共享需求较大的一类政务数据,一方面其数据来源为私主体自身或者与私主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类数据一旦在共享的过程中被滥用或者泄露,将对私主体的权益造成损害。倘若考虑其私权性的一面,按照数据来源论以数据的来源主体确认归属,权属难题将仍然存在。以交通违法数据为例,该项数据既是由交通参与者实施交通违法行为生成的数据记录,也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监测设备获取生成的数据记录。这种情况下,该项交通违法数据究竟是归属于交通违法者?还是归属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数据来源论难以回应这些问题,进而也无法对私权益的保护这一命题做出回应。

上述数据来源论的观点显然存在漏洞,对政务数据共享中私主体权益的保障应当另寻可行路径。若是考虑其公权性的一面,将其归属于国家或者政府,固然能够有利于政务数据共享在安全且合规的环境下进行,但是在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用的场景中,作为数据来源的私主体获得收益的权利将由于分配成本极高等原因从而难以得到实现^[4],政务数据授权运营的收益在各政务部门间如何合理分配仍然不明晰。此时,为选择适于数据收益合理分配的权属方案,可对政府所有论和国家所有论进一步进行分析。政府所有论以劳动财产理论和数据的公共资源法律性质作为法理基础,进而以明晰政务数据权利的民事权利客体属性、明确政府有关法律义务等内容作为其制度意义^[12]。相比之下,国家所有论主张由国家突出其作为政务数据“所有者”的优势,调节数据资源的配置,从而能够有效解决公共数据合理利用与公平分配难题^[13]。

实际上,通过对制度的进一步设计完善,国家所

有论同样能够对政府有关政务数据的法律义务进行明确,同时也能回应政务数据共享中私主体权益保护的命题。因此,笔者认为国家所有论为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难题可行的解决路径。然而,此时仍然需要回应政务数据权限和权益划分的难题。比如,政务数据的共享涉及政务数据的具体管理职能的分配问题,某一政务部门是否具有使用共享数据的权限的问题,以及授权运营之下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以上问题关涉政务数据的管理、使用和收益。为此,应当在明确政务数据国家所有的基础之上,对政务数据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进一步进行制度设计和完善。

(二)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的法理分析

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即目前实践中采取的三分法划定出的共享类型不明确、不合理。就其划定不明确问题,在于划定过于概括以及准用性规则不一致两个方面。其不明确性意味着政务数据共享缺乏明确规范的指引,从而产生了可操作性难题。这一难题体现在政务数据共享时,难以依照法律法规确定某一政务数据属于的类别,进而难以确定其应当共享与否以及应当采取的共享方式。可操作性难题将导致政务部门在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的判断方面获得了相对大的裁量空间,也意味着政务部门在政务数据的共享方面被赋予了较大的行政裁量权。

由于尚未建立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标准,各政府部门仍然是自己的“守门员”,可以自主决定政务数据共享与否以及自主设置共享条件。当共享裁量权不当行使时,将可能大大增加权力恣意的风险^[14]。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行政法的中心任务就在于通过法治的方式有效解决行政裁量问题。^[15]尽可能缩减乃至彻底消灭裁量权并不是有效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可行路径,为发挥政务数据共享的积极作用,应当在充分保障政府自主积极共享政务数据的基础上适当限缩其共享裁量空间,进而回应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不明确问题。就其共享类型不合理问题,主张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原则上不共享以及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原则上无条件共享的两分法^[3],剔除了“有条件共享”类型,政务数据的地域属性、涉密属性以及共享部门的职权范围等关乎政务部门能否对其共享的条件因素无法通过该划分方式得以直观体现。因此,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理念的两分法有一个显著的弊端,即过度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在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中的重要性,从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因素之于共享类型划分的重要意义。

至于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足够与否这一问题,其实基于目前采取的三分法,以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规定作为“不共享为例外”的依据,便能够实现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范不应当共享的涉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不予共享。两分法划分出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而后再分类处理。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以不予共享为原则,同时以符合有关规范为有条件共享的合法性依据。而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最终仍需通过三分法进一步进行划分。实际上,两分法的支持者所提出的重塑方案不过是将政务数据涉个人信息与否这一判断进行了前置。在此意义上,三分法和两分法之间的差异在于对政务数据的个人信息属性确认顺序的先后有所不同,其最终目的实际上仍然集中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所谓突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二分法实际上是更复杂的另一种形态的三分法。综上所述,三分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足够。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问题的应对重点仍然在于通过明确制度规范从而进一步完善三分法之下的政务数据类型划定。

(三) 政务数据共享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的法理分析

跨地域跨部门协同难题在于现有的政务数据治理组织模式下各政务部门的统筹协作能力无法满足当下政务数据共享的需要。基于整体性政府理论,数字政府建设中应当加强各政务部门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的协同合作,包括在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协同合作。为此,有观点主张应当引入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所谓政务首席数据官,其核心在于通过专门的机构或人员来负责政府数据处理工作。^[9]该制度也被认为是能够为政务数据共享提供有效组织保障且可为我国采取的可行制度路径。而在此之前,需要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以确认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具备引入我国的理论基础。其一,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能够弥补目前政务数据共享中统筹协作性的不足。统筹协作性不足的原因在于政务数据共享的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这种情况也被称为结构性失能。^[16]政务首席数据官能够发挥跨地域沟通协调作用,就“政企绑定”产生的数据地域壁垒,政务首席数据官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发挥沟通对接作用的方式予以应对。此外,政务首席数据官作为跨部门沟通协调的关键人物,通过担任各政务部门间交流沟通的中间人,从而逐步消解政府部门间的信任壁垒,实现政务部门间信任度与政务数据共享程度的相互促进。因此,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是当下政务数据共享的现实难题的合

理回应方式。其二,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存在任职和考核的制度不确定性风险。这一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应当由谁担任政务首席数据官。政务首席数据官本身需要发挥统筹协作政务数据共享的作用,倘若由政务部门的领导人员特别是负责政务数据工作的领导人员兼任这一职位,显然在政务数据的共享中更能够发挥出统筹协作作用。然而,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具有鲜明的技术特征,既有需要居中调度的一方面,也有需要应对技术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因此,也有观点指出,应当安排兼具管理协调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人员担任这一职位^[16]。这种观点认为首席政务数据官制度的不确定性风险在于其所需要兼具技术能力和统筹协作能力人才的培养、保障和考核体系暂时缺位。关于政务首席数据官的人选问题,还有方案提出,可以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或者选拔专家学者借调挂职的方式确定这一职位的人选^[9]。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偏离了政务首席数据官职责的重点。实际上,政务首席数据官这一职位工作的重点任务应当在于应对政务数据共享的跨地域跨部门的协同难题,因此在确定其人选方面,应当更为重视其在政务数据共享方面起到的统筹协作能力。要求政务首席数据官兼具相当的技术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有助于应对政务数据共享时突发的技术性问题,但基于专业分工理论,政务数据共享中的技术性工作完全可以由专门的技术人才负责,政务首席数据官承担起统筹协作工作的职责便可。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通过规范完善人才考核评价制度,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所存在的风险可以得到一定程度地消解。

综上所述,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在理论上具备引入我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基础,而如何使政务首席数据官制度符合应对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的现实需求,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设计。

三、数字政府中政务数据共享法治难题的法律应对

为推进数字政府的法治化建设,有必要对制约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予以法律应对的回应。为此,可以基于“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以及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以实现政务数据共享的积极效能。

(一) 基于“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

为回应政务数据共享权属问题,应当基于政务数据国家所有论,在确认政务数据所有权归属于国家的基础之上,从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三个方面

出发构建政务数据的权属结构。

其一,关于政务数据管理权,应当规定由政府享有和承担政务数据管理权责。各政务部门管理本部门内的政务数据,县级以上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对其管理区域内各政务部门的政务数据统筹管理。就政务数据共享中各政务部门之间出现的争议问题,根据所涉政务数据所属的管理部门的不同分别处理。所涉政务数据属于同一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管理的,由该政务数据管理部门进行处理;所涉政务数据属于不同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管理的,由具有管理权的各政务数据管理部门之间协调处理。

其二,关于政务数据使用权,应当规定政务部门有权依照其法定职权和实际业务的需要使用其他政务部门共享提供的政务数据。政务数据使用权行使的流程如下:首先由需要申请使用的政务部门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向政务数据管理部门提交共享使用政务数据申请,申请应当包括需求原因、职权依据和使用安排等内容。然后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审核该共享使用申请。对于符合共享条件的申请,应当在能够满足使用需求的最小范围内提供有关政务数据给申请使用部门。对于不符合共享条件的申请,应当将不符合条件的情况向共享申请部门予以说明。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数据,申请使用的政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申请需求使用。

其三,关于政务数据收益权,应当确定该项权利由国家享有。对于政务数据授权运营使用产生的收益,应当对数据来源者、运营者和国家分别进行制度安排,实现政务数据收益的合理分配。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主体在内的数据来源者不直接参与收益的分配。可以根据授权运营的产品或服务的特点,采取为数据来源者使用相关产品或服务设置豁免机制的方式,间接保障数据来源者的获取收益的权利。对于运营者而言,应考虑其投入的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资源成本以及其所承担的技术风险和商业风险等各类风险,按照贡献适当确定其应得收益并进行分配。但政府不是政务数据收益权主体,仅负责具体执行相关收益的分配工作。政务数据通过授权运营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实际收益最终应当归入国库。

(二) 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

为应对政务数据共享类型划定模糊问题,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规范界定。就其不明确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三分法划分之下的政务数据类型。

其一,关于“无条件共享”类型。应当明确基础信息类政务数据和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由两个

以上政务部门并联审批的政务数据属于“无条件共享”的政务数据。如自然人基础信息、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基础信息、公共服务信息、公开空间地理信息等属于基础信息类政务数据。其中,需要明确的是,自然人基础信息包括自然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证照号码、户籍地址等信息,不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基于政务数据共享的效率性需要,还应当明确并联审批类政务数据属于“无条件共享”的范畴。如税务信息、不动产信息等政务数据在需要并联审批的情形下,应当按照“无条件共享”的类型予以共享。列入“无条件共享”类型的政务数据,除存在“有条件共享”或者“不予共享”的例外情形,应当共享。

其二,关于“有条件共享”类型。对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合法权益的政务数据,应当设置共享条件。共享申请部门依法具有获取该政务数据的权限为必要条件。同时,还应当根据政务数据的不同特点针对性设置共享前提条件。例如,涉公共安全的政务数据共享还应当以共享后的用途不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为共享的前提性条件,涉商业秘密的政务数据共享还应当以共享后该信息的用途不会造成该商业秘密被侵犯为共享的前提性条件。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以及通信内容等信息在内的涉个人隐私的政务数据,应当以取得该自然人知情同意为共享的前提性条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审核共享申请部门是否符合该数据共享条件并做出是否同意共享的决定。

其三,关于“不予共享”类型。涉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等政务数据应当明确列入“不予共享”的政务数据当中。由于“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类型的划分应当以具有明确的准用性规则为前提,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对于三分法之下有关准用性规则进一步明确和统一。可以规定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有条件共享”以及“不予共享”所依照的统一准用性规则。在准用性规则出现冲突的情况下,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确定所采取的准用性规则。

(三)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

为了应对政务数据共享协同难题,应当设立政务首席数据官,构造政务数据管理部门与政务首席数据官共同承担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的政务数据共享管理模式。

首先,应当对政务首席数据官的设立制度进行规范。政务首席数据官在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和政务部门分别设立。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应当在本部门设

立政务首席数据官,由本级政府分管政务数据工作的领导人员兼任。各政务部门根据自身实际的业务需要,可以在本部门设立政务首席数据官,由本部门负责政务数据工作的领导人员兼任,并由本部门进行任免,其任免情况应当报政务数据管理部门备案。

其次,应当对政务数据共享管理主体的工作机制进行明确。关于政务数据管理部门、政务部门与政务首席数据官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应当明确政务首席数据官接受“双重领导”。一方面,政务首席数据官接受本级政府或本部门的行政首长的领导;另一方面,下级政务首席数据官同时还要接受上级政务首席数据官的领导。基于“双重领导”体系,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统筹协调本部门管理范围内的政务数据工作,并向本级政府汇报政务数据管理工作,参与本级政府的政务数据治理决策。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负责本部门内部的政务数据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本部门政务数据对外的共享、开放等工作。关于政务首席数据官之间的工作机制,应当建立政务首席数据官沟通协作机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定期召开由本地区各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参与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对本地区本部门的政务数据工作进行沟通。对于政务数据共享中出现的专项问题,如某项政务数据在跨地域共享时遇到的沟通协作困难,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组织各有关政务部门的政务首席数据官成立专项问题沟通协作小组予以处理。

最后,应当建立政务首席数据官年度考核评价机制。由政务数据管理部门负责政务首席数据官的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指标应当包括政务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保护、专项问题应对、共享工作效率和合乎程序情况以及数据共享部门和数据被共享部门对政务首席数据官履职情况的评价等内容。政务首席数据官应当根据考核评价结果改进其工作。

四、结语

数据共享在政府工作中的应用实践,既为数字政府的数字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数字政府的法治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是国家长治久安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权必须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内行使。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要求行政法对于数字政府中的法治难题予以回应。作为数字政府中的重要环节,政务数据的共享也应当在法治化的制度框架下运行。为此,本文对政务数据的权属难题、共享类型划定模糊以及跨地域跨部门共享协同难题制约政务数据有序高效共享的法

治难题进行剖析并予以回应。为了回应政务数据授权运营背景之下数据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如何在数据相关的各个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需要基于“国家所有”构建政务数据权属结构,对政务数据共享的管理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内涵进行明确。为了明确政务数据共享类型的划定,需要在兼顾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规范界定政务数据共享类型。为了回应政务数据跨地域跨部门共享的协同困境,需要设立政务数据共享管理职能主体,明确政务首席数据官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制度定位。由于数据共享相关技术应用时间较短,我国政务数据的共享实践正在推进之中,政务数据共享所面临的更多的法治难题仍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与回应。

参考文献:

[1] 冯延有.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难题及其破解[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3(3): 101 - 106.
[2] 邢会强. 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与救济机制[J]. 行政法学研究, 2021(4): 41 - 54.
[3] 彭鐸. 论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与边界[J]. 交大法学, 2023(6): 63 - 77.
[4] 马颜昕.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类型构建与制度展开[J]. 中外法学, 2023(2): 328 - 345.
[5] 卢荣婕, 周佑勇. 政务数据产权的界定标准[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23(6): 72 - 84.

[6] 郭忠. 法律规范特征的两面性: 从法律目的实现的角度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 2012(6): 50 - 56.
[7] 马长山. 数字法治概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22: 128.
[8] 游路. 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现实难题与法治保障[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8): 64 - 74.
[9] 张涛. 数据治理的组织法构造: 以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为视角[J]. 电子政务, 2021(9): 58 - 72.
[10] 孟庆国, 林彤, 乔元波, 等. 中国地方政府大数据管理机构建设与演变: 基于第八次机构改革的对比分析[J]. 电子政务, 2020(10): 29 - 38.
[11] 连玉明. 数权法 3.0: 数权的立法前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07.
[12] 赵加兵. 公共数据归属政府的合理性及法律意义[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1(1): 13 - 22.
[13] 张玉洁. 国家所有: 数据资源权属的中国方案与制度展开[J]. 政治与法律, 2020(8): 15 - 26.
[14] 孙丽岩. 政府数据开放范围裁量权的法律控制[J]. 法学家, 2022(5): 44 - 57.
[15] 周佑勇. 行政裁量的治理[J]. 法学研究, 2007(2): 121 - 132.
[16] 华子岩. 政府数据共享话语下首席数据官制度研究[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33 - 4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Legal Problems and Legal Responses to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in Digital Government

ZHANG Yujie, WANG Zhineng

(Law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 government data circulation and government work. However, the existing system restrict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practice mainly faces three problems: firstly, the problem of ownership of government data; secondly, the classification of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types is vague; thirdly, the problem of cross regional and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n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draws on foreign experience to pro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data ownership structure based on "national ownership", further standardize and define the types of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and establish functional entities for government data sharing management for legal respons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gital rule of law government.

Key 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government data; data sharing; legal problems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陈莉莉, 赵梦雅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09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55-06

“在国际医疗界声名鹊起”^[1]的诺尔曼·白求恩,于1938年带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尽己所能挽救中国军民的生命、促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发展,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少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服务的知名外国医生之一,白求恩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展开对白求恩的纪念。目前学界关于白求恩的研究主要侧重对白求恩生平事迹的考察以及白求恩精神的研究,较少涉及纪念史层面,尽管也有学者从纵向角度探析纪念话语表达中的白求恩形象^①,但缺乏对抗战时期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整体考察。抗战时期的白求恩纪念活动鼓舞了全党全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英勇奋斗,对其系统考察不仅从纪念维度还原了历史的丰富面向,也为新时代开展人物纪念活动提供了经验参考与实例借鉴。

一、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历史背景

白求恩纪念活动是在抗战时期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展开的。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

的野蛮侵略之际,国际局势日趋复杂多变,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益连成一个整体。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部分爱好和平的人士跨越国界阻隔,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白求恩作为援华人士中的一员,在国共密切合作时期顺利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于中国的抗战事业。白求恩牺牲时国共两党关系已经发生剧烈转折,统一战线面临严重威胁。1939年10月,毛泽东指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2]¹⁴⁴国共摩擦加剧对中国共产党获取国内外援助产生不利影响。1939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反映“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从纽约给医疗队汇钱,宋庆龄先生也从南方设法运了一批药品来,有些外国的和中国的外科医生也曾极力想法到敌后来,但是这一切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扣留了”^[3]。通过纪念白求恩来铭记白求恩的卓越贡献,既彰显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援华力量

收稿日期:2024-04-21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仪式建构及其历史经验研究”(22BDJ043);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延安时期中共纪念仪式与政治认同研究”(2021GGJS039)

作者简介:陈莉莉(1981—),女,河南荥阳人,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的高度重视,争取更多人冲破封锁抵达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白求恩纪念活动也体现了边区在医疗卫生资源匮乏情境下对医务人员的格外珍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长期处于恶劣境地,严重影响到部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白求恩生前工作的晋察冀边区也不例外。聂荣臻后来谈到晋察冀边区时曾言:“几年的战争,姑勿论给养弹药之困难,而医药的缺乏,医疗技术的贫弱,长时期曾经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4]直到“白求恩大夫来军区热心帮助我们,担任军区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5]。尽管在白求恩的热心帮助下边区医疗工作渐有起色,但在白求恩大夫逝世后,医术高超大夫的匮乏仍然是摆在根据地面前的难题。根据地医疗救护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战士的生命能否得到可靠的救治,更会影响到根据地政权的巩固。这一时期在此背景下宣传、纪念白求恩大夫,一方面吸引医务工作者奔赴边区,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对培养白求恩精神引领下医术高超、医德卓越医务人员的迫切需求。

二、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主要形式

白求恩牺牲于晋察冀边区后,为铭记其对中国抗战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纪念主题、着重宣传事迹、阐释价值意义的纪念活动,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刻画出白求恩的鲜明形象,有助于巩固民众的集体记忆,凝聚团结抗战的共同意志。

(一) 致电哀悼

致电哀悼作为一种能够跨越遥远空间距离的纪念形式,其便捷性与实时性减弱了空间距离对纪念效果的制约。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哀悼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白求恩的高度重视。1939年白求恩逝世后,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概述了白求恩来华参战的事迹,指出:“我全党同志,全国同胞,须知白求恩大夫实伟大的英国民族之光荣的代表。”^[6]这一论断从国家民族高度对白求恩极尽赞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期许。1939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向其家属发慰问电。”^[2]^[146]此后多方致电白求恩家属,以示缅怀和宽慰之意。11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慰问白求恩家属时再次回顾了白求恩在华的工作生活,对其作出高度评价:“我们悼念白医师为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与对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表示深切的敬

意。”^[7]同一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慰问白求恩家属,对白求恩的不幸离世深表哀悼,指出“敝军将士,闻此噩耗,莫不深为哀痛!盖此不仅我国抗战之一大损失,亦世界人类解放事业之大损失也”^[8]。12月1日,延安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会以集体名义表达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哀悼与敬仰之情:“全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均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与全世界人民之重大损失,极表哀痛。”^[9]中共中央及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致电哀悼为纪念白求恩定下基调,不仅全面总结了白求恩的伟大贡献,也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二) 召开追悼会和纪念大会

追悼会和纪念大会参与人数众多,寄托着民众对白求恩的无尽哀思。接收到白求恩死讯之后,延安各界积极筹备追悼大会,决定“以滕代远、饶正锡、马海德等八人组成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会”,并提出“望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踊跃参加”^[10]追悼仪式。白求恩生前曾救治几千战士,积极治疗群众的伤病,其医德与医术颇受军民尊敬,当他逝世后,“在八路军前后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追悼会”^[11],传递着军民的真挚思念与哀悼。1939年12月1日,备受瞩目的白求恩博士追悼大会正式举行,延安各界代表纷纷聚集于中央大礼堂,“沉静而肃穆的空气,笼罩着整个会场”,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等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追悼会即将结束时“一片纪念白求恩同志的口号,高呼在追悼者群的口中,这不是简单的追悼,而是后者要向前者来学习的积极的表示”^[12]。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出席表明对白求恩追悼大会的高度重视,也有利于悼念中对民众进行精神洗礼和思想教育。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召开的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开会时由音乐队奏乐和挽歌队唱追悼歌,接着行祭礼,献花圈,军区聂司令亲读祭文并报告白大夫生平”^[13]^[294]。在严肃悲壮的氛围中,万余人聚集默哀,沉重悼念白求恩的离世。同年,于白求恩逝世周年之际,“八路军卫生部及后勤政治部特于大礼堂召开大会以资纪念”^[14],朱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发扬白求恩精神。1941年11月13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同边区各医药卫生机关在中央大礼堂举办纪念白求恩大会,由中央军委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饶正锡报告“白求恩生平功绩及二年来白氏的精神在八路军卫生工作中的影响”^[15]。追悼会和纪念大会现场沉重肃穆的氛围唤起民众对白求恩的悼念之情和学习白求恩精神

的热情。

(三) 领导人题词

题词是以言简意赅的方式评述他人或表述思想,简短而富有深度的题词语意清晰、便于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白求恩的题词蕴含深刻的政治意蕴。1939年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挽词为:“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21]47}毛泽东的题词构成白求恩精神的基本内涵,也成为边区各界的学习指南。白求恩遗体安葬之后,1940年5月晋察冀军区修建题词碑刻,中共中央委员会题词“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聂荣臻题词:“大众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吕正操题词:“人类解放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舒同题词:“永远不灭的光辉。”^[16]这些题词各有侧重,主要通过对白求恩个人品质或职业生涯的简要评述表彰其功绩,赞赏其美德,进而号召人民群众在对白求恩的纪念中虚心学习白求恩精神,尤其是学习其国际主义精神,学习其超越狭隘的民族偏见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精神。

(四) 撰写纪念文章

撰写纪念文章是表达作者情感的重要媒介形式。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文章记述与白求恩的亲密接触,书写对白求恩的印象,不仅塑造了白求恩的立体形象,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白求恩精神宣传活动。通过纪念文章,群众在信息传递和接收中对白求恩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从而形成情感共振和价值共鸣。白求恩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各方人士纷纷撰写回忆文章。1939年11月25日,马海德撰文详述白求恩的生平事迹,表明坚决抗日的主张;1940年1月5日,晋察冀边区万人追悼白求恩大会上,聂荣臻宣读的《祭白求恩文》兼具文采与情感,内容丰富,生动感人;饶正锡撰文纪念白求恩逝世二周年,着重总结白求恩精神的现实影响;朱德在白求恩逝世三周年之际作《纪念白求恩同志》一文,回忆其生平事迹,褒扬其伟大精神,赞赏其人性光辉;曾被白求恩手术救治过的李得才深情回忆与白大夫之间的往来,坚称:“白求恩大夫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是他的闪光的思想、伟大的精神永远活着,他永远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救命恩人。”^[17]众多白求恩纪念文章的发表使白求恩的高大形象及白求恩精神在撰写中彰显、在传播中永恒。

(五) 场馆纪念及冠名纪念

以白求恩命名的建筑作为激活历史文化记忆的

物质性载体,兼具时间延展与空间联结的特征,是纪念符号体系的一部分。其中陵墓承载着文化记忆与民众情感,是回顾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纪念场所。白求恩逝世之后,“1940年2月,晋察冀军区决定为白求恩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以此来永久地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18]4},尽管后来战火纷飞中陵墓损坏,但“到1942年春,边区又组织人力,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了修复”^{[18]9}。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学校也体现了对他突出贡献的铭记和缅怀。白求恩生前“组织了一个模范实习医院,他主持了五台山第一个医务训练班,他又是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19],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以助力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白求恩逝世之后,“一九四〇年初,为了纪念他,创立了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卫生学校”^[20]。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后“将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为永久的纪念”^[21]。时任院长的鲁之俊对医院更名之后的反响印象深刻:“全院同志都感到非常光荣,受到很大鼓舞,都决心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以‘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建设好医院。”^[22]1943年和平医院决定除“创造白求恩模范工作者的竞赛运动外,将以具体工作成绩来纪念他”^[23],这一行为凸显了白求恩纪念活动的时代价值。

此外,还有白求恩纪念歌、纪念戏剧等其他纪念形式。中国共产党从不同维度纪念白求恩、宣传白求恩,白求恩的光辉形象经由纪念活动成为边区军民的集体记忆,在现实中发挥着积极的正向功能。

三、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的功能

面对抗战时期严峻的国内外局势,白求恩纪念活动承担着重要的思政育人功能。通过人物纪念中主观的情感激发与客观的事实呈现,不仅推进了抗战工作以及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具有特殊意义。

(一) 动员群众积极抗战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4]511}中国共产党充分重视群众力量的发挥,将白求恩纪念活动作为宣传动员群众、激发群众抗战斗志的重要一环。对于文化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边区民众而言,通过纪念活动的情感动员传达政治策略是一种有效方式。“白大夫的死,是中国抗战的损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损失,是全世界医学界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以抗战最后胜利来纪念这位为和平为正义为全人类解放而

牺牲的战士。”^[25]人们在沉痛的哀悼中，“是已经下定决心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使他致死的间接原因——赶出中国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弥补这一个巨大的损失”^[26]⁶，以此激发军民的抗战斗志。曾与白求恩有过接触的记者黄薇发出号召：“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伤兵救星，我们必须动员千百的医生和护士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继承他的遗志，完成他未竟的任务”，“加紧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26]¹⁰。肖锋满怀敬佩与遗憾地回忆了与白求恩的几次见面，指出“他的事迹将永远鼓舞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杀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27]。1940年白求恩陵墓落成典礼开始时，全体在场人员齐唱《国际歌》，“那雄伟的歌声，充满了全世界被压迫者斗争的热情、坚决的革命意志和亲切的团结精神”^[13]³⁸⁵。中国医科大学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也勉励在场师生“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2]²²⁵。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江一真回忆道：“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亲眼看到同志们以做白求恩式的革命者，做白求恩式的科学家自勉，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28]

（二）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战争与伤病联系密切，全面抗战时期的紧急医疗救援关系到部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成败。中国共产党大力褒扬白求恩的工作作风及其贡献，通过白求恩纪念活动推进抗战工作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兢兢业业，守护在受伤战士身边，尽力医治伤患，“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24]⁶⁶⁰，白求恩的言行刻印在人们心中，成为独特的精神符号。白求恩纪念活动倡导白求恩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在医疗卫生工作者中掀起了学习白求恩的热潮。毛泽东就谈到白求恩“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24]⁶⁶⁰。除医德医术足为人之表率外，白求恩还为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白求恩在世时曾因在实践中发现医疗人才和医疗器械极度缺乏会给治疗带来严重阻碍，而“下定了决心，以为教育本地区的医生和护士是任何外国医药队的主要任务”^[29]。他“两年来在前线在后方，日夜工作，勇于负责，对我野战医院之改造，治疗技术之提高，建树殊多”^[21]。“在医疗制度、医院管理等方面，白求恩同志也总结了一套适合于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办法，对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30]对白求恩高超医术及其贡献的宣传彰显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有助于切实推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就在白大夫逝去的这短短的一年中，八路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都是白大夫给八路军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大家对白大夫最有意义的纪念。”^[31]在白求恩医疗技术和医学思想的指引下，战地医疗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白求恩纪念活动彰显白求恩精神，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意义。有人以纪念白求恩为契机痛批不正之风，号召医务工作者学习白求恩精神，认真负责工作，为抗战做出贡献：“我们悼惜白求恩博士的死，更希望我们的博士先生们自省一回。”^[32]白求恩卫生学校将白求恩精神贯彻到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1940年，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生跟随老师前往华北抗日前线，支援战地医疗工作，“同学们在白求恩精神鼓舞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真正做到了战场就是课堂，教学为革命战争服务”^[33]。由此可见，白求恩精神引导医务工作的前进方向，推进了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三）促进国际友好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白求恩，将其树立成中国人民与国际人士共同的光辉榜样，白求恩成为联结不同国家人民的情感纽带，对团结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白求恩遗著中所言：“千千万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美国及英国工人的眼睛转向东方，用了赞美的眼光注视着中国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光荣的斗争。”^[34]白求恩作为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斗争中的杰出国际代表，对他的深切缅怀同时也是表明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坚定态度以及对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为实现人类解放而不懈奋斗的深刻赞同。白求恩逝世周年祭上，加拿大人罗天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要学习白大夫为中国抗战而服务的精神。”^[35]这一言论体现出白求恩纪念过程中共同价值观的凝聚，将有力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吕正操评价白求恩“以自己不朽的崇高行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加拿大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36]，白求恩也成为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的纽带和象征。

（四）筑牢共产主义信仰

白求恩用生命诠释了共产主义及国际主义精神的深刻含义，为中国共产党人筑牢精神信仰作出表率。白求恩逝世不久，1939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即在电报中表态：“白求恩同志这种国际主义的

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尊敬。”^[6]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强调白求恩“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24]659}。由此,白求恩精神的内涵得到更具体而深刻的阐释。朱德高度评价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满着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优秀党员,从他身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纯朴的品质”^[37]。尽管白求恩在边区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医疗技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和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态度,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优秀品质,将永远铭刻在五台人民以至全国人民心中”^[38]。1942年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举行白求恩逝世三周年扩大纪念时强调,各卫生机关要“发扬光大白求恩同志的伟大国际共产主义者、忠于职务的革命工作者的精神,成为八路军卫生工作者自己工作作风与品格”^[39]。中国共产党以白求恩作为鲜活范例教育共产党员铸牢共产主义信仰,从白求恩的事迹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而顽强战斗。

注释:

- ①参见冯建玫:《〈纪念白求恩〉: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追求的永恒经典》,《党建》,2018年第6期;牛保秀:《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1期;梁怡:《新时代仍然需要学习白求恩精神:再读毛泽东名篇〈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 [1] 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朗·斯图尔特.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M].柳青,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127.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 刘伯承,陈毅,等.星火燎原全集(第5卷)[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121.
- [4]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晋察冀日报社论选(1937—1948)[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93.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1.
- [6]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G].北

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295.

- [7] 中共中央电慰白求恩同志家属[N].新中华报,1939-12-02(3).
- [8] 朱彭总副司令电慰白求恩家属[N].新中华报,1939-12-02(3).
- [9] 延安追悼白求恩大夫筹备会电白求恩家属慰问[N].新中华报,1939-12-02(3).
- [10] 万里来华参战的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逝世 中共中央致电唁 本市筹备开会追悼[N].新中华报,1939-11-25(3).
- [11] 马海德.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N].新中华报,1939-11-29(4).
- [12] 本市各界人士沉痛追悼白求恩 吴玉章王稼祥陈云等同志勸勉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N].新中华报,1939-12-06(3).
- [13]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1938—1948《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 [14] 本市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一周年 并欢迎来延参观之罗史两先生[N].新中华报,1940-11-24(3).
- [15] 本市纪念白求恩大会通过设立白求恩奖金发起学习技术竞赛[N].解放日报,1941-11-16(4).
- [16] 辽宁省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华英烈碑文选[G].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374.
-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121.
-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唐县委员会办公室.唐县人物辑[G].内部资料,无出版地和出版年份.
- [19] 庄栋.中国游击队的恩人白求恩博士之死[J].现代青年,1940,1(4):61-63.
- [20] 班威廉教授.踏着白求恩大夫足迹前进的晋察冀边区医疗工作[N].解放日报,1942-12-12(4).
- [21] 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N].新中华报,1939-12-13(3).
- [22] 兰州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05.
- [23] 和平医院定明日纪念白求恩大夫[N].解放日报,1943-11-12(2).
-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5] 郁文.一颗救星的陨落[N].新中华报,1939-11-29(4).
- [26] 论战争[M].无出版地,前卫出版社,1940.
- [27] 政协河北省平山县文史资料编委会.抗日烽火燃平山[G].内部资料,1987:242.
- [28]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回忆录选编)[G].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78.
- [29] 白求恩同志给聂司令等的信[N].新中华报,1939-

- [30] 杨成武, 萧华, 等. 星火燎原全集(第16卷)[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 414.
- [31] 均伦. 纪念国际战友白求恩博士逝世一周年[N]. 新中华报, 1940-11-17(4).
- [32] 纪恩. 学习白求恩博士[J]. 《学习》半月刊, 1940, 1(8): 170-171.
- [3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院校·回忆史料[G].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5: 434.
- [34] 诺尔曼·白求恩遗著. 国际和平医院开幕词[N]. 解放日报, 1942-11-13(4).
- [35] 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逝世周年祭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会[N]. 新华日报, 1940-11-25(2).
- [36] 吕正操. 吕正操回忆录[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7: 170.
- [37] 朱德. 纪念白求恩同志[N]. 解放日报, 1942-11-13(1).
- [38] 中共忻州地委党史办公室. 忻州地区革命史实[M]. 内部资料, 1987: 132.
- [39] 晋察冀军区扩大纪念白求恩[N]. 解放日报, 1942-11-27(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Commemorating Bethune: An Investigation of Bethune's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EN Lili, ZHAO Mengya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thune,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 who aided China in the War, unfortunately died in the Shanxi - Chahar - Hebei Border Region. At this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fac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or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the border areas.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s a powerful weapon to inspire people and emancipate the mind, received full attention from CPC. The CPC organized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with Bethune as the theme through specific forms such as phone calls, organizing memorial services, inscriptions, writings, and venue commemorations and naming commemorations. Bethune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ing the masses to actively resist the wa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friendly exchanges,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st beliefs, providing a strong impetus fo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riod; Bethune; commemoration activities

统一战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探析

杨晋娟,李志慧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援华医生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民共同抵制法西斯军队的侵略。援华医生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合作,有效地促进了敌后根据地医疗卫生条件的整体改善,与根据地医务工作者共同完成了伤员运送、收治、救护等工作,降低了根据地军民的伤亡率,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之间的交流合作,也促成并维系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的宣传与塑造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际援助;医疗救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0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61-06

抗战时期,一些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表同情的外籍医生,历经艰难险阻来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充满艰险和挑战的医疗救护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学界关于援华医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救护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对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建设的成就和贡献等方面。援华医生所开展的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对其工作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合作是构建和维系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本文以统一战线为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深化对援华医生的专题性研究。

一、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社会背景

(一)国内背景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依据时局的变化,正确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局势,呼吁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行动起来,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国共产党

认为争取国际援助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此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区分开,并确立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的对外方针,12月27日,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他表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1],为了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支持,中共希望并愿意接受国际上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类型的援助。

国内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真诚拥护和坚决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2],共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保卫中国同盟,在其成立宣言中明确了“保盟”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的目标,其中一个即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3]。作为保盟主席的宋庆龄认为,中国的战斗“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和平民主的人们”^[4]。通过《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宣传品,保盟及时向国内外报告中国的抗战以及战地医疗救护的困境。宋

收稿日期:2024-04-10

基金项目:2023年度山东省社科课题“山东根据地红色医疗文物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研究”(2023-LHYM-09)

作者简介:杨晋娟(1984—),女,山东临沂人,博士,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党史研究。

庆龄、何香凝等人积极联络国内团体、海外侨胞和其他国家援华组织，呼吁国内、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抗战。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联合起来，汇合成一股抗日民族洪流。

（二）国际背景

在众多国际援助中，共产国际、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进步党派，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不容忽视。1935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目标直指共产主义势力。不同于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苏联高层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调整对外关系，呼吁各地拥护和平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1937年9月，随着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苏联和共产国际表态支持中国抗战，并加大了对中国在武器装备、医药物资、经费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的号召，组织募捐活动，并组建了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二战的性质发生了质变，从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变成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应联合苏美英等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凝聚反法西斯的力量。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宣言》，宣布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实现了世界现代史上空前的大联合。1943年5月，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其目的之一即是“便于爱好自由国家的爱国者，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的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5]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很多国家强烈谴责法西斯的残酷暴虐，同情被战争波及的贫穷落后国家和人民，他们专门组建了从事援华工作或部分从事援华工作的民间组织，如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等，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对中国的援助。很多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援华医生，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抗日根据地，与中国共产党开展交流合作。

二、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根据地医疗卫生状况恶劣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广大农村地区，时常发生症

疾、痢疾、天花、伤寒、麻疹、回归热等疫疾，然而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医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且整体水平偏低，人们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6]。建立在偏远地方的根据地同样存在这些现象，而且因为日军的封锁侵扰，当地的医疗物资严重匮乏，八路军、新四军连绷带、纱布这些常用的东西都难以及时补充；一些医务人员多次组织北上抗日，又被国民党政府以各种手段拒绝和扣留。1939年，二十多名“西班牙医生”多次表达想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斗，都被国民党当局驳回，有几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被国民党发现后都被遣送回重庆^{[7][45]}。国外的医疗援助物品也有很多被国民党扣留，“英国红十字会装了四大卡车的药品要送给我们（中共），国民党不让它开出西安”^{[8][45]}。

根据地医院的卫生状况也十分恶劣，伤员大多躺在稻草堆叠的地铺或炕上，“他们穿着旧制服躺在那，拿背包当枕头，盖一条棉毯”。晋察冀边区“20万军队，过去一年打了1000多场仗，有2500人受伤住院，但是所有救治工作仅由5名中国正规医生，50名未经训练的‘医生’和一名外国医生完成”^[9]。整个抗战时期根据地缺医少药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1942年美国记者福尔曼在三五九旅的医院中看到，医生和看护尽力照顾生病的士兵，但却无药可医，“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行西药瓶子，上面贴着拉丁文标签，但所有的瓶子都是空的。外科医生用的器具是钢铁的碎片制成的，多半是日本炸弹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们就得不到了”^{[8][44-45]}。战争的频繁发生，造成受伤战士日益增多，但医疗物资、滋养食物的匮乏，导致很多伤员落下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二）中国共产党尊重医药卫生人才

战争年代，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务人员大多选择留在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每到一地便派人寻医，然后再亲自上门聘请其参加革命”^[10]，他们充分利用学缘、亲缘等关系，走访、邀请当地医生，充实医务队伍。为了吸引更多医护人员，中共制定了“来去自由”的人才原则：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还提高医药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这些举措让很多医务专家和国际友人感受到了边区对人才的尊重与渴望。1941年4月公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卫生部的几个工作原则指示》指出卫生部门专家（医生）工作之分配与地位之高低不应根据斗争历史之长短、政治知识之多少、党员或非党员，而应根据其专门知识与技能来区别。194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发布《文化技术

干部待遇条例》规定:边区的医药卫生人才,根据其学历及专长,给予不同的津贴、伙食、住房、衣服以及书报的查看权限等。通过这些措施,边区形成了尊重技术、知识和人才的氛围。

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工作策略中多次提出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建设发展根据地。援华医生来到边区后,通常被聘为医院医生、卫生学校教员,有的被任以医院行政职务,有的还被选举为参议会委员,中共邀请援华医生参加边区参议会、卫生工作会议、劳模大会等公共活动,使他们了解边区整体发展情况,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以此来完善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和运行机制。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以及二者共同的反法西斯信念,搭建起双方交流合作的基础。

(三)国内外友人的多方协助

毛泽东说:“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11]对于医疗援助中国共产党采取主动而非被动的对外工作态度,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以便改善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状况。1937年8月,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一起向美国与加拿大共产党、国际红十字会写信,请他们立即派遣医疗队携带医疗物资来华到敌后拯救八路军伤员,得到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支持。不久之后,白求恩所在的美加援华医疗队随即成立并启程来华。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说要“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11]。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邀请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到延安访问、参观、考察,让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活动。

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是相互支援的,在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有许多国际友人和不同类型的社会团体,如保卫中国同盟、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红十字医疗队、公谊救护队等通过不同形式呼吁国际社会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援助。这些在国内活动的团体或组织将接收的捐赠物资,妥善地送抵急需它们的地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困境。

(四)援华医生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

法西斯的战火蔓延在欧亚各地,很多援华医生深受法西斯的政治迫害和种族迫害,他们来到中国,要求参加前线救援,用手术刀与法西斯拼杀,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汉斯·米勒说,医务工作者也在战斗,“医务人员要打的直接敌人就是死亡、疾病和残废,就是保护战士们的健康”^[12]。经过治疗,很多受伤的战士恢复了健康,为中国军队保留了相

当数量的战斗力。

援华医生们为革命战争时期的医生行业找到一个目的——为自由而战。1935年8月,马海德在给朋友写的信中说,他不想回美国了,想留在中国,“生活不仅是个人和他的家庭。全世界都在受苦受难,你自己面临的问题是次要的了……此时此刻,我将尽心做我所能做的,帮助这里的人”^{[13]19}。绝大部分援华医生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拥有丰富的行医经验,他们被中共所领导的反法西斯行动所感动,热切地希望加入八路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一起投身到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中。

三、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成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医务人员来华援助,据统计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14]。马海德是最早来到延安的美国医生,随后,加拿大理查德·布朗医生、白求恩医生、琼·尤恩护士先后到达延安。印度援华医疗队、苏联医生安德烈·阿洛夫、奥地利医生傅莱和罗生特、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朝鲜医生方禹镛等人都曾在敌后根据地工作过,国际红十字医疗队、公谊救护队等组织曾派流动医疗队长期在边区进行医疗援助。这些援华医生与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团结合作,救助了难以数计的抗日军民,也改善了我国部分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

(一)积极推进抗日根据地医院卫生工作正规化

援华医生履职尽责,积极建议并推进根据地医院网络建设。如1936年7月马海德考察了陕北各地的医疗机构,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边区医疗事业的建议。中革军委任命马海德为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在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善卫生部直属医疗所在边区医疗网。到1946年在边区建立起“以白求恩和平医院为总院,8所中心医院和24所分院,总计拥有11800张病床”^[15]、20多个流动医疗队的医疗网,极大地提高了战地医疗服务的效率。

援华医生将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引进到边区医疗卫生建设中。边区医院创办初期,不仅面临着医疗设备、医疗药品、医疗技术奇缺的困境,医院规章制度也不正规,“那时候外科大夫什么都管,皮肤病、眼睛的病都看,拔牙也是外科大夫干的”^[16]。在傅连璋、何穆、魏一斋等医生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如住院制度、查房制度、会诊制度、探视制度、出院制度等。规章制度刚出台的时候,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带头遵守,陈云还为此召开大会,强调要执行这些制度。白

求恩曾在军区卫生部长会议上建议设立模范医院、医护培训学校,创办特种外科医院、特种外科实习周,他还根据中国游击战争的亲身经历撰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術》《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等方案,成为日后边区医院组织建设的基本规范。除此之外,边区医疗还建立起卫生管理法规体系。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至1949年,发布边区和解放区卫生防疫相关的指示条例就多达44条,这些规范条例使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规范、制度化^{[17]6-9}。

(二)为根据地培养医护人员

为了尽可能多地培养医护人员,各抗日根据地开设了不同类型的卫生学校、医科院校等来培训医护人员。白求恩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18]15}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对医护人员的培训,从军队中选拔“身世清白”“身体健壮、年轻机灵、稍有文化”的小战士到卫生学校学习,学成后充实各军区医院。

根据地医学读物极少,有的援华医生编写教材进行教学,如柯棣华曾编写《外科总论》,使根据地医护人员掌握了战地救援工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白求恩为了提高培训效率,在晋察冀边区医院院长林金亮、政委刘小康、医生王道建等人的协助下^[19],于1939年1月举办了“特种外科实习周”,学习期间白求恩言传身教,学员们收获颇大,纷纷感慨,“院中学七日,胜读七月书,空空而来,满载而归”。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过的人员回忆道:“(白大夫)亲自给我们作示范,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拿镊子、解绷带、换药、上固定夹板。他常对我们说:‘护理伤病员,每一个动作都要轻微、迅速、准确,要尽量减少伤病员的痛苦。’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白大夫每次施行手术,都要把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医院的医护人员叫来,让大家观摩学习。……他每天每夜都几次到病房看望伤病员,就连哪个伤员何时需要翻身,哪个伤员何时需要做功能练习,都时时挂在心上,并亲自临床指教。”^{[18]93}白求恩等人将教学、实习相结合,通过亲身示范,为根据地培养了很多高质量医护人员。

(三)组建并参与战地医疗队

后方医院距离火线较远,加之交通不便,导致很多伤员病情加重、不治而亡。白求恩主动提出“不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要上前线战场治疗伤员,他根据自己在西班牙战场的救援经验,向毛泽东建议派医生到前线去,这样可以使伤员救治率达到

75%。之后,白求恩离开延安去晋察冀根据地,训练好医护人员,组建了八路军的第一支战地医疗队。1939年2月中旬至6月底,白求恩率领“东征医疗队”来到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这一时期,医疗队跟随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和冀中的部队作战,行军1504里,实施战地手术315人次,参加较大的战斗5次^{[16]88}。4月中的齐会战斗,由于抢救及时,伤员治愈率达到85%。由此还创立了战地救护三原则:靠近、尽早、尽快,用于指导战地医疗救护工作。

1939年冬,柯棣华所在的印度医疗队在晋察冀根据地多次走访救助伤员,沿途施行了50多次手术,救助了2000多名伤员。尤其在百团大战中,印度医疗队成员各自带队来到不同战场。涑水战役中,柯棣华在距火线仅一二里的地方设立了救护所,柯棣华和巴苏华的医疗队在“13天里接收800余名伤员,给558人进行施救手术”^[14]。1946年12月2日,公谊服务会第十九流动医疗队成员先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后跟随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第二所转战陕北,直至1948年8月,第十九流动医疗队结束工作,撤离延安。^[20]战地医疗队的存在使受伤战士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降低了伤者的死亡率。

(四)筹集并输运医疗物资

抗日根据地医疗器械、药品等极度匮乏,中国共产党多方筹集医疗物资,这些援华医生来根据地时,都会带着他们所能筹集到的医疗物资^[21],如1938年3月,白求恩和琼·尤恩带来在美国和加拿大筹集到的药品、一架显微镜、一个小型射线装置、手术医疗器械;1939年2月,印度援华医疗队冲破国民党的阻拦,乘坐自己的救护车并携带63箱药品和器械到达延安;1946年2月13日,英国公谊救护队到达延安,随行三辆装载着七吨医疗物资的卡车,他们赠送的药品和器械可为边区装备一个急救医院;1946年12月2日,公谊服务会第十九流动医疗队携带三吨半药品及医疗器材从郑州飞赴延安。这些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大地提升了根据地医疗救治水平。中共考虑到援华医生的特殊身份,希望他们为抗日根据地购买相关物资,如傅莱医生在去延安前,北平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晋察冀及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傅莱在天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所交办的这些任务。

(五)研发新药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药

品非常缺乏,西药来源困难,内科大多使用中药,由医护工作者自行采集制作。中共确立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医药发展政策,设立制药厂进行药品研发和生产。越南华侨中医梁金生,领导成立了边区光华制药厂^[22],并负责讲授医疗技术和发展中草药的炮制研究,该药厂在1941年6月与医科大学卫生部共同组建中西医研究室,研制出30多种中成药,为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极大贡献^{[17]19}。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疾,傅莱通过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找到了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并亲自到作战部队进行实验和推广,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1945年初,傅莱收到美国提供陕甘宁边区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在军区卫生部支持下,带着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助手,开始研究试制青霉素。1945年5月20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了首次医药学术报告,傅莱介绍了怎样运用边区现有条件制造青霉菌素,并展览所需器材,具体说明制造过程^[23]。青霉菌素的研制成功,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为增强抗战力量立下莫大功绩。

四、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

(一)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展医疗卫生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就注意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说,如果卫生工作搞不好,就会“减少红军战斗力”,“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24]。由此确立了医疗卫生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政治方向,并将卫生工作视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方式。

边区医院不仅为军队战士诊治,还为当地百姓治疗。据统计,“边区医院1941年治疗的病员中,群众占25%,1942年占27%,1943年达到30%(该年共为群众看病9611名,其中治愈9322名,治愈率为97%),1944年医院共接诊病人4245人,其中群众1345人,占到了31.7%”。边区政府主办的大部分医院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免费给群众治疗,“1944年边区政府卫生处派出八个医疗队到延安、子长、甘泉、富县等地,为群众看病3500人,门诊病人50000余人次,收住院病人2000多人”^{[17]17-18}。1945年边区医院又派出20个医疗队下乡,一面治病,一面帮助基层培训医务人员。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这些活动,极大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健康状况,医院所在附近村里的妇救会员们,也自发地为医院缝制被褥和枕头,清洗床单和衣服,照护伤员等,形

成了融洽的党群军民关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医疗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一切为了病人”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援华医生在医疗工作实践中塑造了为战、为军、为民的精神,与根据地医护工作者一起救死扶伤,共同筑起生命防线。1944年8月2日,罗生特作为模范医生,出席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路召开的英模大会,期间忽然接到一名难产妇女的求救消息,他立即率医疗组前往。当时这名妇女已经休克,生命垂危,他立即进行抢救,迅速将死胎引出,救了产妇一命^[25]。援华医生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工作期间,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军民的充分认可。

(二)建立并维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国际医疗援助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一些国际友人看到八路军、新四军所面临的医疗困境,想方设法突破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客观、真实地报道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活动。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和伯特伦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等著作影响了很多援华医生的选择。援华医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其行为本身即是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

援华医生成为维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纽带。“去延安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医疗、技术和道义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向全世界发声,报道延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纲领和他们的行动。”^[26]1936年,宋庆龄安排马海德去陕北,嘱咐其“尽可能详细了解西北的医药卫生情况,以便为根据地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援助”。马海德在延安时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1937年11月,他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经常为当时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积极参加对外宣传工作。^{[13]60}这些活动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象,也为边区和各根据地争取了更多的医疗援助。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写了大量的报道、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在美洲的报刊发表,以争取民众的支持。在马海德、白求恩等人的积极行动下,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继续凝聚并发挥统一战线的力量。

(三)彰显并传承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友人的交流合作,诠释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列宁说:“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

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27]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及根据地广大军民为争取民主而并肩战斗,维护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在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为“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28]806。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半数以上的兵力,这本身即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正如宋庆龄在1939年5月发表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所说,不能把国际援助当作对中国人民的“恩施”,“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4]387,对中国的援助,不单是为了中国的抗战,更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接受国际援助并非毫无原则和底线,平等、尊重是实现良性交流合作的基础,1944年《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提出,对外工作“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地有计划地加以布置”^[29]。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力更生和争取援助相结合的策略,“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28]1016。即使没有国际援助,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也仍旧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而需要正确看待国际援助,客观、公正地评估国际援助在抗战中的辅助意义。

总而言之,“国内、国际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30],保障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与援华医生的交流合作,不仅改善了根据地医疗卫生状况,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维系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重要体现。中共与援华医生交流合作的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实施国际援助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 [2]袁旭.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4.
- [3]陈漱渝.宋庆龄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260.
- [4]爱泼斯坦.宋庆龄[M].沈苏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6.
- [5]高立伟.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

- 联高层决策角度[J].学术探索,2021(1):106.
- [6]胡安徽,杨萍.技术与干部: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抓手:以《林(伯渠)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为中心的考察[J].中州大学学报,2023(4):59.
- [7]伊娃·巴莉丽琦.严斐德传[M].翁振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45.
- [8]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陶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9]伍冰枝.诺尔曼·白求恩[M].任明辉,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35-137.
- [10]刘宗灵,郑祥文.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及其运行实态[J].中州学刊,2024(5):141.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19.
- [12]马模贞,杨大伟.汉斯·米勒[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34.
- [13]沙博理.马海德传[M].郑德芳,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19.
- [14]张注洪.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作用[J].历史档案,1998:115.
- [15]孙国林.马海德:“革命化”“中国化”的美国医学博士[J].党史博采(纪实),2012(6):25.
- [16]金星.亲历延安:延安中央医院的往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0.
- [17]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18]韩海山.白求恩在唐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19]张瑞静.国际援华医生与晋察冀根据地医疗工作的开展[J].兰台世界,2016(2):112.
- [20]王晓莉.不为人知的公谊救护队[J].陕西党史,2020(11):32.
- [21]张启安.延安时期援华医疗队和外国医生的高尚医德[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6):60.
- [22]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1924—1950)[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16.
- [23]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七辑)[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400-401.
- [24]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7:12.
- [25]戴玉亮.特别党员罗生特[N].大众日报,2021-06-27(02).
- [26]王海龙.白求恩写给毛泽东的信[J].读书,2023(10):28.
- [2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下转第91页)

福建苏区医疗卫生理念的社会化

李乾坤, 张晓洁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3)

摘要:土地革命时期,福建苏区自然疫源多、民居卫生条件差、民众卫生陋习多、民众有病求神不求医等不良因素极易诱发疾疫流行,危害苏区军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中国共产党立足福建苏区实际和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在文化教育之中厚植医疗卫生理念、织密医疗卫生理念传播的社会组织网络、拓宽医疗卫生理念的大众传播途径,多层次推进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增强了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意识,促进了苏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推动了苏区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进一步提升了苏区军民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福建苏区;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政治认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1

中图分类号:R19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67-06

具有现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是在工业化和医疗卫生专业化背景下产生的,是关于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医疗科学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衡量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近代以来,许多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仁人志士,都曾尝试通过“医人”来“医国”。其中,既有以陈志潜为代表的协和医生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定县实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开展的“新生活运动”,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开展的别开生面的医疗卫生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医疗卫生实践,创造了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新范式,为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根基,其中的经验尤为值得挖掘与传承。但是,纵览现有研究成果,从社会化、社会互动层面研究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成果还较少。因此,以党领导苏区军民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基地——福建苏区^①为例,探讨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动因、具体实践及其社会影响显得尤为必要,更是充分挖掘红色医疗卫生资源价值、丰富相关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军民,在福建创建了20多个新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新政权的创建与巩固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新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医疗卫生理念就是这套新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的重点。因为在反“围剿”的革命战争中,福建苏区人口迁移频繁,人口密度增大,极易引发疾疫流行,而福建苏区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相互作用,则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疾疫流行的风险,对革命战争和苏区生产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一)福建苏区自然疫源多

福建苏区地处亚热带,多雨潮湿,山多林多,有利于致病微生物和病媒虫害的生长繁殖,疫病丛生。“当时即被称为‘瘴疠之区’‘热带病之乡’‘寄生虫病王国’。”^{[1]57}由于山区卫生条件差,缺医少药状况严重,福建苏区所在地时有鼠疫、天花、流脑、霍乱等急性传染病暴发流行,死者甚多。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回溯调查:“直至人间鼠疫完全控制的1952年为止,已有69年的流行历史。……在这期间本省

收稿日期:2024-04-19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36);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DJB006);202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2021CDJ026)

作者简介:李乾坤(1986—),男,河南淮阳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医疗社会史与妇女/性别史研究。

(福建)每年均有鼠疫流行,有疫情报告的达 59 个县市(全省共 67 个县市)。”^{[2]38}截至 1952 年,鼠疫横行闽西北南平地区,前后流行 53 年,患病人数总计 4.5 万人,死亡 3 万人,病死率达 66.66%。^{[3]2276}1933 年,闽东南漳州又有 5800 多人死于鼠疫。流行区群众谈鼠色变,无心生产,扶老携幼,逃亡异乡。^{[4]2478}1888—1951 年,鼠疫在闽西龙岩地区共流行 75 次,漳平、龙岩、永定、连城 4 县的 558 个村镇均有发现,患病人数 22941 人,死亡 19982 人,病死率达 87.1%。^{[5]1320}疟疾在福建各地均有流行,是发病率最高的传染病,尤其在闽西北的中部山区流行更为严重。1934 年夏秋季节,建宁县恶性疟疾大流行,死亡 400 余人,其中城区里心双亭街的大墟场,30 户 120 人死亡过半,余者逃亡,最终成为一个废墟。^{[6]2527}1937 年,东山县疟疾流行,发病 2000 余人,死亡 340 例。居民血检 561 人,疟原虫阳性率达 62.4%,其中恶性疟原虫率 77.4%。^{[4]2487}1920—1949 年,连城县赖源、长汀县城关、漳平县杨美、永定县堂堡、武平县城关先后发生天花大流行^{[5]1321}。痢疾也是福建苏区患病率较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1934 年建宁全县死于此病者 400 余人。^{[6]2520}凡此种多发常见的疾疫,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工农业生产。

(二)福建苏区民居环境差

福建苏区多位于农村,农民生活贫苦,居住条件差,人畜杂居者多。旧时漳州城区劳动人民居住区没有给排水设施,大气、水源污染严重。住房狭小,人丁拥挤,通风差,环境阴暗潮湿。^{[4]2471}在山区,贫民多搭草棚、竹寮、杉皮厝等居住。境内还有干阑式住宅……住宅上层住人,楼下当畜栏兼厨房。^{[4]2567}而且,漳州农家饲养最多的是鸡鸭。鸡舍鸭圈一般设在院子里,任其宅内户外觅食。^{[4]2585}旧时龙岩地区山区也常见竹寮、草房、杉皮房,人畜混居,低矮、阴暗、潮湿、脏臭。^{[5]1431}由于旧社会社会秩序混乱,强盗多,农民为自己安全考虑,多注意居所的坚固,少设窗或窗太小,使通风采光不足。且居住较拥挤,故多阴暗潮湿。在边远山区还有一些畜舍与卧室毗连,甚至人畜同居的现象,垃圾、污物杂草四处堆放,户外成群的露天厕所和贮粪池多不加盖。^{[2]33-34}该省普通居民住宅由于建筑形式简陋,屋顶、地板下和夹墙中都有空隙,适合于鼠类的匿藏和繁殖。总之,福建苏区这样的人居环境极易滋生各种疾疫媒介,诱发各种疾病。

(三)福建苏区群众封建迷信思想严重

福建苏区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的情况

严重,群众害病多通过看巫医或者寻神问鬼的迷信方式禳解。如在三明地区,民国及其以前人们封建迷信思想严重,遇到灾害、生病和危急,更以迷信方式祈求除灾治病。有疾病认为是鬼邪作祟,请师公、巫婆“驱鬼”“跳童”“下阴司”,在三岔路口烧纸点香求保佑,吃烟灰,喝符水。小孩受惊哭泣,视为受风神惊吓,家人将小孩穿过的衣服包裹一升米,出门“喊魂”“招魂”。突发肚痛或昏倒,认为是被邪风恶煞打倒,念解风煞煞歌做法事。^{[6]2705}在漳州地区,民众有疾求神,神棍便升神像沿街求取药草,指定某家庭院内栽种的草药(如车前草、茜草等)为神明指点的灵药,采来给病人服用。有的延误疾病医治,甚至造成人身死亡。^{[4]2597}在闽南,俗信得病乃“王爷公”所致,要用丰盛的供品和隆重的仪式敬奉它,俗称“贡王”。《泉俗激刺篇·贡王》写道:“有病药不尝。用钱去贡王,生鸡鸭,生猪羊,请神姐,请跳童,目莲傀儡演七场,资财破了病人亡。”^{[7]333}这些封建迷信活动根深蒂固,不仅会延误病人医治,而且成为福建苏区推进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重要障碍。

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福建苏区各种疾疫猖獗的主要原因,严重地威胁了苏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对福建苏区政权建设造成严峻挑战。正如临时中央 1933 年所颁布的《卫生运动纲要》所说:“为了解除群众切身的痛苦,……向全苏区内一切污秽和疾病作斗争,同工农群众自己头脑里残留着的顽固守旧迷信邈远的思想习惯做斗争,是十分必需一天也不可缓的。”^{[8]86}因此,在福建苏区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提高苏区军民的公共卫生意识和预防意识,成为苏区军民应对疾疫、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健康水平的良策。

二、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实践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中医治未病”的预防理念,人民群众也有在重大节日清洁扫除的习惯,但是对多处于农村、山区的苏区群众来说,党在苏区推行的兼具中西医优势的、具有现代性的、重视日常预防的医疗卫生理念确实是一种新理念。这对于墨守成规的福建苏区群众来说是较为陌生的,让他们摆脱习以为常的旧习俗,转而认可并践行新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福建苏区党政军机关就综合运用社会化的多种举措,多方位帮助苏区军民确立医疗卫生理念。

(一)在文化教育中厚植医疗卫生理念

“学校是一个人走向社会的专门化的学习和训练场所,……是系统化的强有力的社会化途径。”^{[9]248}因此,福建苏区将医疗卫生理念融入苏区

的基础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着重引导苏区青少年确立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1932年5月2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在其发布的“关于征求课目教材及优待办法”的特别通讯中明确指出需编教材有:“(一)学校教材:初级(四年)列宁小学常识、卫生、唱歌、革命故事,高级(□年)列宁小学自然、卫生、地理、唱歌。(二)社会教育:成年识字课本、剧本、歌谣。”^{[10]251}福建苏维埃政府发布13号通令同时指出:“为统一全省教材,……以前闽西政府及各县区政府编印的课本一律取消。”^{[10]252}在这套福建苏区通用的小学教材中,有许多传播医疗卫生知识的课文。其中《共产儿童读本》(第1册)就有2篇课文引导儿童合理饮食、及时剪指甲;《共产儿童读本》(第2册)关于医疗卫生的课文有6篇,内容涉及吃东西要洁净、种牛痘防天花、吸烟的危害和开门窗换气、保持空气清新等;《共产儿童读本》(第3册)关于医疗卫生的课文有7篇,内容涉及各种垃圾的处理、防蚊虫、注意教室内外清洁、用眼卫生等,还设计了让学生们讲演卫生的活动课^{[8]340-343}。闽浙赣省苏文化部1932年初版、1933年再版的社会教育教材《工农读本》(第2—4册)也有许多专讲医疗卫生知识的课文,内容涉及清洁的好处、苍蝇和蚊子的危害、生病不求医迷信的危害、运动的好处等,教材中还有让工农学员操演体验的卫生独幕剧《早婚之害》和《检查卫生》^{[8]337-340}。卫生教育还是福建苏区各种识字班、夜校、红军学校的重要教育内容。正如彭真(彭龙伯)在《红色卫生》第2期发表的社论所讲:“所有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应加日常卫生功课,使每一个工农大众在识字中就获得宝贵的卫生常识,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一种好清洁、好卫生、牢不可破的习惯。”^{[8]247}这就为福建苏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不同工作背景的学员树立并传播具有现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提供了可能。

(二)织密医疗卫生理念传播的社会组织网络

福建苏区党政军机关领导创建的儿童团、青年团、工会、妇女委员会、农会、互济会、列宁俱乐部等群众组织,是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重要平台。1932年1月,苏区团一大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清洁防疫的工作因此成为团的严重战斗任务之一。团要努力把清洁防疫的常识向群众扩大宣传,举行清洁防疫运动,并且实行清洁防疫的办法、竞赛与卫生宣传。”^{[11]42}1932年6月21日,少共闽粤赣苏区团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决议也明确要求:“在俱乐部中,设立‘不信神教同盟’进行广大的

反宗教的运动。”^{[11]256}福建苏区的妇女组织则成为推行苏区婚姻法,废除纳妾、童养媳、缠足、近亲结婚等不良婚育习俗的主力。1933年4月28日,中共闽北分区委妇女部在第六次各县妇女部长联席会议决议中还明确指出:“卫生工作,是于(与)战争有极大关系的,同时夏天炎热更应注意卫生,以免瘟疫的发生与蔓延。这一工作必须动员广大妇女群众举行清洁运动,用比赛精神来进行卫生工作。”^{[13]68}福建苏区各级工会成为传播工作场所卫生、工人各类医疗卫生保障理念的重要平台。这些群众组织是福建苏区卫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和监督者,是规范组织成员卫生行为,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重要组织力量,是党和苏区政府推行医疗卫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三)拓宽医疗卫生理念的大众传播途径

福建苏区党政军机关还充分运用报纸、杂志、墙报、宣传标语、歌谣、戏剧等大众传播工具,发挥其在构建主流社会文化、塑造共同体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各类疾疫流行的特点,及时登载传播医疗卫生科学常识、党和苏区的医疗卫生政策。

在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除传播临时中央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法规政策、发布动员苏区民众开展卫生运动的社论外,还在1932年2月至1934年4月先后发布了《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疥疮预防法》《冻疮速愈法》《(防毒)两样方》《鼠疫预防法》《警觉起来》《卫生常识》等医疗卫生科学知识。最受福建苏区青年军民青睐的青年报刊《青年实话》也结合青年生活实际,多次刊布宣传医疗卫生科学知识的文章。如《反对烟酒、祖墓、迷信、姓氏观念》《加紧卫生运动》《卫生运动的十个不十个要》《卫生突击队的作用》《手淫的害处》《红军中青年在卫生运动的活跃》《你生疥疮吗?医治疥疮的法子》《防毒歌》等。^{[8]236-336}《红星报》是向红军部队指战员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重要载体,设有《卫生》专栏。除这些在苏区发行范围较广的、中央部门创办的刊物外,福建苏区党政部门还积极跟进,在本地的相关报刊上传播医疗卫生理念。1931—1934年,闽北苏区创办的《红旗周报》《列宁青年周报》《红色闽北》等报刊就及时发布福建苏区的卫生通告,宣传医疗卫生常识,为苏区开展破旧立新的卫生运动鼓与呼。“(闽东)苏区政府以《闽东红旗报》为导向,教育广大农民群众不要相信鬼神。”^{[12]65}墙报、标语因其通俗易懂也成为福建苏区医疗卫生宣教的主要形式。这些标语和墙报常被写在苏区民众的集会场所,或具有标志

性意义的地方,以引起苏区军民的关注。

由于福建苏区民众总体文化水平不高,上述静态的文字媒介难以影响在苏区人口中占比较大的文盲群体。因此,福建苏区还积极采用文艺宣传这种更为柔性、更容易为苏区群众接受的形式传播医疗卫生理念。1933年5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成立工农剧社。在此前后,其他各分区也成立了工农剧社,军队组建了宣传演出队,还有遍布各行各业的各类俱乐部。这些文艺组织的演出内容主要包括:福建苏区组织文艺工作者创编或改编的切合儿童认知和生活环境的童谣、用当地流传已久的山歌小调的韵律和调子创作的山歌小调、借用旧剧的形式传播新内容或创编简短的文明戏。这一时期在苏区“流传较广的歌谣有《卫生歌》《卫生运动歌》《慰劳伤病员》等;戏剧有《早婚之害》《检查卫生》《加紧卫生运动》等”^{[14]250}。当时的演员多为党在苏区招募培养的新型文艺宣传人员,而且多用当地方言开展巡演,如此更容易普遍深入地宣传医疗卫生理念。

在缺医少药、革命斗争形势紧张背景下,福建苏区倚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组织、大众传播工具、文艺渗透等社会化途径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一个缩影,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重建的特色。

三、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成效

福建苏区在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过程中,虽然缺乏陈志潜开展“定县实验”的专业医疗卫生队伍,也缺少当时江西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医疗卫生资源,但还是因势利导,尽可能挖掘苏区社会化资源,激发了苏区的社会活力,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增强了苏区军民的医疗卫生意识

据1930年5月18日出席全国苏代会的闽西代表报告:“最近闽西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旧礼教、旧风俗习惯,打破迷信等斗争。……如改良风俗案,他们作了普遍的宣传,同时以群众力量来禁止。”^{[15]152}“所有婚姻、丧葬、年节、戚友应酬等不良风俗都废除了。”^[16]1932年1月12日,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也指出:“最近在汀连、上杭、永定做反迷信运动比较有发动宣传等,并与赞成拜菩萨的团员错误倾向作斗争,强迫现象较少发生。”^{[11]25}据徐淮1930年关于福建崇安革命形势的报告:“过去妇女通通都是缠足,现在已放了十分之六。剪发也日见增加,在二十岁以内的剪了十分之五。”^{[17]247}1933年4月28日,闽北分区各县妇女部长联席会

议决议也明确指出:“在三四月份工作,可以说是获得了相当的成绩……有部分是开始进行,可以说是群众已了解卫生的意义。”^{[8]94}转战福建苏区的红军部队卫生意识更强,据红一方面军卫生干部吴行敏回忆:“在行军途中,如无法解决禁止饮生水的问题时,就强调饮干净水,由卫生员用牌子做标记。标明水源清洁时方可饮用。……每当到驻地时,哪个班挖厕所,哪个班搞卫生,很快就安排妥了。为了发现居民中的传染病,卫生人员就注意老乡们是否有穿孝者,发现后便询问死者的患病状况。如为传染病,部队即离开疫区。”“以上所说,已成为常规,战士们都是自觉的(地)执行。”^{[18]775}可见,尽管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的实践对不同群体影响不尽相同,但这些医疗卫生社会化实践,在总体上还是促进了苏区军民的卫生自觉。

福建苏区推行的医疗卫生教育,贴合青少年学生和青年工农兵学员生活实际,呈现形式也丰富多彩,除分享个体经验和操演卫生剧本外,还有顺口溜、问答、编成小故事等多种形式,易于被学生和学员们接受。这些学员回到家中,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家人,在家庭这个重要的社会化场所推行具有现代性的医疗卫生理念。由各地苏维埃剧团巡回演绎的医疗卫生戏剧,以当地人熟悉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旧瓶装新酒”,如用医生为妇人看病的独幕剧展示早婚之害;以检查卫生为切入口,将苏区人畜杂居的常态搬上舞台,指出这种环境和不讲卫生的习惯对家人健康的危害;创编《加紧卫生运动》鼓词,用苏区民众较为喜爱的大鼓书在苏区军民中传唱,使这些医疗卫生理念更为生动形象,更深入人心。这些举措无形中扩大了相关医疗卫生理念普及的广度和深度。

(二)促进了红色医疗卫生人才的培育

福建苏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在党领导的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实践中,不仅意识到讲卫生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卫生对革命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各种医疗卫生社会实践的交互影响下,对医疗卫生产生了兴趣,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医疗卫生革命之中,成为党可以信赖依靠的医疗卫生骨干。“从1932年秋开始,(福建军区)后方医院创办了‘看护训练队’(也称‘卫生训练队’),招收思想进步、身体健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男女青年,每期有学员70多人,半年为一期。……由于学员们为革命战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学习的目的性明确,虽然他们文化水平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普遍都能团结一致遵守纪律,自觉刻苦地学习。……毕业后除少数学员分

配到前线战地医院外,大部分学员留在后方医院,成为红军部队的医务骨干。”^[19]据后来成为神经外科专家的福建省长汀籍军医涂通今回忆:“1932年2月,我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即四都医院里学习看护。……在学习中虽然生活艰苦,处在战争环境,教学条件也差,……同学们刻苦学习,教员们热心教导,……特别是学校领导处处以身作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414}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高等中医教育主要开创者的福建上杭籍名医黄升仁,在福建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影响和教育下,在革命战争时期一直从事医护工作,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历经艰难险阻,开创了我军医疗救护事业的新局面。^{[8]476-477}像他们这样出生在福建、在福建苏区医疗卫生实践的浸润下十多岁就参加革命、毕生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骨干就有十多位。他们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国的军事医学乃至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的重要收获。

(三)促进了苏区政治文化社会化

苏区群众为什么会抛家舍业拥护革命?土地革命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党在苏区的医疗卫生实践对苏区军民造成的心理冲击也至关重要。诚如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结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20]136-137}福建苏区的医疗卫生实践,使长久以来地位低下的苏区群众亲身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生命健康的呵护,感受到了苏区政府对他们的尊重,认识到作为自由人应有的尊严。所以苏区群众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20]138}因此,苏区群众将这种由生命健康被呵护而引发的情感共鸣,转为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全面支持。“在福安,当时由妇女干部带头,兴剪短发,倡导男女平等,废除缠足,得到了广大苏区妇女的响应,许多妇女离开锅台走出家门参加革命。”^{[12]65}在党的感召下,福建苏区群众不畏强敌、踊跃参军支前的实例更是数不胜数。这就是党尊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所激发出的群众革命伟力。

福建苏区宣传医疗卫生理念的方式方法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政治影响。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群团组织、大众传播工具、文艺渗透等途径推进医疗卫生理念社会化,兼顾了各个年龄阶段、不同社会群

体接受新理念的特点,影响范围较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也随之增强。其中尤为称道的是运用新戏剧进行宣传。诚如对此作过深入采访并多次观看苏维埃剧团演出的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所说:“戏院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苏维埃那样重要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或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它是革命本身不可分的一部分。”^{[21]75}“演员们只有极少的道具和很简单的情节来帮助他们演出。在那赤裸的舞台上,他们的演剧才能不得最受最高的试验。……他们倒都好得惊人。孩子们是那么自然,那么出色……那些戏都是极极显露的宣传,但观众对于这点倒并不吹毛求疵。……他们因此老是津津有味地看不同演员所演的同一出戏。”^{[21]77}福建苏区文艺工作者肩负着丰富苏区群众文化生活、开展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医疗卫生理念的三重重任,“经常深入前线、乡村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沿途张贴标语,农忙季节与群众一起劳动,在地头田边进行口头宣传;每逢圩日则在街上搭起简易台子演出。节日集会,举行军民联欢”^{[5]1277}。这既活跃了福建苏区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传播了医疗卫生理念和党的其他一心为民的方针政策,鼓舞了革命斗志,增强了苏区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政治认同和拥护。

四、结语

福建苏区推行医疗卫生理念的社会化实践,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创立新政权、改造旧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运用社会化路径重建社会秩序的伟大开端。虽然受革命形势影响,党在福建苏区未能持续地推行新的医疗卫生规范,也没有彻底根除苏区群众旧卫生常识和迷信邈邈习惯,但是党在灵活运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组织、大众传播工具、文艺渗透等社会化途径传播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方面的创举,在提升苏区群众医疗卫生意识、营造医疗卫生科学化氛围、促进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升苏区群众政治认同等方面取得初步成就,为党此后创建“延安样板”乃至新中国的社会改造奠定了基础。其中许多做法,特别是医疗卫生与常规教育相融合、文艺渗透、柔性宣传等举措,对新时代继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意识、不断提升防疫抗疫的质量仍有助益。

注释:

①福建苏区是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地域较为广阔,除现有研究多次提到的闽西地区外,还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闽西北和闽东地区,党中央在这一地区会同福建各级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丰富的医疗卫生实践,为此后党领导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军民继续推进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极具代表性。

参考文献:

- [1]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卫生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福州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检验所.福建地区流行病学资料汇编[M].内部资料,1959.
- [3]南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平地区志(第3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 [4]漳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漳州市志(第4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5]龙岩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岩地区志(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6]福建省三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明市志(下)[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 [7]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民俗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8]中央苏区(福建)医疗卫生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央苏区(福建)医疗卫生文献选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
- [9]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0]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革命历史文件汇

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1—1933)[M].内部资料,1986.

- [11]古田会议纪念馆.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7辑)[M].内部资料,2006.
- [12]宁德市老区办.闽东老区志[M].内部资料,2009.
- [13]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妇女运动史料汇编(第1集)[M].内部资料,1982.
- [14]刘善玖,钟继润,李媛.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
- [15]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0)[M].内部资料,1986.
- [16]吴晓荣,杨杰.政权建设视野下苏区共青团的功能发挥[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49.
- [17]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M].内部资料,1987.
- [18]张奇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2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3.
- [19]汤家庆.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后方医院概况[J].福建医药卫生志通讯,1985(1):43.
-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ocializ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oncept in Soviet Area of Fujian Province

LI Qiankun, ZHANG Xiaojie

(College of Marxism,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Fujian Soviet area had many natural epidemic sources, poor sanitary conditions in residential areas, many bad hygiene habits among the people, and people praying to gods instead of doctors when they were sick, which easily induced the spread of diseases and endangered the lif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in the Soviet area.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Soviet area of Fujian and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 culture and education, organized a network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concepts, broadened the means of mass dissemin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concepts, promoted the socializ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concepts in multi-level way. It enhance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nsciousness of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 promoted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and health talents in the Soviet area, promote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Soviet area, and further enhanced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Soviet area.

Key words: the Fujian Soviet area;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ncept; socializatio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新中国小城镇发展与治理问题研究

郭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小城镇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取得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镇治理思维滞后和人才匮乏的短板。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未来小城镇的发展要强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改变,吸引更多人才,培养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城镇发展治理的主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加强对小城镇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小城镇发展;历史经验;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2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73-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1]。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因而城市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6.16%,^[2]城市人口占据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换户口买房进城的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即使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城市化人口达到70%,中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还有相当距离。城镇作为城乡结合、融合发展的关键,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2023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3]。城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中涵盖了新型城镇化之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城乡融合发展,就是小城镇的内涵式发展之路。

古代中国社会的城镇多以集镇、军事堡垒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政策,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4]在工业化、城市化双重影响下,新中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中央高度集权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城市的发展与治理模式也是国家管理主义下的集权式、统一式的单位制和区域均衡政策,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却因城乡分割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差异,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一、新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的城市化根据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发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以国家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发生为依据,这三个时期国家对小城镇的认识有着较大差异。我们之所以将新中国城市历史7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主要基于影响新中国城市发展的三个关键时间节点。^[4]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是新中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

收稿日期:2024-05-19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市发展治理研究”(232400410267)

作者简介:郭凯(1979—),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院长、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

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5]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发展重点在于城市的生产职能,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滞后;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八大后,小城镇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特别是苏南地区宜工宜农的小城镇成为小城镇的标杆。小城镇不仅强调生产职能,也重视消费职能,小城镇的标准不断提高,城市可容纳人口不断提升。2014年小城市的标准提高到城区常住人口在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6]第三个阶段是从十八大至今,这一时期国家吸取了以往城市化的经验教训,逐步走出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的城市化模式。

作为农业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虽然城市化率一再提高,中国依然保持着农业社会的诸多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超出寻常的速度走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但也面临着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先后遇到的诸多问题,诸如住房短缺、基础设施短缺、商业设施匮乏的问题,也碰到过城市蔓延、开发区过多、大城市病、郊区化、资源型城市衰退、旧城历史文化破坏、城市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现在又面临大城市房价过高、城市制造业乏力、互联网经济冲击实体商业、乡村发展落后,也遇见消费低迷不振,城市发展缺乏后劲,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等新问题。无论新旧问题,从国际视野和历史长河来看,这些问题都有先例可循,都有相对应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

(一)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

小城镇衔接着中国社会的城市与乡村,但对小城镇的发展理念上却高度强调城市的生产职能,而忽略其链接乡村振兴的社会职能。首先是小城镇生产职能偏弱,多数小城镇难以担负起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作用,地方财力不断萎缩。特别是2014年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开始低于地方财政支出增速,2019年地方财政收支增速分别为3.25%、8.26%,二者相差约5个百分点,同时梳理2011—2019年数据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降幅已超80%,这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收入已进入低位增长期,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严峻。^[7]学术界有不少强调大城市的经济聚集作用,提出发展大城市的主张,以经济发展水平论,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大城市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占比最高;以城镇化水平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大城市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占比越高。且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化发展处于正常范围,不管是从

人口规模还是从经济与城镇化发展前景来看,大城市化居于主导地位都是大概率事件。^[8]但大城市的经济聚集功能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的快速城市化是在取得工业化巨大成绩之上的城市化,过于强调小城镇发展治理中缺乏的经济职能本身就是小城镇发展目的的悖论。20世纪80年代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是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人口不断涌向城市的结果,而非小城镇自身发展的结果。进入21世纪后,乡镇企业不断与基层政府脱钩,在消耗完有限的土地资源红利后小城镇的发展再次陷入困境,特别是中部省份多数中小城镇不具备强大的造血功能,地方财力增长有限。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依靠国家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再次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分类,利用城市群和城市圈的建设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而非只强调小城镇的经济职能,大小城镇的经济发展模式差距甚大,决不能一概而论。

(二)小城镇发展的治理理念滞后

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照搬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理念,却忽略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小城镇的熟人社会并不适应过于苛刻繁琐的社会管理机制,现有的许多管理理念与机制是基于经济高速运行的大城市,推广至小城镇就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这与我们国家还处在一个巨大转型阶段和地区发展差异有关。实际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仍会持续约30年,期间乡村社区形态不断变化,人口老龄化和乡村空心化的状态难以迅速解决,公共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只有高速的城市化进程趋于平稳之后,农村社会治理的繁多问题才会减少。因此,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内,所谓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并非都是基层干部的懈怠与推脱,而是社会治理理念和行为的巨大反差,比如基层财政制度不能从账面上完全显示,钱怎么花始终是个研究难题。在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面前,服务理念和全能型政府难上加难,出现社会治理难题是必然结果。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措施明显脱离基层实际,一旦贯彻有误,基层就会被指责为不作为,容易忽略基层真实的需要和实际情况,类似情况在各类工作中都习以为常。缺乏相关的治理理念并非是小城镇照搬大城市经验,还包括大城市管理者在治理小城镇时简单解读、照搬成套大城市管理经验。

(三)小城镇发展的人才匮乏

目前小城镇基层社会治理多数是追求制度设计的监督目的和可操作性,试图以制度的合理性代替人的现代性,忘却了合理制度需要高素质的人来运

行,多数的制度设计需求是以工具理性为目的,考虑价值理性少之又少,一方面是价值理性本身难以估量,另一方面是价值理性难以达成共识。比如乡财县管、村财乡管,看似监督保证,却容易滋生新的权力寻租,事权和财权的分离更像是对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缺乏信心和自身的过度自信。再比如仅提高农村党支部或者社区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经济待遇,以为解决乡村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福利待遇问题就可以加强党支部战斗力,恐怕过于乐观。马克思坦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务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9]。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终要提高基层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包括基层社会治理者和参与者。因此,如何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社会治理主体,将是我们应对未来更多严峻挑战的关键。而现有的小城镇经济发展水平是难以保证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随着人口的逐渐减少和高素质人才的外流,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将会面临更多的困境。

二、小城镇社会治理的建议

小城镇的基层社会具有城市和乡村的双重属性,治理的主体、客体和范围涵盖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于小城镇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既要考虑城市治理,又要考虑乡村振兴。总体上看,城市社会治理的内容具体为:首先要有一个多元化参与的治理主体。^[10]对于小城镇的社会治理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面,应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小城镇的基层政府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单一主体转变为主导力量和兜底保障,让小城镇的基层政府从全能型政府转型为社会治理的主力军,转变社会治理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新体系,构建基层治理的新格局。

(一)转变对小城镇发展的偏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小城镇治理最难之处是如何在小城镇真正建立人民城市理念。人民城市的本质在于城市发展成果最终由人民共享,尽管目标明确,却难以真实界定目标。本文假设要实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社会治理理念,就是建立起以人为中心、极具包容性且富有弹性的城市治理模式,要把城市掌控权从各类精英手中收回,让市民、新型职业农民和社区、乡村决定城市前进的方向。任何精英阶层治理理论都将导致城市由资本主导,其治理依靠资本治理,那么城市发展的任何成果也最终由资本主导进行分配,小城镇的功能作用也难以有所发挥。尽管 20 世

纪 80、90 年代的小城镇发展思路有一定的误区,但建设更多的宜居的小城镇、利用小城镇发展消弭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是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意义。要改掉社会对小城镇的偏见,不能以工具理性衡量小城镇的城市功能,要看到小城镇在城市化体系中难以替代的缓冲作用和人力资源的蓄水池作用。既要反对将小城镇完全等同于大城市的发展理念,也要反对将小城镇视为“大号农村”的偏见,要认识到小城镇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在社会中形成对小城镇新的看法和发展理念,不能一味强调小城镇的经济职能,更应看到小城镇的发展是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的关键。小城镇提供给社会更为有效的公共服务,为进一步提升高质量城市化提供有效路径,任何社会治理模式最终目的不是对人的管控,而是通过有效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智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人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幸福感,最终服务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转变对小城镇的定位和认知,小城镇自身发展中也要转变认知,将人民城市的理念发挥得更好。

(二)转变小城镇社会治理思维范式

如何全面建立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思维范式的挑战,一是管理技术的挑战。^[11]思维范式的改变是小城镇社会治理的首要,其中也包括对传统观念全面否定的再次认识,比如“一刀切”管理模式,一方面这种工作方法可以发挥很好的便利性和较低的运作成本,因此不时被各级政府采用;而另一方面精细化管理背后高昂的行政运作成本却少人有谈及。如果理性看待“一刀切”背后的行政运作成本,可以理解为何基层社会治理中经常性出现“救火式”治理,中西部小城镇有限的财政预算资金无法提供更为详细丰富的公共管理服务,“一刀切”的便利性、可操作性是多数小城镇工作所需。但“一刀切”的行政化手段也减弱了行政工作在公共服务质量和回应性方面的有效性,也降低了社会公众对城市基层政府人员的信任度和认同度。当某一事件与政府人员存在关联时,就立刻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全面关注和声讨,致使城市基层政府的合法性面临巨大考验。^[12]“一刀切”行政逻辑的背后是社会治理理念,是传统政府大包大揽的全能式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主体的缺失,其存在虽有重要作用,但也容易以先入为主的研究框架固化基层干部群众和社会治理理念,其研究结论只能满足道德层面的需要,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国家工业化和基层社会组织化的治理方式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的两翼,

相关战略也都围绕此战略展开,“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延续至今。现阶段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客观上加大了农村地区社会治理的难度: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后,形成人口庞大的农村留守群体;家庭成员的分居对农村传统稳定的婚姻家庭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乡村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土地征用、拆迁等利益冲突和突发事件频发等,^[13]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依然难以妥善解决。

因此,当事权的不断扩大化与有限的财政收入发生冲突时,试图以较低成本运作复杂的基层社会的方式就显得捉襟见肘,全能型的治理方式要有所转变,基层社会的组织化自治愈发重要,选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成为关键。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塑造的基层治理理念和治理远景来看,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且二者的实施路径和实施主体是一致的,所以基层治理新格局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社会治理中心。以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为核心,并随之展开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就是说未来新型职业农民是城镇居民,是乡村振兴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主体。小城镇治理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和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熟人社会的转型,让小城镇的政府从全能运动选手转变为社会治理的运动员兼裁判,才能构建小城镇基层治理的新思维。

(三)转变小城镇的人才观念

从我国大多数乡村的实际情况和数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依靠乡村内生力量实现振兴的是极少数特例,这些典型案例不具备推广的现实可能性,江浙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型,众多小城镇经济发达,治理成熟,中西地区学习复制容易“邯郸学步”。综合中西部大多数小城镇的基层社会治理来看,以基层政权为核心,以资源注入和帮扶为主的外生型社会治理占据多数,也具备推广的机制和复制的可能,这也符合中国国情和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需要。但人的因素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因素,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化,小城镇更难吸引年轻人才,因此不拘一格降人才、将乡村振兴和小城镇的发展眼光集中在乡村社会自身、集中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才具有价值意义。比如城市社会治理逆行政化创新的本质是重塑社会治理主体,任何完善的机制都需要人才的支撑,人才是机制的最大软肋,人才也是弥补机制运行缺陷的灵丹妙药。所以,任何社会治理和振兴方案的制定都应首先考虑人的因素,考虑社会治理的主体。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提倡的“人民城市理念”为社会治理理念,高度重视小城镇社会治理过程中中间阶层的培育,以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家庭农场主为首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将新型职业农民视为小城镇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放权给钱”以更为灵活的机制激发基层政权和新型职业农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同时通过新型职业农民打造城乡融合发展,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和城镇居民只是人的职业属性,而非身份属性。让更多拥有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城镇居民成为社会治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改变以往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全知全能全责型的治理方式,通过社会治理群体的变化改变社会治理体系,倒逼基层社会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善治”,以人的进步推动社会治理的发展。

人民城市是服务人民,一切技术手段和治理体系都是为了服务“人”,人在城市中的权利是一种高级的权利形式,包括实现自由的权利、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个体化的权利、享有居住环境的权利、生活和居住的权利;同时也包括参与权和占有权(侧重于对使用价值的占有而非财产权)。^[14]因此打通城镇居民与新型职业农民两者之间的通道、造就更多成熟理性的基层社会治理群体是基础也是关键。在小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上,确立家庭农场为乡村农业经营的主体、乡村振兴的主体、小城镇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充分培育和发展这一群体,提升家庭农场主和新型农民的参政意识,这些既从事生产劳动又参与分配资源的农业劳动者和农业企业家通过对新的机会和刺激因素做出反应,构成了农业生产中人力资源占主导地位的远大前景。^[15]要提高家庭农场主们的政治待遇,确立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主体,才能逐步探索和实现各类社会治理方案。抛开实施主体谈实施方案就是本末倒置。本文认为社会方案的实施必须配合成熟稳定的社会治理实施主体,而培育培养以家庭农场主为主的各类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而非社会治理的各类文本方案。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文报告[EB/OL].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

- [3] 如何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政策问答·2024年中国经济这么干)[EB/OL]. 中国政府网. [2024-02-08].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0874.htm.
- [4] 何一民. 新中国城市历史分期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2):187-188.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430.
- [6] 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EB/OL].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4-11-20]. https://www.gov.cn/xinwen/2014-11/20/content_2781156.htm. eqid = d5bca5fd0000437800000003647beb04.
- [7] 梁丽娟, 刘朵丽, 靳小翠. 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地方财政收支差距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J]. 河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 2024(4):28.
- [8] 宋迎昌. “大城市化”发展趋势探究:基于联合国世界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分析[J]. 城市问题, 2021(1):8.
- [9] 卡尔·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 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5(1):9.
- [10] 陈明珠. 发达国家城镇化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D]. 北京:中央党校, 2016:107.
- [11] 蓝志勇, 魏明.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1):7.
- [12] 彭勃. 从行政逻辑到治理逻辑:城市社会治理的“逆行政化”改革[J]. 社会科学, 2015(5):20.
- [13] 姜德波, 彭程.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现象、成因及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视角的分析[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8(1):20.
- [14] 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M].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Press, 1996:173-174.
- [15] 西奥多·舒尔茨. 对人进行投资[M]. 吴珠华,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3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Small Tow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O Kai

(Business school,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New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fter going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lagging urban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lack of talent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small town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utur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models, attract more talents, cultivate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mainly composed of family farm owners as the main body of tow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novate the way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in small towns.

Key words: small tow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governance

政民在线互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民 积极情绪的影响研究

——基于共情的中介作用分析

李平芬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情绪治理对政府部门风险沟通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基于风险沟通理论和共情传播理论,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网络积极情绪,以风险认知为调节变量构建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因素评估模型,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政民在线互动正向影响网络积极情绪的形成;共情在政民在线互动和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影响路径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网络积极情绪;政民在线互动;共情传播;风险认知;结构方程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3

中图分类号:G206;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78-08

一、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抖音、微信、微博为主要代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成为网民情绪聚集、网络舆情迸发的重要舆论场。网络情绪是民众现实情绪在网络上集体情感的反映,民众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对信息的理性分析存在缺失,一旦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排解,很可能引起谣言泛滥、社会失序等次生危机,甚至对组织现有的平衡状态产生威胁,严重冲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提出:政府需要加强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监督与引导,关注网民情绪,引导网上舆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塑造以积极情绪为主的舆情氛围,对实现网络社会和谐稳定和现实社会公共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网络积极情绪的研究主要聚焦“它影响了谁”和“谁影响了它”两个方面。部分学者认

为网络积极情绪对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民众的风险感知和公众接受行为意愿等产生影响。例如:肖争艳等(2019)研究发现中小投资者的网络参与热情在股市的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羊群效应。樊博等(2017)对环境风险议题分析后,认为公众积极情绪强度的下降会造成风险感知水平的提升。牛金玉等(2020)通过分析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之间互动状况发现,具有积极情绪的居民对政府风险沟通效果评价的满意度较高,更愿意接受相关政策。

也有部分学者从文化和民众个性特征等方面探索引发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因素。在客体方面,研究者主要从引发网络积极情绪的社会文化、政府回应、同伴影响等方面开展研究。例如:Neal C.等(2004)认为网络积极情绪受文化差异和立场等因素的影响。王磊等(2022)提出网络问政平台忠实反映了疫情防控期间公众情绪变化,数字政府回应及时,在疫情防控期间携带情绪的舆情更倾向于积

收稿日期:2024-05-08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大学生群体情绪风险识别与动态预警机制研究”(23YJA630044);2022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边境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识别与治理机制研究”(22BGL013)

作者简介:李平芬(1975—),女,湖南株洲人,硕士,广西职业师范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应急管理、公共管理。

极。张骞(2023)认为乐观者可以为同伴激发营造积极的网络氛围,还能促使积极情绪在同伴网络的扩散和传播。在情绪主体方面,研究者主要从情绪主体的共情、风险认知、个性特征等方面开展研究。例如,周宵等(2019)提出共情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情绪表达,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的风险认知评价。王俊秀等(2020)研究发现人们对疫情的风险认知能够显著负向预测积极情绪体验,正向预测消极情绪体验。

本文梳理发现网络积极情绪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涉及政府与民众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影响的研究不多,对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内容的共情水平、政民互动策略选择将激发公众情绪等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还不足^[1]。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实施了良好的政民双向互动策略,且多个地区在不同时间段实施了封闭式管理,引发了其他地区民众的共情,期间民众也经历了对风险认知从懵懂到较清晰的心路历程。这使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基于共情传播与风险沟通理论,深入挖掘政民在线互动与网络积极情绪之间的影响关系成为可能。李春雷等(2019)提出参与者在社交媒体的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参与是影响网民情绪状态的重要因素。宋宪萍(2022)发现个体的风险认知高低取决于社交互动的程度。陈凌婧(2022)认为网民情绪的触发是基于对家国情怀的共鸣与共情。可见,互动、共情、风险认知等对公众情绪产生重要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在线互动与网络积极情绪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情和风险认知等因素在其关系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鉴于此,本文根据郭润萍等学者的观点^[2],将政民在线互动分为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两个维度,并引入风险认知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线上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作用关系,探究风险认知和共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民积极情绪影响的作用机理,丰富社会情绪领域的研究,为构建以网络积极情绪为主导的舆情环境提供一种新思路。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政民在线互动与网络积极情绪

互动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以信息传播为基础而发生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多地通过在线互动去满足社交需求。郭润萍等提出社会互动方式分为信息互动和情感互动两类^[3],人们在网络平台进行诸如浏览、搜寻、发帖、回帖等一系列能动性

行为,不断调整认知和投入情感,满足了网民对信息和情感互动的诉求。本文也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政府与民众在线互动分为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在线信息互动是政府通过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等载体与民众交流突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的互动行为^[4];在线情感互动是政府和民众在一个共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领域中,通过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情感转让的互动行为^[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信息的质量(有效性、确定性、可靠性等)和形式(图片、文字、视频等)会影响个体情绪产生的速度和强度,个体的情绪或行为受到他人的情绪或行为的证实而获得信息,进而导致情绪的放大和行为的极化^[6]。根据风险沟通理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直接影响民众的思维模式、需求和态度,使其情绪情感发生变化,并在社交网络的披露和激化中成为集体性的网络情绪。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在线互动中政府不仅要为公众提供事实信息,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关照公众的情感。在信息互动过程中,政府在政务平台直播或转发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并对民众的建议和期待作出回应,使得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进而支持公共政策^[7],充满了对防控成功的希望,从而产生较为积极的情绪。在线情感互动过程中,政府关注点还应聚焦安抚公众情绪,从社会风险感知、公众情绪结构等角度提炼相关信息,实现价值表达和情感调适。民众感受到被理解、被关爱的情感,在社交平台与其他人产生共鸣并建立友谊和信任,产生实施具体行动的责任感和积极向上的情绪。同时,当个体的合规行为被肯定时,更是产生了践行规则的决心和自尊自爱的积极心态。

可见,网络民众个体的态度和情绪会受到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台表达的态度和情绪的感染,同时也影响着政府部门进一步的方案部署。在这种情境下,政民之间提升了彼此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网络联系,行动意愿和积极情绪得到进一步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H1a:在线信息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H1b:在线情感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

(二) 政民在线互动与共情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民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共情过程包括受众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过程,民众情绪变化受危机信息的特征、强度以及

信息中携带的情绪影响^[8]。共情作为理解他人、关爱他人的情感基础,能有效缓解民众的情绪体验,更好地接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情境,并重塑建立在互联网媒介之上的情绪状态。李鹏等(2022)提出社交媒体可通过多样的互动机制引导大众共情并激发积极态度。林心宇等(2021)提出政府部门在与民众的互动渠道中需要传递情感与人文关怀,民众的积极情绪在网络环境中交叉流动,形成群体内的共情机制。因而,民众情绪会在社交互动时与他人共情而发生变化,并做出相应行为的反应。例如,在新冠病毒防控阶段:一方面,民众在认知共情过程中,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在线发布信息,民众接收相关信息后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事态发展有所帮助,也激发出对政府部门治理政策的支持以及管理难度的理解,进而产生认知共情;另一方面,民众在情感共情中,在线感受到来自政府的情感支持,缓解了惊慌感和焦虑感,增进了彼此间的理解,使政民间产生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让民众对政府提出的行为准则表示认同,自身遵守规则一旦受到认可和赞赏,更对事态发展充满信心。可见,有效的政民在线互动增加了互动主体间的共情能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政民在线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H2a:信息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H2b:情感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

(三)共情与网络积极情绪

共情传播理论认为民众对突发事件能够产生心理移情和情绪共振,一方面表现为情绪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有意识的情绪分享,进而影响更多人的情绪。传统严肃的新闻范式并不能通吃所有受众,人们在新媒体时代不仅仅追求理性、客观的信息,还有感性表达诉求的需要。人们对唤醒自己情绪的图片、文字、视频等信息产生情绪认同,并产生分享的欲望,通过点赞、转发等形式产生复合式互联网传播,该种情绪随之在社会网络中形成病毒式感染^[9]。本研究中,受传者基于情感的一致性对信息进行“同向解码”,随着情感的不断“传染”,形成范围逐渐扩大的网络情绪。

共情可以带来认知上的改变,认知的改变引起了情绪及态度上的认同。比起传统的理性传播,共情传播更有助于打破沟通主体间的隔阂,从情感的共鸣到认知的共鸣,最后达到内化的认同,沟通效果更为显著。共情传播的特征在网络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显著。根据共情传播理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初始阶段,民众处在各类非理性网络情绪应

激爆发的舆论环境中不知所措,政府部门通过政务平台信息发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进行风险沟通,在沟通中客观准确地传递出相关信息,从而让公众平静下来;同时也精准化地表达了观众的真实感受,较好地实现了对民众复杂应激心理的共情,通过树典型、挖亮点等正面引导,把各类负面网络情绪成功转化为同心抗疫的中国力量和制度自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共情对网络积极情绪生成有正向影响,并在政民在线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3a:共情在信息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生成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共情在情感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生成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风险认知的调节作用

风险认知指民众依赖个人主观直觉判断对情境中各种危险事物的风险进行认知评估^[10]。个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拥有积极情绪和正确抗疫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身的风险认知水平,民众的风险认知水平引发他们在接收信息时的共情心理。时勘等提出人们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有差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与民众的积极互动激发民众风险认知的共情动机,发挥其激励效应,通过正向影响增加民众积极的应对行为。李宗亚等(2021)提出通过增强民众在社会层面的疫情风险感知来引发共情,促进形成积极友善情绪和助人帮扶行为。对风险认知越高的个体,越能看待诸如病毒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认为免疫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病毒的斗争史,增强了对病毒的认知度和抗疫的积极性。政民在线互动的在外刺激使得人们更关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地区的情况,引发共情,更愿意遵守抗疫规则。风险认知越低的个体,越不相信专家意见,更容易放任自己某些不守规则的行为,面对规则易暴易怒,更不会真正关心他人的安危。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不满情绪,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共情路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信息互动对共情的影响越显著。

H4b:风险认知对在线情感互动—共情路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情感互动对共情的影响越显著。

H4c: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积极情绪路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风险认知越高,在线信息互

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越显著。

H4d: 风险认知对在线情感互动—积极情绪路径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风险认知越高, 在线情感互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越显著。

综上, 本文结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将政民在线互动分为信息互动和情感互动两个维度, 并将其作为网络积极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引入共情和风险认知两个变量, 探究政民在线互动和网络积极情绪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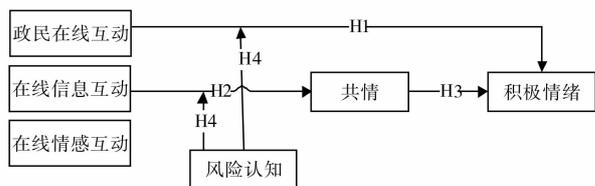


图 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2020 年初开始暴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来势凶、攻势猛, 是一起重大的、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本研究选择民众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间政民线上互动及情绪特征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设计的问卷分为被测者的基本信息统计和政民在线互动、风险认知、共情、积极情绪等变量的测量项两部分, 利用 SPSS21.0 软件和 Amos21.0 软件对调查数据检验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合理性。

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对我国多个省市网民抽样调查, 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 日到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为保证样本的广泛性、代表性以及信效度的合理性, 随机发放 40 份问卷进行预调查, 通过咨询专家、小组讨论后进行相应修改后才进行正式调查, 共发放 1350 份问卷, 回收问卷 794 份, 剔除答题所填选项高度一致、时间过短的无效问卷, 剩余 664 份有效问卷, 有效率 83.6%。参与调查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 占 58.4%; 由于年轻群体更愿意在社交平台互动, 被调查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1—30 岁, 样本量占比 48.2%; 从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来看, 61.1% 为本科学历; 从职业来看, 41% 为学生。该样本调查对象涵盖了不同的年龄段、文化程度、职业等, 说明调查对象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和代表性, 可用于研究分析。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作答 (1 = 完全不符合; 5 = 非常符合)。其中, 政民在线互动的测量题项改编于 Nambisan 等人及王建民等人开发的量

表^[11]; 风险认知的测量采用谢晓非等编制的针对 SARS 风险认知的量表改编而成^[12], 从使用风险可能性、风险严重性、风险未知性、风险可控性、风险熟悉性等维度评估了被试者所感知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程度; 共情的测量根据王协顺等编制的共情量表测量^[13], 其中包括近端响应、远端响应、观点采择、在线模拟、情绪传染等维度; 在线积极情绪采用刘君玲等开发的量表^[14], 有自豪情绪、赞赏情绪、理解情绪等维度。具体变量题项如表 2 所示。

四、数据分析

(一) 信效度检验

从表 2 可以看出, 5 个潜在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 >0.8 , 说明设计的调查问卷从整体上能够有效测量所收集到的信息, 量表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

本研究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两个方面对问卷进行评价。本研究的问卷内容均改编自现有文献中的成熟量表, 经过多位专家推敲后做出适当的修正, 内容效度良好。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构效度 (主要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通过观察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提取值检验收敛效度。从表 2 可以看出, 各题项因子载荷值在 0.678—0.877 之间, 各维度的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7, 达到标准, AVE 均大于 0.5, 达到标准, 显著性概率 $P < 0.001$ 。根据 Fornell C 等的建议, 所有变量 AVE 的值大于 0.5, CR 值大于 0.7 时, 说明样本数据的收敛效度较好。可见, 本模型的内在质量理想, 稳定性好, 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如果测量模型中的潜在变量的平方根值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任何一个潜在变量的共同方差 (或相关系数平方值), 则表示潜在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从表 3 可见, 5 个因子的 AVE 平方根依次为 0.748、0.764、0.953、0.729、0.850, 均高于 0.5 的门槛值, 且均大于 5 个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值, 说明该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较好。

(二) 共同方法偏差和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Podsakoff 等提出未旋转载荷平方和单因子不超过 40%, 说明样本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检验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见载荷的第 1 个单因子解释变异为 29.033%, 未超过 40%, 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即该问卷调查的结果良好。

采用 Amos21.0 软件对 664 份问卷数据与理论模型进行适配度拟合, 其检验指标结果如表 5。

表2 信效度检验结果及变量题项来源

变量	测量题项	标准因子载荷
在线信息互动 (Cronbach's Alpha = 0.834, CR = 0.835, AVE = 0.560)	1.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发生地区的相关信息”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83
	2.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他人破坏防疫行为的短视频、新闻”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695
	3.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感染区人们生活状况的相关信息”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24
	4.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对发布的“疫情防控的有效措施”下留言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86
在线情感互动 (Cronbach's Alpha = 0.874, CR = 0.874, AVE = 0.583)	1. 当我对疫情发展感到担忧时,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寻求权威信息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慰	0.802
	2.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发表对疫情防控问题的看法和个人感受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42
	3.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发表对他人违反防控规范行为的看法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14
	4.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真诚地发布对疫情防控的情感并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	0.716
	5. 我会在政务微博等数字政府平台上主动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并成为朋友	0.836
风险认知 (Cronbach's Alpha = 0.900, CR = 0.900, AVE = 0.644)	1. 我如果到处乱跑,极有可能被传染	0.863
	2. 我知道一旦被传染,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0.805
	3.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比以往的疫情更严重	0.751
	4. 我认为抗击疫情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0.781
	5. 我清楚知道哪些行为有利于疫情防控	0.808
共情 (Cronbach's Alpha = 0.847, CR = 0.849, AVE = 0.532)	1. 我能理解疫情区居家隔离的感受	0.749
	2. 如果我也处在疫情感染区,我也会老老实实居家隔离	0.678
	3. 我愿意转发疫情暴发区人们发出的生活感受等文字或视频	0.681
	4. 我会担心我所在地区有人受到感染	0.704
	5. 我能真切体会到疫情暴发区民众内心的痛苦	0.823
积极情绪 (Cronbach's Alpha = 0.886, CR = 0.887, AVE = 0.724)	1. 当我认为应对疫情我们某些方面做得不错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QQ、抖音等)谈论自豪的话语	0.877
	2. 当别人能按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去做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QQ、抖音等)谈论赞赏的话语	0.856
	3. 当别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困难时,我会在社交平台(如微信、QQ、抖音等)表达理解的话语。	0.818

表3 变量的区分效度检验

	在线信 息互动	在线情 感互动	风险 认知	共情	积极 情绪
在线信息互动	0.748				
在线情感互动	0.324	0.764			
风险认知	0.273	0.316	0.953		
共情	0.373	0.314	0.131	0.729	
积极情绪	0.450	0.403	0.172	0.439	0.850

表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6.387	29.033	29.033	6.387	29.033	29.033
2	3.190	14.501	43.534	3.190	14.501	43.534
3	2.255	10.249	53.783	2.255	10.249	53.783
4	1.927	8.761	62.544	1.927	8.761	62.544
5	1.469	6.675	69.219	1.469	6.675	69.219

表5 模型适配度检验值

指标	X2/df	PCFI	GFI	RMSEA	NFI	TLI	CFI
统计值	1.403	0.817	0.948	0.035	0.943	0.979	0.983
参考值	<3	>0.50	0.9	<0.08	>0.9	>0.9	>0.9
达标情况	达标						

$\chi^2/df = 1.403$; $PCFI = 0.817$; $GFI = 0.948$; $RMSEA = 0.035$; $NFI = 0.943$; $TLI = 0.979$; $CFI = 0.983$ 。这些指标均符合 MacCallum R C 等推荐的可接受范围,说明理论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良好,

表明研究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1. 主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 AMOS21.0 软件对回收的调查数据分别进行模型的路径分析和研究假设。温忠麟等提出路径系数 β 值越大,表明变量之间的相关作用强度越大。并且,临界比例 C. R. 值大于或等于 1.96,即可说明在 0.05 显著水平下有显著差异。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的结果见表 6 所示。

根据表 6 可知,所有路径系数绝对值均介于 0~1 之间,各条假设对应的 C. R. 值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且 $P < 0.001$,在线信息互动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为 0.277, C. R. 值为 4.341,故 H1a 成立;在线情感互动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为 0.231, C. R. 值为 3.866,故 H1b 成立。综上,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在线信息互动对共情的路径系数为 0.303, C. R. 值为 4.474,故 H2a 成立;在线情感互动对共情的路径系数为 0.217, C. R. 值为 3.353,故 H2b 成立。综上,政民在线互动对共情有正向影响。共情对积极情绪的路径系数为 0.262, C. R. 值为 4.171,故共情对网络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可见,研究结果全部支持主效应模型。

表6 主效应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关系	Estimate	S. E.	C. R.	P	检验结果
H1a	积极情绪 < - - 在线信息互动	0.277	0.065	4.341	***	成立
H1b	积极情绪 < - - 在线情感互动	0.231	0.057	3.866	***	成立
H2a	共情 < - - 在线信息互动	0.303	0.056	4.474	***	成立
H2b	共情 < - - 在线情感互动	0.217	0.050	3.353	***	成立
H3	积极情绪 < - - 共情	0.262	0.078	4.171	***	成立

注:***表示 $P < 0.001$ 。

2.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 Hayes 等提出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法检验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设定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置信区间设为 95%,若间接效应置信区间不包含数字 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7 中介效应显著性 Bootstrap 检验分析结果

变量	路径	效应值	Lower	Upper	P
在线信息互动	在线信息互动—积极情绪	0.277	0.156	0.392	0.000
	在线信息互动—共情—积极情绪	0.080	0.036	0.132	0.000
	总效应	0.357	0.241	0.463	0.000
在线情感互动	在线情感互动—积极情绪	0.231	0.116	0.349	0.000
	在线情感互动—共情—积极情绪	0.057	0.018	0.103	0.002
	总效应	0.288	0.173	0.404	0.000

由表 7 可知:在线信息互动→共情→积极情绪中介效应为 0.080,95% 置信区间为 [0.036, 0.132],不包含数字 0,说明共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3a 成立。在线情感互动→共情→积极情绪中介效应为 0.057,95% 置信区间为 [0.018, 0.103],不包含数字 0,说明共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H3b 成立。综上,共情在政民在线互动与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3. 调节效应检验

(1) 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网络积极情绪”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多元层次回归法检验风险认知对主效应路径的调节作用,结果见表 8。由表 8 可知:模型 1 中年龄、职业对积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模型 2 加入

自变量后,在线信息互动($\beta = 0.302, P < 0.05$)和在线情感互动($\beta = 0.277, P < 0.05$)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把调节变量风险认知加入模型 3 中,自变量在线信息互动($\beta = 0.301, P < 0.001$)、在线情感互动($\beta = 0.276, P < 0.001$),调节变量($\beta = 0.007, P < 0.05$)依然对因变量积极情绪作用显著。最后,将在线信息互动×风险认知和在线情感互动×风险认知的交互项代入方程,其回归系数分别为($\beta = 0.128, P < 0.05$);($\beta = 0.207, P < 0.05$),说明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同时从表 8 可见模型 4 的 R^2 (0.307)显著高于模型 3 的 R^2 (0.238),说明模型解释能力增强。

表8 风险感知在主效应路径中的调节检验

		积极情绪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001	-0.006	-0.005	0.024
	年龄	0.127**	0.057	0.057	0.043
	学历	0.094	0.100	0.100	0.081
	职业	0.166**	0.063	0.063	0.056
自变量	在线信息互动		0.302***	0.301***	0.274***
	在线情感互动		0.277***	0.276***	0.286***
调节变量	风险认知			0.007*	0.033
交互项	在线信息互动×风险认知				0.128*
	在线情感互动×风险认知				0.207***
	R^2	0.032	0.238	0.238	0.307
	ΔR^2	0.020	0.224	0.222	0.287
	F	2.695*	16.925***	14.466***	15.816***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由上可见,调节变量风险认知对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4c、H4d 得以验证。

(2)风险认知在“政民在线互动—共情”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执行 SPSS Process 中的 Model 8 得出中介路径中风险认知的调节作用,其结果见表 9。由表 9 可知:当风险感知程度不同时,在线信息互动对共情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95% 置信区间分别为 [0.001,0.079][0.063,0.195],均不包含数字 0;不同风险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95% 置信区间为 [0.040,0.013],不包含数字 0,说明风险感知对“在线信息互动—共情”路径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当风险感知程度不同时,在线情感互动对共情的 95% 置信区间分别为 [-0.018,0.066][0.060,0.186],高风险感知包含 0,说明不显著,低风险感知不包含 0,说明低风险感知对“在线情感互动—共情”路径调节作用显著;在不同风险认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95% 置信区间为 [0.033,0.118],不包含数字 0,所以 H4a、H4b 成立。

表 9 风险感知在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变量	变量	效应值	S. E.	Lower	Upper
在线信息互动	高风险感知	0.033	0.020	0.001	0.079
	中风险感知	0.076	0.022	0.013	0.040
	低风险感知	0.120	0.034	0.063	0.195
	效应值	0.040	0.015	0.015	0.077
在线情感互动	高风险感知	0.019	0.021	-0.018	0.066
	中风险感知	0.066	0.021	0.033	0.118
	低风险感知	0.133	0.032	0.060	0.186
	效应值	0.043	0.015	0.018	0.079

五、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问卷所取得的数据,探索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产生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首先,政民在线互动对民众共情以及网络积极情绪的生成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风险沟通理论和共情传播理论,当民众在风险沟通平台上进行信息互动和情感互动时,如阅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询问确认某些不确切的信息、表示对现状担忧的留言等都能得到权威回复,他们在互动交流中更能全面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起因和现状,激发对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区民众的同理心,也能把自己消极的情绪在互动中淡化,积极的情绪在互动中生成,从而感染平台上更多的人,并采取更多积极的行动配合政府的工作。这说明政民在线互动不仅

是激活民众共情的因素,也对网络积极情绪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可见,政民在线互动是民众情绪的“减压阀”,政府组织应当给予民众更多的“情绪关怀”,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认知良好,政民关系才会更加和谐稳固。

其次,共情中介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人们更愿意接受和传播自己情感上认同的新闻信息。风险沟通平台采取共情传播策略,凝聚人心,就要在文本内容中注入引发读者情感共情的元素。新闻报道等文本以信息交流的方式衍生出情感交流的场域,因此,经由信息内容建构的情感互动现象就此产生。风险沟通中政府部门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参照民众的情感需求,找到政民互动最佳的情感共振点。根据共情传播理论,传播主体需要积极进行情感议程设置,即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以信息传播为媒介和纽带,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开展信息互动和情绪互动,力求达到情感的共享和沟通的目的。因此,当民众在风险沟通平台进行信息和情感互动时,频繁的信息和情感刺激会引发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感同身受,激发民众抗击疫情的责任感,进而产生让积极情绪蔓延网络的行为。可见,个体产生共情是民众传播积极情绪的有效途径。

最后,风险认知对政民在线互动影响共情以及网络积极情绪的路径具有调节作用。谢晓非等学者发现个体对风险的认知等变量与个体情绪直接有关,可以成为考查和调节个体心理状态的途径。因此,在政民在线信息互动和在线情感互动过程中,民众对风险知识的了解和对疫情区人们的共情都会影响其心理状态,个体在风险沟通平台互动越多,越能理解突发事件的现状,越能产生抗击疫情的责任感,进而以积极的情绪在生活中践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机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影响网络积极情绪的因素众多,可能存在多个维度,今后的研究可以探索其他维度因素对网民积极情绪的影响,并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其次,本研究只探究了政民在线互动对网络积极情绪的影响机制,对依此提出的引导政民在线信息、情感互动等措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最后,本文调查问卷的发放限于某一病毒防控时段中,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在其他突发公共事件情境下进行,从

而强化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参考文献:

- [1]唐雪梅,袁煜,朱利丽.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J].公共行政评论,2021,14(1):114-131.
- [2]郭润萍,裴育,尹昊博.社会互动视角下数字创业机会客观化机理:基于数字创意新企业的多案例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3)183-205.
- [3]盛光华,葛万达.社会互动视角下驱动消费者绿色购买的社会机制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81-90.
- [4]朱珂,丁庭印.元宇宙赋能大规模超域协同学习:系统框架与实施路径[J].远程教育杂志,2022,40(2):24-34.
- [5]袁靖华,孙佳雯.传统文化典籍创新表达与传播转化的“情动机制”:以文化类节目为例[J].中电视,2022(10):30-35.
- [6]汪祚军,侯怡如,匡仪,等.群体共享情绪的放大效应[J].心理科学进展,2017,25(4):662-671.
- [7]彭飞,程广鑫,祁勇.把互动带回审批:公共能量场视角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银川模式”为例[J].东岳论丛,2022(5):159-167.
- [8]易魁,王玉琦,许俊.危机事件中互联网“圈子”用户的共情传播机制研究:基于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双过程探索[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60-72.
- [9]刘珍,赵云泽.情绪传播的社会影响研究[J].编辑之友,2021(10):50-58.
- [10]Burns W J, Slovic P. Risk perception and behaviors: anticipating and responding to crises[J]. Risk Analysis, (2012), 32(4):579-582.
- [11]NAMBISAN S, BARON R A. Virtual Customer Environments: Testing a Model of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n Value Co-creation Activitie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09(4):388-406.
- [12]谢晓非,谢冬梅,郑蕊,等. SARS 危机中公众理性特征初探[J].管理评论,2003(4):6-12,63.
- [13]王协顺,苏彦捷.中国青少年版认知和情感共情量表的修订[J].心理技术与应用,2019(9):536-547.
- [14]刘君玲,张雅文,张文兰,等.在线协作学习中大学生的情绪交互评价研究: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J].远程教育杂志,2021(5):87-94.

(责任编辑 林川)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on Netizens' Positive Emotion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alysis of Mediation based on Empathy

LI Pingfen

(Guangxi Voc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7, China)

Abstract: Emotion management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risk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policy formulat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risk communication and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emotions in online networks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By using risk awarenes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an evalu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asses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 citizen online interaction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wired network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verify the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 citizen online interac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online networks, empath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government - citizen online interac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s, and risk awareness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ath of government - citizen online interaction on positive emotions in online networks.

Key words: network positive emotion; government - private online interaction; empathic transmission; risk percep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创新

花亚男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对外传播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文章以文化折扣概念为基础,以河南中原文化为核心,借助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分析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困局,提出拓展对外传播平台,深化文化内容融合,丰富文化传播形式,跟进文化传播技术,强化传播队伍建设等策略,以期削弱文化折扣带来的传播对抗,助力河南中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不断朝着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迈进。

关键词: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文化折扣;文化隔阂;中华文明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86-06

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其中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代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增强国际影响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的一大关键。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传播发展的根源。由于中原文化涵盖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此与黄河文化交织交融,且地域上以河南省为核心,故而亦被称为“河南中原文化”。长期以来,河南省积极探索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其中“2021年河南卫视春晚”的出圈推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迈进一大步,但由于文化折扣现象的存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并不顺利,需要相关主体积极创新传播策略,推动河南中原文化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转变。

一、文化折扣的内涵解析

(一)文化折扣的概念及成因

1988年,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 Mirus)于《美国主导电视节目国际市场的原因》

(Reasons for the U. 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一文中正式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概念,认为由于文化差异性,特定文化下产生的文化产品,如电视节目、电影等在同类文化背景中广受欢迎,但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吸引力迅速下降。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非同属性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度、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接受度有所不同,使得文化产品本身价值被弱化,文化也因此被削弱^[1]。

文化折扣现象的成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之间的自然环境、历史脉络、人文风格、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大相径庭,因而文化结构存在差异,使得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价值损耗。其二,文化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编码和解码方式也会产生文化折扣,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号的不对称与文化关系、意识形态相关,影响着文化传播效果。其三,传播渠道的应用也会使得文化在传输过程中发生损耗,包括传播工具的应用、传播实效的发挥、传播形式的选择等等,皆影响着文化传播过程中折扣的大小与损耗的多少。

收稿日期:2024-06-25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跨文化视角下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河南路径研究”(20023DWT017);2024年度河南农业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语言服务赋能河南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FRZS2024B08)

作者简介:花亚男(1980—),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折扣的价值及应对

折扣起初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为了促进贸易、刺激消费而提出的一种市场运营机制,且折扣的应用只有在合理范围内才能够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一旦超出合理范围便会产生经济负效应。而后,随着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折扣延伸至文化领域,催生出文化折扣的概念,使得文化折扣的产生成为必然,但同样只有将文化折扣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才能提升文化传播效果^[2]。了解文化折扣内涵、探讨文化折扣成因,有助于优化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机制,尽量避免因文化折扣而造成的文化价值损耗和文化传播隔阂,提升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且在加深国际受众对河南中原文化的符号印象、增强国际受众对河南中原文化的价值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折扣的概念和成因来看,彻底消除文化折扣,在不损耗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完成文化传播是一种非贴合实际的理想状态,无论是传受双方自身的文化差异、编码解码过程中的文化解读,还是其他客观传播工具所带来的误差都无法避免。因此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其一,传播主体应明确文化折扣现象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尝试以降低文化折扣的心态开展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其二,传播主体应在尊重与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避免因文化冲突而加重文化折扣。其三,传播主体应运用好对外传播平台,为不同文化交流提供途径,在提升缓解文化冲突能力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文化折扣降到最低,建立和谐的跨文化交流关系。

二、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局

当前,世界在各项技术支持下走向互联互通,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全球化发展逐渐成为重中之重,而中华文化的输出传播对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国内民众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河南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标杆,其发展既要重视对内传承,也要关注对外传播,日益开放的传媒环境使得河南中原文化迎来良好的对外传播机遇,且获得更大的展示舞台,但由于受多重因素影响,文化折扣现象不减反增,亟需相关传播主体摆脱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困局。

（一）文化传播格局较混乱

媒介技术的升级改变了原有传播格局,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并行发展使得以往点对点的文化输出

变成“点”“线”“面”多维发散、纵横交错的网状传播,由此造成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格局较为混乱、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孕育出文字的殷商文化,从豫剧、汴绣到罗山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再从白马寺、洛邑古城到龙门石窟等传统名胜,河南中原文化丰富多样,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传播策略和规划,致使文化对外传播体系分散。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等国际多元文化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河南中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3]。

（二）文化刻板印象难突破

长久以来,受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因素影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阻滞,加之部分恶意的东方印象误导,致使部分国际民众对中华文化留下非正面的刻板印象。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起步较晚,且处于各国文化碰撞、摩擦、交融的关键时刻,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民众对既往中华文化“定型观念”的影响,而这种文化刻板印象体现出先入为主的偏见性,使得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相对被动。此外,经过上千年的沉淀,河南中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文化内容与形式相对传统、保守,其厚重的历史感与国际民众追求现代奔放观念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使得文化刻板印象难突破。

（三）文化传播渠道不通畅

传播渠道是产生文化折扣的重要因素,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方式有限阻碍着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之路。当前,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渠道仍局限于传统的、官方的、正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国际展览和学术论坛等,如由河南省主导的海外孔子学院,虽然在助力河南中原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具有一定效用,但由于受到传播地的束缚,导致投入的传播成本与取得的传播效果之间并不匹配。与此同时,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渠道仍以传统媒体为主,一方面,传统传播渠道的文化语言体系过于官方,文化相关内容的笔触较为严肃,且缺乏一定亲和力,使得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流于形式,难以融入传播地。另一方面,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所触达的国际受众范围有限,而国际受众能够接触到的河南中原文化同样受限,双重限制反而加剧文化折扣现象。

（四）新媒体技术应用较慢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主体的新媒体发展迅猛,媒体的新形态、新服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生产工具、数据成为新生产

要素的大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更加丰富的形态重塑着中原文化传播的新业态。但河南作为内陆省份,其一,因产业分布原因,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最新技术策源地存在地理距离,且在跟踪新技术发展上明显滞后于沿海省份,中原文化的传播在底层媒体技术工具层面存在天然不足。其二,因对新技术的理解存在滞后性,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更是明显落后半拍,这点从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河南在这些新媒体上的影响力较弱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其三,新媒体传播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热点的快速切换,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河南更多是热点的跟随者,而不是热点的创造者,影响力相对较弱。以上三个方面,加剧了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折扣现象。

(五) 对外传播人才不充足

对外传播人才不充足是掣肘河南中原文化走出去的一大关键,不仅难以及时传递河南中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而且容易导致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产生文化隔阂,引发文化误读,加大文化折扣。其一,河南中原文化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当前对内传承过程中已出现传承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面临失传风险,且深入了解河南中原文化内涵和历史的人才较为匮乏。其二,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需要掌握扎实文学知识、较强传播技能的人才予以支撑,但当前河南省尚未制定完善的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机制,且鲜少将国际传播人才与文化传播人才进行交叉培养。其三,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需要传播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减少文化折扣、降低文化损耗的有效方式,但当前对外传播的实践机会较少。

三、文化折扣视角下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面对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华文化更要加快走出国门的步伐。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可积极带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此,相关传播主体应洞悉文化折扣内涵,走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困局,并立足河南中原文化优势,不断拓展河南中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新空间。

(一) 拓展对外传播平台

传统主流媒体平台在专注中华文化节目创作中

体现出较强专业性和持久性。河南卫视作为河南省最权威的传播平台,从2021年以来凭借中国传统节日系列晚会成功出圈,从《唐宫夜宴》到《端午奇妙游》《元宵奇妙游》,河南中原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文化品牌效应日益突出^[4]。但要想实现河南中原文化破圈再扩圈,需要传播主体积极拓展海外传播平台,借助新媒体向外输出河南中原文化,通过打通传播渠道降低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减少文化折扣。2015年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中显示,“海外受访者中有51%的受众会通过新媒体了解中国”,特别是年轻群体。如今随着国内外媒介平台逐渐增多,依托于互联网、手机的新型社交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为国内外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统筹利用大众媒体和新兴媒介渠道,发挥社交媒体平台在精准推送、同好集聚等方面的传播优势,可以有效提升中原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

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积极利用海外平台,或借助国家使领馆的海外平台,开辟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官方通道,或在各个国家的社交平台注册媒体账号,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向全球用户传播河南中原文化。例如,河南卫视自2022年开始在海外平台同步直播河南卫视传统节日系列晚会,在将河南中原文化传递至全球72个国家的基础上,有效拓宽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国际受众群。河南卫视上传数据显示,“直播观看人次突破410万,且20多个国家使领馆的海外平台参与发布”。对外传播平台的拓展将最大化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减少渠道阻滞引发的文化折扣,使河南中原文化顺利“出海”。

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与国外媒体影业公司合作,推动河南中原文化走出国门,走进国外主流社会。例如把更多的中原文化、中原元素与中原产品投放到中外合作的媒体平台上,呈现到国际受众的视野中,这种“合作传播”形式是进入国际主流传播平台、减少文化折扣阻碍,放大中国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二) 深化文化内容融合

拓展对外传播平台旨在使更多国际受众“看得到”河南中原文化,但减少文化折扣产生的深层原因才是促进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这需要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结合传播地的文化特性和受众习惯,持续深化文化内容融合。河南中原文化起源早、脉络深,其文化内涵中既蕴含中华文明特性,也包含世

界文明个性,而寻找河南中原文化与传播地文化之间的文化关联与文化共性能够促进双方文化融合,提升传播有效性。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林州市调研时反复强调“红旗渠很有教育意义”,红旗渠精神中所包含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文化内核与各国所追求的自信自强、和平互助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可以将红旗渠精神内核与传播地文化相结合,以价值共振推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即受众面对陌生情景与内容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机感,进而本能地排斥,影响文化传播效果。国际受众对于外来文化的疏离和排斥源于对文化内容的认知差异,但文化背后所传递的情感却是全人类所熟悉的也易于接纳的。因此,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当避免“不确定性规避”,降低文化折扣带来的价值损耗,在关注知识性、文化性内容对外传播的基础上,也要通过文化内核触达传受双方的情感深处,注重传受双方情感互通同样能够深化文化融合。河南中原文化脱胎于一个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传播主体可以从这些故事中提炼出与传播地受众共通的情感因子,提升传播地受众对同一故事的情感认同,以情感共振促进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

(三) 丰富文化传播形式

《2022年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数据显示“61%的海外民众乐于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受众基础,对此,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当不断丰富文化传播形式,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彰显河南中原文化魅力,可以通过针对性调研,深入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因地制宜、一国一策地开展工作,以激发国际受众了解河南中原文化的主动性,从而最大限度削弱文化折扣带来的影响。其一,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应不断丰富线下文化传播形式,或定期在海外举办艺术展览、音乐会、戏剧演出等文化交流活动;或通过建设河南中原文化体验中心,展示虢州石砚、秦氏绢艺、黄河石泥砚、柘城李秀山泥塑等河南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带领国际受众亲身体验并参与其中。其二,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可通过创新线上传播形式消弭中外受众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分歧。一方面,通过制作精美的双语图文、双语短视频等,介绍河南中原文化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在科学技

术等方面的成就,包括5G移动传播技术、TikTok等媒介平台,河南中原文化传播主体可以借助科学技术丰富文化线上传播形式,通过科技赋能开发设计充满技术力的文化产品。例如,在河南卫视中国传统节日系列晚会中,创作团队借助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创作出的《龙门金刚》《有凤来仪》等节目,从AR应用到3D环绕皆沉浸式地展现出河南中原文化风采,以视觉震撼吸引更多国际受众关注,有效打破了国际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5]。

然而,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只有外部形式的创新是不够的,更应深入剖析文化折扣的成因,从根本上满足文化内涵、文化深度的需求。尤其是在文旅融合的推动下,需要将中原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沉淀、审美情趣与对外传播的创新意识相结合,在传统与现代、对内与对外间形成有效的联系,注重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减少文化价值的弱化。当国际受众流连于河南博物院叹为观止的历史文物时,也同样会被博物院精美的文创产品吸引,既可以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又体会到当代中国的魅力,收获由内向外的亲身体验。河南中原文化传播形式的创新应建立在立足传统、挖掘内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文化艺术内部与外部社会多元素的合作,与时代和大众的需求接轨,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原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的重要一环。

(四) 跟进文化传播新技术

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主体应当努力跟进文化传播新技术,充分利用5G、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传播工具的应用上,改善文化折扣现象,使文化在传输过程中的损耗最小,最大程度发挥文化传播效果。

其一,关注大数据在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的热点打造功能。一方面,大数据助力传递媒介搜集海量素材,新闻媒体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整理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受众群体的喜好,更加准确地把握文化传播的热点和趋势。以河南文旅为例,其在抖音平台的爆火就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支持,通过对用户在抖音上的行为和兴趣进行深度挖掘,确定了中原文化传播的热点和方向,从历史名城、文化底蕴到雄山秀水、美食特色、旅游攻略等方面持续发力,成功“出圈”。另一方面,大数据助力中原文化传播媒介快速更新迭代。通过对用户反馈的实时分析,了解用户需求和偏好,从而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出传播受众

对董宇辉的关注度较高这一现象级热点,河南文旅快速行动,邀请与辉同行团队开展“河南行”,并通过直播等方式进行宣传,成功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提升了河南文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全面梳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技术可以挖掘出更多具有潜力和价值的宣传素材,并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展示和推广。河南文旅利用大数据技术将河南的精品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展示,打造4个全球著名IP、8个国际知名IP、19个全球一流IP,通过抖音等平台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极大地促进了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

其二,关注人工智能引领文化传播方向的作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主体需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空间,减少因双方的编码和解码方式造成的文化折扣。一方面,在官方,可利用大模型生成的高质量文案、图片、视频等宣传素材,提高中原文化宣传效果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打造专业模型实现自我迭代和反馈,不断优化和完善宣传策略和内容,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在河南景区导览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根据游客的喜好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导览服务;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设计优化和智能推荐等。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在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打造更多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应用场景,强化国际受众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度,从文化风格和思维观念等方面降低文化折扣影响,提高文化传播效果。

(五) 强化传播队伍建设

河南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质上是中外文化的一场博弈,文化折扣程度代表着文化博弈的效果,而文化博弈的背后也是人才的博弈。因此,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发展最终需要回归到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善国际传播格局混乱的现状,弱化文化折扣带来的影响^[6]。河南省作为传播河南中原文化的第一责任人,应以提升河南中原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为宗旨,以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为核心,以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国际化的复合型文化传播队伍。

首先,河南省应不断加大传播人才培养力度。一是与地方高校合力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视野且文化素质过硬的传媒人才,在优化整合汉语言文学专业、新闻与传播专业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构建高校专业

联合培养体系,定点培养输送文化对外传播人才。二是与地方文化企业、涉外企业展开合作,为复合型传播人才提供实践平台,增强复合型人才实践能力。

其次,建立国际传播人才数据库。一是可以吸引国内外国际传播人才参与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项目的建设,为河南中原文化对外传播提供精准的人才储备和调配支持;二是开拓中外文化交流通道,以此为契机组织学术交流、人员互访等活动,从而更好地推动河南中原文化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最后,要强化传播队伍建设,河南省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统筹社会力量,充分发挥民营机构在中原文化对外推广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的市场嗅觉灵敏,品牌意识强,运营机制灵活,传播渗透性强,传播力好,可以帮助培养传播中原传统文化的新生力量。

四、结语

面对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文化自信不应简单沦为一句口号,而是应成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钥匙。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中唯一不间断地将文明延续下来的国家,理应将文明之源延续下去,践行大国使命,尽显大国担当。在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相学习中,展开双向的、互动式的跨文化交流。河南中原文化被视作中华文明的起点,在时代变迁中见证着悠长积淀的历史岁月,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符号历久弥新,河南省作为文化大省应当积极树立文化形象,创新方式、方法,守护好、传播好中原文化,让河南中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为世界贡献精神力量,做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强劲支柱。

参考文献:

- [1] 孙千惠,刘轩宇. 跨文化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探究:以《唐宫夜宴》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23,14(6):21-24.
- [2] 范红,崔贺轩. 从文化认同到跨文化认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交际伦理转变[J]. 对外传播,2023(3):52-55.
- [3] 粟雪晴,汪莉. 文化折扣视角下我国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J]. 传媒论坛,2022,5(3):13-15.
- [4] 吕姣姣. 从河南卫视系列晚会看传统文化的传播策略[J]. 出版广角,2021(19):84-86.
- [5] 张周洲. 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对外文化传播中博弈分析[J]. 新闻知识,2020(12).
- [6] 胡永启. 河南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刍议[J]. 中州大学学报,2019,36(4):51-54.

(责任编辑 林川)

Innovation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Hena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scount

HUA Ya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hinese culture must fa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discount and Hena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Hena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It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expand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deepening cultural content integration, enrich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ms, following up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team construction. These strategies help to weaken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caused by cultural discount, and make it easier for Hena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to go global, integrat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nstantly move towards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 Henan Central Plains cultur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scount; cultural barriers; Chinese civilization

(上接第 66 页)

线的策略思想[J].党的文献,2019(6):67.

[2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3—1944)[M].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31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30]唐正芒,李国亮.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

An Analysis of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Doctors Assisting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Front

YANG Jinjuan, LI Zhihui

(School of Marxism, Linyi University,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ny doctors came to China to help the Chinese people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fascist army together.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doctors and the CPC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the base areas. Together with the medical workers in the base areas, they completed the work of transporting, receiving, rescuing and other work for the wounded, reduced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among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base areas, and consolidate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se doctors have also facilitated and maintained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publicity and the image-building of CPC.

Key words: the united front; multilateral assistance; medical rescue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甘 勇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创造性发展,是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作为在黄河岸边办学的郑州市属高等学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充分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探索具有特色的黄河文化育人之路,引导青年大学生传承弘扬“家国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立德树人中更好地担负起高校应有的文化使命。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使命;黄河文化;高校职能;立德树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92-05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系统、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高校要立足于新时代新阶段的历史方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的文化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为省、市中心工作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一)时代是思想之母

文化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释了文化的主要特征,总结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1]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文化,人民群众是劳动主体;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同时对政治经济又具有反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工作布局等多个领域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源自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源自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史。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的世情、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上,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两个结合”的方法论。“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遵循,增强了文化自信的深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3]

任何一个思想理论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伟大的

收稿日期:2024-06-20

作者简介:甘勇(1965—),男,广西兴安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思政和计算机应用。

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立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迈向新阶段、当今世界经历新变局,立足于宣传文化思想工作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方位,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科学回答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问,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二) 实践是理论之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以推进文化强国、民族复兴为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之路,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丰富发展和重大创新。

科学的思想理论是系统化的认识成果,从来都是实践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重视文化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文化等重大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思想文化工作应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保护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世界各类型文明交流互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强国建设等11个方面提出的重大创新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健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工作体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等16个方面提出的工作布局和要求,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用”。贯穿“体”“用”始终的是“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新时代文化思想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革,人民群众对新时代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的认可和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都从社会实践角度检验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

二、自觉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区别其他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标志。^[4]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这些理论成果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上来。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大趋势,致力于服务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把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大学要把加强价值观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5] 面对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把网上工作作为高校联系师生、服务师生的重要手段,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在网上亮出高校旗帜、发出高校声音,做好正面引导,坚守舆论阵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要加强校园文化阵地建设,强化图书馆、学校广播站、新媒体中心、校史馆、校园红色文化长廊等软硬平台建设,在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着力。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和各门专业课程,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各环节,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进一步合力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不断创新育人手段、丰富育人途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涵养高校大学生爱国之情、报国之志,锻造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 以解码郑州文化基因为抓手,推动文化传承创新

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核心区域和主根主脉所在,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均做出过重要贡献。作为市属高校,要围绕市委文化强市目标,系统梳理郑州文化脉络,全面展示郑州文化的灿烂成就及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

明的贡献,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助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建设和文化强市目标的实现。学校要高度重视郑州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抓好特色项目研究,加强郑州作为华夏文明主根主脉等问题研究,深入开展黄帝、大禹、列子、子产、杜甫、刘禹锡等郑州历史文化名人研究。继续做好郑州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专项课题研究的申报、结项和成果的应用工作,强化优秀文化成果的宣传推介工作,为郑州文化强市战略贡献高校力量,也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四)坚持开放办学,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要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焕发新的蓬勃生命力,就应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深化文化交流互鉴。下一步学校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开展国际教育,增强文化交流和学校的海外美誉度。鼓励教师在国际学术平台开展学术互访和交流,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帮助国外学者和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锚定学校定位,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作为地方性高校,学校要锚定对郑州市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有特色应用型高校定位,立足学校实际,担当作为,主动对接省市中心工作。围绕建设制造业强省、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积极主动对接省委提出的7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28个重点产业链的需求。围绕“新工科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进一步强化学科新工科建设,服务制造业强省战略。持续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布局新兴未来专业、做强现有的优势专业、升级传统专业、撤销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等多种途径,统筹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实现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相互匹配和协调发展,创造性地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围绕郑州市“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总目标和“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与郑州都市圈建设的具体任务,坚定质量立校、特色亮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的发展理念,稳步推动学校学科专业优化

调整,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起高峰,力争在扎根地方中打造特色,在贡献地方中提高能力,为郑州锻造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发挥高校的作用。

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大力阐释宣传黄河文化,进一步提高学校立德树人实效性

(一)黄河文化的科学内涵

所谓黄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的人民群众在长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品格和科学智慧,在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孕育了家国天下、自强不息、包容和谐等独特的民族精神。

家国天下的情怀。黄河流域以其丰富的水源、富饶的土地,为早期人类生存提供了便利。中华儿女在这里安居乐业,创制文字,建立城市和国家,在与黄河的相生相伴中,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胸怀天下”的文化基因。孟子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国相依”让每一位中华儿女都饱含“天下为公”“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家国天下的情怀激励中华儿女、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兴旺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自强不息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九曲,中下游曾经频繁决口、洪水泛滥,在与无数次水患灾害抗争中,中华儿女形成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三皇五帝时期,大禹改堵为疏、因势利导完成治水大业。西汉时期,汉武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指挥10多万将士以竹为桩,充填草、石和土,层层夯筑,最终取得黄河瓠子决口治水的胜利。明朝中期,官员潘季驯发明“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淮河)刷浑(黄河)”的束水冲沙法,创新治河工程思想,建立完备的堤防和修护制度,为中国古代治河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一曲《黄河大合唱》延续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基因。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走到一座高高的山顶,看着脚下黄河奔流,和大家一起唱起了《黄河颂》。毛泽东回忆当年

转战陕北的情形深情满怀地说：“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华儿女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最终夺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包容和谐的精神。黄河文化的兴盛发达得益于同邻近地区或国家的游牧文化、草原文化等其他异域文明的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早在商周时期，黄河文化即已同北方草原文化进行交流融合。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与中亚及欧洲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及至唐、宋、元三朝，对外交流频繁，四邻地区和外国文化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为黄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中国古代历史上，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元末出现了两次民族大融合，使黄河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得到空前的扩展。及至清朝，黄河文化与周边的诸种文化水乳交融，逐渐成长为兼容并包的中华民族文化。

（二）黄河文化的育人价值

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确立的前提是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文化自觉。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蕴含众多的历史记忆与价值理念，伴随历史演进融合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中。从考古学视角，中国古史记载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经历了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以居等发展阶段；在新石器时代，经历过农耕社会出现和国家萌芽等发展阶段；龙山文化晚期，铜器的使用、城镇的出现、祭坛和宗庙遗址的发掘，标志着黄河地区逐渐步入文明社会；殷商时期，安阳小屯的甲骨文是证实中国起源于黄河文化的古文字；及至西周，形成了基本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意识，政体则由先前的诸侯共尊天子，演变为由天子分封诸侯，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自周、秦、汉、唐以来，黄河文化的基本传统体制不断向前发展，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众多民族或王朝，都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在中国古代历史演进过程中，四大发明是沿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最为辉煌的科技进步，是黄河文明对世界文明宝库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原儿女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凝聚奋斗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黄河文化鲜明地展现着“大一统”的政治凝聚力和内向力，是中华民族和国家融合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从历史来看，黄河文化以儒学为重要基础，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道德，“大一统”观念渗透到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黄河流域各民族相互交

流、碰撞和融合。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发扬黄河文化中的“大一统”特质，对于唤起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新征程奋进力量具有重要作用。

践行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在青年大学生中间弘扬黄河文化，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三）郑州地方高校具有黄河文化的先天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和魂。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6]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坐落在美丽的黄河之滨，英才校区、金河校区所在的惠济区位于郑州市北部、黄河南岸、黄土高原余脉、邙山脚下，在阐释宣传黄河文化方面得天独厚，具有先天禀赋。作为市属高校，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深入挖掘郑州地区黄河文化内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构建黄河文化育人体系，更好地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四）全力打造全方位黄河文化育人矩阵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利用郑州丰富的黄河文化资源，深挖其时代价值，把黄河文化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资源，融入思政教育、课程思政、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打造立体化、全覆盖的黄河文化育人矩阵，引导学生传承弘扬“家国天下”“自强不息”精神，自觉成长为担当中原崛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搭建黄河文化的育人机制。深入推进黄河文化教育，必须善于运用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在校党委领导下，宣传部、团委、学生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多元主体参与黄河文化育人工作机制，形成强大育人合力。从领导体制机制看，学校党委班子高度重视黄河文化育人的体制机制建设，做好顶层设计；从“三全育人”视角看，校内所有育人主体都要高度重

视黄河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认清责任分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调合作,形成黄河文化育人通力合作的新局面。

创新黄河文化的育人形式。一是用好传统渠道。把黄河文化融入思政教材,丰富教学内容。重点做好“传承黄河精神,汇聚复兴能量”“弘扬黄河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牢记总书记嘱托,建功河南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等方面内容,找好契合点,注重方式方法,避免“硬融入”。二是善用“大思政课”资源,让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活”起来。充分利用学校周边黄河博物馆、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大河村遗址等黄河文化资源,引导青年大学生走出校园,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积极探索“馆校合作”新模式,开展主题党团日专题活动,开发现场思政教学专题,打造具备大师资、大平台、大课堂等特征鲜明的馆校联合大思政课堂,增强传承黄河文化的针对性、吸引力和实效性。三是用好新兴媒体技术。数字化赋能是提高高校思政课改革的重要举措。学校立足郑州沿黄区域的节点城市和中华文明诞生及发展核心区域的文

化资源禀赋,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促进数字技术和黄河文化深度融合,探索利用 AI 虚拟仿真技术模拟黄河场景,打造数字化黄河文化资源,拓宽思政课教育的手段和平台,使广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参考文献:

- [1] 韩振峰.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境界[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3(6): 4-12.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39.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12-314.
- [4] 邱勇.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夯实民族复兴基石[N]. 人民日报, 2022-12-09(10).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3: 198.

(责任编辑 许峻)

Thoroughly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Firmly Grasping the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GAN Yo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a complete, systematic, and open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 It is a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views and an action guide for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work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s a university located on the banks of the Yellow River in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mplement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fully taps into the historical value contained in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explores the distinctive path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guides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o inherit and promote the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issues” and “unyielding national spirit”, to better shoulder the cultural mission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have in cultivat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ultural mission; Yellow River culture;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和路径探赜

刘建东¹, 杨卫军²

(1.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 焦作 454950, 2. 河南工业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渊源、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实践基础。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意义,而且对于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全面提高学生素养,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实践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从内容、形式、手段、主体和评价等角度和途径融入。内容上,主要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思政课内在的契合点上融入;形式上,主要从拓展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方法和实践形式上融入;手段上,主要是从利用数字化技术制作数字化教学内容融入;主体上,主要是从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融入;评价上,主要侧重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学评价机制等方面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机融入进来。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097-06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鲜明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理论组成的,其中包括坚定文化自信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强调“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这一思想强调了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重要

性,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从而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向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同时,也使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践更加

收稿日期:2024-06-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2023-JCZD-0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基于教育赋权理论提高思政课针对性和吸引力研究”(2023BKS028);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政类)“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研究”(2024SJGLX0985);黄河交通学院2024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思政课’数字化路径研究”(HHJTXY-2024jgyb-05)

作者简介:刘建东(1974—),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黄河交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贴近学生学习实际和生活实际。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和传承的重要性。大学生通过学习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基本精神和时代价值,可以增强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更加坚定地拥护和支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倡导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鼓励大学生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推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大学生在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可以深刻认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深入了解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方向,大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发展。随着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大学生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机会也日益增多。通过学习和了解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大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产业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从而更好地把握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和创业机遇。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厚植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厚植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思想强调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与发展,以及对革命文化的铭记与发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增强文化自信。高校思政课通过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和基本走向,进而产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自信不仅是对文化本身的认同,也是对国家、民族和历史的一种认同和热爱。其次,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高校思政课在日常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剖

析,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和伟大精神,从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国家的忠诚上,更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的行动上。最后,高校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对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相结合,可以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综上所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是厚植大学生文化自信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的有效途径,不仅有助于学生提升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而且能为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高校思政课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渠道和重要阵地。通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可以丰富学生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通过深入学习和领悟这一思想,大学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不仅有助于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也有助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实践。大学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以大学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课程思政建设以及其他党团实践活动,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未来的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注重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根本保证。只有

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高校的文化建设不偏离正确方向,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需要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引入更多新的教学内容和手段,推动思政课的改革创新,不仅可以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创造性。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高校思政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这一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正是高校思政课需要关注和传递的重要内容。通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管理权。这要求高校在思政课教学中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宣传教育,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学生思想的引导和管理,确保学生在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成长成才。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思政课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校应该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思想,不断创新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高校思政课育人效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1]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时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最新、最全面、最系统的指导纲领。这为高校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方向。其次,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主阵地、人才培育高地和多样文化的重要聚集地,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沿阵地。结合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职能,深刻理解蕴含在习近平文化

思想中的重大创新观点、科学方法论和重要战略部署,准确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生动实践中走在前、立新功,这有利于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创新。最后,高校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具有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鲜明意识形态属性。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就能守好高校思政课的意识形态阵地,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而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与创新。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

(一)内容上融入: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将其融入高校思政课,需要深刻把握和理解其核心要义,力争做到二者“水乳交融”。为此,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三是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四是坚持文化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核心要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也是其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所在。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可以为高校思政课提供生动形象的拓展案例和教学素材。因此,深入梳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程的契合点,就是从内容上将习近平文化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主要载体和途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两者都强调文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则进一步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作用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文化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要求,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相符合的,即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化也不例外。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特色,主张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

的新文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和特色。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掌握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同时也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这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与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文化理念高度一致。三者都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倡导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强调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体现。这些理论都坚信文化的力量,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习近平文化思想还强调了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与毛泽东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文化建设的要求是一致的。三者都认为,文化不仅关乎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理念。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化多元化和文化创新的思想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尊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同时也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的重要性,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讲述的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变革和创新的历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两者都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强调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理念相契合。两者都注重思想观念的转变和价值观的构建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所讲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两者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

展,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这与思想道德和法治建设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高度一致。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可以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为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同样适用于思想道德和法治领域。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才能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最后,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和弘扬红色法治文化,这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及大力弘扬红色法治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法律自信,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风尚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

(二)形式上融入: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丰富拓展高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形式

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还需要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方式和方法往往比较单一、枯燥无味,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因此,需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方法来开展教学。具体而言,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同时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等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体验感。通过这些创新和尝试可以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中,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所学知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社会实践形式可以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学科背景和学生的学习需求。文化遗产和红色教育基地考察: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文化遗产和红色教育基地,如博物馆、古迹、红色革命圣地等,让学生亲身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刻领会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文化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或优秀青年代表来校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分享各自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艺术表演与欣赏:组织各类艺术表演活动,如戏曲、舞蹈、音乐等,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培养审美情趣。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艺术家进行表演和指导。传统工艺体验:引导学生参与传统工艺制

作,如书法、绘画、陶瓷等,让他们亲手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传承工匠精神。社会实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将所学的文化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增强社会责任感,如组织学生在社区开展文化活动或者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等。课程思政融合: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课程思政中,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课堂上可以引入相关案例和素材,结合教师的讲解和引导进行讨论和交流。在实践教学中则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这些社会实践形式旨在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创造力,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高校思政课中的有效传播和践行。

(三)手段上融入: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制作成数字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和高校“数字思政”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大工具,使解决“教育差距”、教育资源“不平衡”等问题成为可能。“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数字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导课堂教学深化应用,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将平台资源和服务嵌入到教育教学之中,用数字教育资源丰富拓展学生的第二课堂。”^[3]高校思政课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借助数字化路径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日常教学实践中。

制作数字化教学内容。高校思政课应该充分利用数字化资源和数字化技术,打造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例如,可以利用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观点、理论精髓、实践要求等,使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和接受。这些资源也可以嵌入到思政课的教学平台中,供学生随时学习。同时,高校思政课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进行跨学科融合,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

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高校思政课应注重创新教学方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式、探究式、体验式、互动式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智慧课堂”,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提高教学效

果。此外,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亲身感受和体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 and 实践意义。此外,还可利用互联网、手机 APP 等进行数字化创新教学,可以制作线上课程、互动平台等,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中华文化知识。

(四)主体上融入:加强高校思政课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师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思政课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主体力量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and 挑战。首先,高校应该注重选拔和培养一批政治素质高、理论功底深厚、实践能力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这些教师应该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练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and 实践要求。同时,要注重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指导教学和学生工作。其次,高校应该定期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培训和学习,帮助他们深入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 and 要义。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学术交流、教学研讨等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高校思政课中的广泛应用 and 深入发展。最后,高校思政课不仅要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因此,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上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社会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 and 认识。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到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践中去。

(五)评价上融入:科学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从教师、学生两个方面综合评价

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只有通过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够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质量,从而推动思政课教学的不断改进 and 提高。

确立考核指标。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 and 实践要求作为思政课考核的重要内容。通过设定合理的考核指标 and 权重,确保学生在学习和

实践中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

创新考核方式。除了传统的闭卷考试、开卷考试等考核方式外,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如开卷与闭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这样可以更好地检验学生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

强化实践环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并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考核,将考核成绩作为学生思政课学习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增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健全思政课教师考核机制。建立完善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的量化考核机制主要包括: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方法,确保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开展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的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加强督导听课,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融

入思政课的规范开展。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科研考核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才能推动二者有效融合,推动高校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 共产党员网[2022-05-28]. <https://www.12371.cn/2022/05/28/ARTI1653714273719158.shtml>.
- [3] 怀进鹏. 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在2024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2024-02-01].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2402/t20240201_1113761.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ing of the 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LIU Jiandong¹, YANG Weijun²

(1. Yellow River Traff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950, China;

2.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ontains rich theoretical origin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a profound practical foundati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not only carrie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politics, ideology, and guidance, but also holds practical value in fostering students' cultural confidence, comprehensively enhancing their overall quality, and promot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various angles and paths, including content, form, means, subject and evalu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integr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inherent convergences betwee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in terms of form, it should involve expanding the teaching methodologies and practical 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erms of means, it necessitates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create digital teaching content;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it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and in terms of evaluation, it emphasizes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从“第二个结合”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

刘江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文化是联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向,也是人类文明转型的必定结果。从“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向度来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则体现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理念以及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能力”共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包容性、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与“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进路。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意涵;文化支撑;文化进路;“第二个结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7

中图分类号:D820;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103-07

当下的全球化是一种总体性全球化,各种族共同体的文化交流也随之深化,但囿于各国的主权观念强化、意识形态泛化、价值面向分化等现状,这又加剧着世界文化交往的对立冲突。怎样在文化多元的全球化时代让中华文明得以历久弥新?怎样在人类命运与共的境况中形成世界性的价值认同?这既是我国发展所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也是人类进步所需解答的“世界之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地球这一个家园,要在和平的环境中让文明的光辉光彩夺目,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 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光辉,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向度,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深刻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文化渊薮以及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能力,进而以“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包容性、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以及“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性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构。这有利于廓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与文化进路,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一、“第二个结合”语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内核:价值根基与文明样态

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已然来到了价值研判与文明选择的路口,是坚守旧有的“普世价值”,还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选择“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传扬“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秉持合作共赢,还是固守零和博弈,从经验逻辑与理性判断来看,人类只有提倡“类”的共同体才能形塑出“超”民族的共同利益,进而才能解决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休谟问题”,走向真正的“类世界”才有未来可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双重文明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合理性期许与图景式展望。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

收稿日期:2024-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法治中国进程中学术诚信法律保障体系建构研究”(18BFX04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视界下制度治党理论研究”(16YJA810005)

作者简介:刘江(1998—),男,四川达州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尔后，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讲话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中华“和合”文化的角度，再次重申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其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方面，人类利益共同体（或共同价值）与命运共同体既休戚相关又相互融通，如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环境变化的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等；另一方面，人类只有在“共同体”的真理尺度与“共同价值”的价值尺度中才能更好推动实践进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可知，人的实践活动应立足于人类“种的尺度”、人性的“内在尺度”来擢升人的“类本质”，即唤醒人的“真正共同体”，以此来协调个体差异，这既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诉求，也充分彰显共同体所内蕴的文明样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样态。从近到远、由小及大的双线“同心圆”模式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样态：第一条线路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条线路为“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4]。从第一条线路看，中国以“亲诚惠容”外交理念来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这充分展现着亲缘纽带、真诚有信、互惠互利、宽广包容的文明样态，摒弃了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的旧有思维，因而“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实践参照，也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内蕴的新型文明意涵。从第二条线路看，不论是中国与外国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还是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所建构的区域命运共同体，这些都遵循着平等协商、互利共赢、责任共担的文明逻辑。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国家崇尚的经济霸道性、政治霸权性以及文化霸凌性的发展模式，并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中心—外围”的人类发展样态，进而以“同心圆”式的命运共同体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第二个结合”内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目

的性追求，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意涵。要阐明其文明意涵，就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第二个结合”作为理解文明意涵的必由之路，廓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应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即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人类共同利益”“普遍利益”为基础，并超越资本主义的“特殊利益”“个人利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有着深刻的中华文明意蕴。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文明虽然把人类社会带入世界历史时代，但是该时代却没有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张力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深刻表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同利益之所以被认为是虚幻的、抽象的，离不开私有制下“原子式”个人的因果宿命，因而资本家无法超出私人利益的视界来理解共同利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共同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可知，共同利益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真实社会中。随着生产社会化与社会交往普遍化的程度跃迁，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将进一步凸显。共同利益以共同价值为基础，最后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世界。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中华文明蕴藏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与天和性、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邦和谐、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与人和睦、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与人和解、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以及“生生之谓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并行而不相悖”等，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提倡的“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太平”的治理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观以及“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仁义观等，都与“公平与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高度契合之处。就“民主与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而言，来源于中华文明的重民思想，如“天惟时求民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价值取向。由上可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共同利益”，还是中华文明表达的“和理念”“义利观”“重民本”等都内蕴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而也都丰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

(三)“第二个结合”蕴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样态

“文明”是作为“类”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人类文明”的“类”规定性则蕴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住了“共同体”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因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具象化表达与“类文明”的现实化。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则必须阐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逻辑。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来探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逻辑是必由之路。

第一,以中华文明为“根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渊薮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做了时代性的转化与发展、解构与重铸,故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则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时代表达。譬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物质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化用,“人民至上”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以民为用”的扬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思想“天人合一”的转化,“和谐社会”的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的重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是对传统文化“贵和尚中”的承继。简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智识资源,如以“贵和尚中”来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以“天下大同”来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以“天人合一”来构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以“海纳百川”来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可知,内蕴中华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涵,进而以命运共同体促进着世界文明共存。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意蕴。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性”。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的生产力总和,这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所蕴藏的自反性。首先,从人与物的关系看,资本主义社会是物欲文明的社会,是物统治着人的“颠倒的世界”。其次,在人与人关系方面,由于“逐利文化”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使“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6],最后,从国家与国家之间来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引领下,西方国家用殖民掠夺的发

展方式引发了文明冲突,也使许多文明走向了毁灭。质言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文明应立足于唯物史观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并非人类文明的唯一选择,必定被人类新的文明所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以“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建构“普遍繁荣的世界”超越“贫富两极分化的世界”以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超越了“对立冲突的世界”,从而开辟了人类现代化发展新道路,擘画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思想的新篇章,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推动着人类文明共生共存。

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

(一)文化基础:“第二个结合”场域中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绝非凭空生发,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挖掘这些文化基础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规引之路。“第二个结合”场域中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广阔的文化地基,由此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长。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既烙印着本民族的基因特质,又构成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因而文化内生着民族特性;同时,世界文化又由各民族文化构成,所以文化也具有世界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转化为世界文化”有详尽表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扩张使各民族国家的地域史走向了世界史,地球空间也首次实现了以资本逻辑为联结的人类共同体。以资本为纽带的世界普遍交往,既暗含着各民族文化流动的普遍规律,也内蕴着世界文化交流的加深,即“随着生产交往的世界化必然带来文化的世界化”“世界文化的到来……使得各民族的文化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7]这种精神财富在各民族交互进程中,凝结着他族文化的智识资源,从而实现着不同文明的优势互补,也创造着人类文明新样态。故此,通过凝结“域外”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而创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彰显了马克思“世界文化”的思想。进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我国国情实际,又站在世界视野之上,体现了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的时代表达,由此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着“守正与创新”的理论特质。

西式“文明”以“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其文化根基,最终建构着“抽象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等虚幻意识,并在世界场域的时空下,推行着“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

等价值理念。不可否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基础始终以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为立足点,并提倡“促进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创造马克思“世界文化”之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世界文化”思想的承继与开新。这种“开新”离不开“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规引。

(二)文化渊藪:“第二个结合”语境中中华文化“大同”理念

从中华文化来讲,虽“共同体”是一个域外范畴,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存在类似表达,如兼具天下情怀的“大同”思想,则是“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在场。故此,从“第二个结合”的语境中来考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藪,一方面要透视“大同”思想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则要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大同思想的契合之处。

《礼记·礼运》擘画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儒家圣贤所构建的“太平世”,大抵可分为三重视域来解构。第一,从价值秩序看,孔子把“大道”中的“德化”作为实现大同社会之根本,认为推行“德化”才能有公心,有公心方有公道,有公道才会公制。为此,圣王明君才能做到“天下为公”,黎民百姓才会怀有“讲信修睦”之公德。第二,从价值理念看,大同社会彰显为“亲亲”之爱、推己及人之理、“能近取譬”之道的“和合”理念,如“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表达着要立仁爱之心,由此整个社会才能实现人心和解的美好图景。第三,从价值导向看,在大同社会中,由于个人修身修性以及精神品格极大提高,因而各种犯上作乱、抢劫偷盗之事将走向终结,真正实现“外户而不闭”的大同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价值秩序、价值导向上都与“大同”思想有高度契合性,这为人类走向真正的“大同世界”擘画了新蓝图,也指明了新方向。首先,在价值理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了大同思想的“和合”理念。2021年10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的致辞》中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9]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与“大同”思想“和”理念有着相似相通性。其次,在价值秩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达着“德化”“共治”的定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中指出:

“和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为人类价值秩序建构提供了基本价值共识,再者以“共商共建共享”所搭建的全球合作平台,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办、“丝路基金”的设立等都表达着“共治”“德化”的价值秩序规约。最后,在价值导向上,二者都蕴含着个人“修身修心”到“观照天下”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政治建构,还是“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伦理道德意义,都表达着个人“修身修性”的品格与“观照天下”的价值情愫。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主张以“个人”观“天下”的远大格局,为此提出了“一个地球”“一个世界”的总体性表述,并以“个体”通过“国家”来链接“世界”,这就形成了“家国天下”的命运共同体。

(三)文化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解决时代问题的“文化能力”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文化方向。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来看,西方强权把“普世”文明观视为国际秩序合理运行的“灵丹妙药”,试图推行“文明一元论”“文明优越论”的政治论调,以使西方“文明”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演“文明”的独角戏。与西方全球治理体系不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觉,通过把握人类文化差异性与人类利益整体性,以此来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的文化认知图式,以弥合各民族国家文化交流分裂状态,进而建构符合各国家文明共存的全球治理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建构全球治理新平台,以适应全球文化交融新局面,以瓦解观念主义的别有用心,这既平衡了各国话语表达的利益诉求,又揭露了西方异质性价值观的虚伪面纱,最终以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着人类文明共存的良性发展。这也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自信。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原则。生态文化提倡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应树立“合理变换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的意识,并以自然界平衡性发展为价值理念。若违反这一理念,把没有交换价值的自然生态强制纳入市场体系的运作之中,这只会造成“物质变换断裂”,进而给整个人类带来生存环境的灾难。然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把“环境资源商品化”当作一种“简化主义”的手段,把“生态资源资本化”视为一种“线性主义”的思维^[10]。这既违背了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

也损害了人类生存空间的合法性权益。与西方国家殊异,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也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场域。进言之,我国坚持在生态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进行“人——社会——自然”统一序列的理性思辨,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以及“两山论”等生态发展理念,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造成自然异化的超越,也实现了人与自然达成和谐、和睦共处的生态平衡。要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生态文化为出发点,提出了走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这一理念彰显着对生态治理实践的文化自觉,也昭示着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文化自信。

三、“第二个结合”语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进路

(一)“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表达:以“万有相通”的中华文化包容性促进文明交流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是让……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1]通往这条美好之路的基本前提则离不开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秉持“万有相通、开放姿态”“接纳多元、平等相待”的包容性理念,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弘扬中华文化包容性来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交融。

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万有相通的开放姿态促进文明交融。事事无碍,即为万有相通,万事万物都是互融互通的。《易经》讲“天下同归而殊途”,南宋陆九渊讲“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12],这种殊途同归与同心同理就内蕴着开放包容的心态,也折射出事物具有相似性、相同性与相通性的哲学之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应站在“万有相通”的哲学高度,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进而让各文明走出故步自封的“孤岛”状态,瓦解孤芳自赏的“洞穴”偏见,以激活世界文明的“一池春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不同文化在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历史进步,则必定要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包容状态下让不同文明得以“照面”,并以“万有相通”的哲学定律来打开各民族国家的开放之门,以包容之态摒弃相对孤立、狭隘的价值判断体系,从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交融,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接纳多元、平等相待”来促进文明交流。世界是多元的、文明是

多样的、民族是多彩的。在中华文明的世界观中,从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文明,而是坚持求同存异、接纳多元、尊重差异、平等相待,例如古代的“佛教东传”“东渡扶桑”“伊儒会通”,近代的“西学东渐”“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解’”“新文化运动”,这些无不体现着以平等对待的姿态来接纳多元文化、尊重多样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各民族友好交流,各国也应以平等对话的态度来尊重差异与接纳多元文明。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不同文化类型应当……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14]只有基于“平等”的状态下,各种族的文化交流才能有效开展。究其实,这种“平等对话”的文化交流也消解着“强文化”与“弱文化”的狭隘文化划分语境,并克服着“文化自大”或“文化自卑”的畸形文化心理状态。诚然,文化唯有特质特色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并在百年变局的境况下,以共商共建、平等对话的原则来使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以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二)“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指向:以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促进文明互鉴

在既往国际交流中,文化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霸逻辑”为代表的文化进化主义;二是以“守逻辑”为象征的文化相对主义。“霸逻辑”与“守逻辑”的冲突碰撞,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对立互斥,使世界文化版图一直被分离割裂,而难以融合。那么,如何弥合两种文化的对立,以解开人类文化发展的“戈尔迪之结”,成为推进全球化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难题。离不开以“第二个结合”为文化指向的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的“和逻辑”,以“和逻辑”来破解“霸逻辑”与“守逻辑”的文化冲突,从而推进世界文明交往互鉴。

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涵纳了四重维度。第一,具有道德判断与人道主义原则。第二,倡导文化的开放性、可分析性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互鉴的融合性。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指出,印度人已然收获了“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7],可知,马克思批判“殖民征服”,但是对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开放互动”、交流互鉴(不论以何种形式)是持肯定态度的。第三,主张文化的“涵括性”反对“同一性”,并坚持以“共识”为核心来链接全人类共同价值。第四,追求文化多元共存的“超文化”——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附带结果则是世界文化的普遍交往。由上可知,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张文化进步主义,

其实质体现为文化间的“和逻辑”。这种“和逻辑”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奠定了理论条件,也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路径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提倡“合作共赢的新利益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逻辑是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和逻辑”,而非“霸逻辑”或“守逻辑”。这种“和逻辑”是各民族共同体之间去冲突化的主体通性原则,也是化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文化间性话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表明国际场域是每个主权国家的“辩论场”,也是每个国家都可表达自我诉求的“公领域”,大家都有相互倾听和尊重彼此的义务,而妄自尊大、弱肉强食的传统霸权交往模式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带一路”的践行已彰显着互利互惠、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和逻辑”,这也必将引起对国际旧秩序的反思与破拆,在平等协商、对话互鉴的道路上,摒弃“丛林法则”的旧理念,推动建构国际关系新秩序,并以马克思文化进步主义“和逻辑”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三)“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旨归:以“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性促进文明共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应坚持从“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性来促进文明共存。“类文明”即人类价值的共识性文明,是在总体全球化视域下所展现出的一种人类新型文明形态,其本质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而非单一性、交互性而非同一性、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包容性而非排他性、互惠性而非自利性,其价值精髓展现为中华文明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性”与“兼相爱,交相利”的“同利性”,其理论渊藪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天下”理念以及马克思“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可知,“类文明”彰显了“第二个结合”的文明旨归。从“类文明”的视角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则必须把类的命运、类的境遇与类的现状关联起来,即坚持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价值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相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相统一。

首先,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来看,人的基本规定性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即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生存的需要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

在,这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在这基础上利用劳动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即为发展的需要。发展是人类问题的“总钥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离不开发展的理念。不仅如此,人除了自然属性的需要,还有社会属性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应找到符合人的社会性的共处之道。诚如习近平所讲,“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6],要通过人与人的相互交流、相互砥砺、相互合作,来发现人类生存与共处的新范式。

其次,从价值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相统一的视角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逻辑,只有在价值上形成价值共同体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式才能顺利开展。诚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呈现的是价值共同体而非实体共同体,但并不否认需要人类共同之践行,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7]

第三,从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将人的“两种属性”结合起来考察,这就避免了唯心主义对人的物质需求的忽略,也突破了形而上学“不变”的缺陷。可知,马克思主义站在人的双重属性基础上,揭示了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规律。将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比较来看,二者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譬如二者都表达着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照与终极关怀,二者都站在“共享”的理念,来推进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等。一言以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拥有共同的文明旨归,都是站在人的类本质的角度,将人的“双重属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8]。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日内瓦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2017-01-20.
- [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 [4] 李丽丽,余祥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J]. 云南社会科学,2023(1):27-34.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8.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277.
- [8] 习近平. 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2016-9-4.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475.
- [10] 刘江,赵海月. 人·社会·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系统超越的三重向度[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2(2):15-23.
- [11] 习近平.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25.
- [12]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73.
- [13] 习近平.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N]. 人民日报,2017-05-15.
- [14] [德]哈贝马斯. 从感性印象到象征表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7.
- [15] 张雷声.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12).
- [1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 [17]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EB/OL]. (2017-12-01).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1/c_1122045658.htm.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0.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Light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LIU Jiang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history, but also a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link that binds human beings to a common destiny. If we look at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union”, it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ighlight the civilizational meaning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idea of Marx’s “world culture”,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 Marx’s idea of “world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concept of “commonwealth” and “cultural capaci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times joint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ulture, “logic of harmony” of Marx’s cultural progressivism and the value consensus of “civilization – like” provide a cultural way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ivilizational implications; cultural underpinnings; cultural pathways; “second integration”

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三重逻辑

王浩东,张正光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1)

摘要:从理论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精髓上的相侔,在价值观念上的相通,精神特质上的相融;从历史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奠定“文化救国”的根脉基础,筑牢“文化兴国”的道路根柢,推动“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促进“文化强国”的理论升华;从现实逻辑而言,“第二个结合”巩固好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所展现的定力,赓续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的动力,激发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代性所彰显的活力。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8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110-06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得以明确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实高度,中国共产党深刻论述了“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意蕴,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深刻体会“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把握其理论基础,回溯其历史脉络,思考其现实路径,既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旺盛活力的内在要求,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需要。

一、理论逻辑:从“思想精髓”“价值观念”到“精神特质”上的契合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精髓上具有相侔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同中国传统天下观相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民族国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2]168}这一论述超越了国家概念,彰显出世界尺度的思维,同中国传统天下观思想在深层逻辑上有所共通。传统天下历史观曾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

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也是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战略资源。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历史之外走进世界发展之中,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之“中”,需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现实化的可行性方案,也是中国传统天下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体现了传统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贯通。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相侔。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坚持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而非外在的精神,神灵所创造的,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无神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天下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说始终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利益之上,追求全人类共同解放,强调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天下为公精神;在社会观方面,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坚持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宗旨,最终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道之行,天下

收稿日期:2024-06-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基本经验研究”(22BDJ016)

作者简介:王浩东(1999—),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在道德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以建立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具有崇高的道义情怀，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认为剥削与压迫是最不道德的行为，这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二者之间的“高度契合性”^[15]，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中欧之间的“共同点”。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心理上的内生动力。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上具有相通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同中国传统修养观念相通。在马克思论著中已经出现了“党性”这一概念，并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于改造主观世界方面也提出一些与党性修养相关的宝贵思想，如党员的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3]高度重视党性修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的独特创造。在马克思主义党性思想的基础上，刘少奇于1939年所撰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修养”观念相结合，批判吸收“性善论”的人性预设，汲取“正心诚意”的修身策略，借鉴“内圣外王”的修养境地，进而得出“党性修养”这一概念，形成“共产党人的心学”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学说。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政治观念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通。马克思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2]人民至上的实践品格和价值品质是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一条主线。针对私有制狭隘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及劳动自身的异化关系，马克思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的一切关系。”^{[2]10}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政治观念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4]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契合性，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观念上也必然坚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5]，“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6]。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把“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一。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特质上具有相融性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相融。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

的、为人类解放的学说，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过去那种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日益成为不可能”^{[2]419}。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以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和发现世界，而且能够抛弃一切私利和偏见，吸收一切有利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中华文化孕育着既重开放又重包容的文化基因，这是能够实现精神特质上贯通的重要文化根源。正如季羨林所指：“海纳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立起源、融合而成，因为重开放，故可流其远，因为能包容，故可成其大。因此，重开放与能包容的精神特质要求不断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既在外来文化交往中，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把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里，又能够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真正落实“不忘本来，吸收未来，面向未来”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中国传统知行观相融。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35}人类具体的生活实践场景都是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是“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153}。基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指出实践的学说不仅是“实证的科学”，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这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主张的知行合一，行重于言的精神特质具有相通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二者相结合的过程中紧随时代步伐，追求与时俱进。毛泽东《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传统和现实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8]，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显著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9]二者在精神特质上的进一步确证、延续与强化，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得以创新发展。

二、历史逻辑：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的转变

(一)雏形出现：奠定了“文化救国”的根脉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文化形态发展的重大课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便逐渐开始意识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本质是中华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总爆发。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时，已经意识到必须检验马克思主义

是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性的问题。此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对比,避免“文化排异反应”,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精神特质的会通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本质的利器,真正在理论与实践上开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19世纪3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强调要充分认识到挖掘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指出不仅要“开来”,而且还要“继往”。通过“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10]的任务引申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1]命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追求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2]。1939年5月,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了“通古今”的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通现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通过去,高度评价了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的伟大成就。从1942年开始,针对党内教条主义对待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得党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因此,党内思想上的解放与进步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结合”的紧密探索。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将实事求是的意蕴进行了创新诠释,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要义,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价值。因此,毛泽东思想是成功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典范,奠定了“文化救国”的根脉基础。

(二)曲折探索:筑牢了“文化兴国”的道路根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待传统文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在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还存在一个“第二次结合”^[13]的问题。一是就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时,毛泽东指出,“需充分且批判地利用中国的文化遗产”^[14]。二是就如何看待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15]。三是如何满足当时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阐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发展理念。1957年,周恩来也

强调,“现在对孔子就应该全面评价”^[16],对自五四运动时期盛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认知进行及时纠偏。中国共产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大力推进“现代科学文化”建设,极大地凝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伟力,筑牢了“文化兴国”的道路根柢。

(三)理性探索:推动了“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国内出现“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更为深入、系统地分析把握传统文化的性质、作用,强调加强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7]³⁵⁷的思想路线。尽管这一时期“第二个结合”仍寓于“第一个结合”之中,但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组成部分进行挖掘与运用,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来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18]该句所提及的“闯”与“冒”的精神与开拓创新与自我革命精神相契合,而“气”和“劲”的特质与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相贯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意蕴。江泽民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够割裂历史。”^[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随后,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得以融合,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创造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成果。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的时代属性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胡锦涛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中华文化丰沃土壤……努力为中华文化书写新篇章。”^[20]以中国古代的“和合”理念为载体,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在形式与内容层面的深层次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改革开放和“走自己道路”的辩证统一,推动了“文化富国”的制度创新。

(四)成熟定型:促进了“文化强国”的理论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由意识形态所引燃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斗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注重挖掘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和时代意蕴,将其视作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民族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1]9},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哪里来的中国特色”“‘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等重要论断,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如何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问题的论述。一是需正确把握好“古”与“今”的关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为今用”。善于古为今用,实现文化传承发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厚古非今、以古代今。二是需正确处理好“中”与“外”的关系,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既要充分认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相异之处,又要善于发现二者之间的契合性,以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推动中西之争的中国式破解,正确把握好中西方文明之别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三是需正确实现好“破”与“立”的关系,彰显出破立并举、革故鼎新的智慧之道。实现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坚持先立后破,使“第二个结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既要坚决防止“未立先破”,也要坚决防止“只立不破”,以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指引,激发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新的结合点,促进了“文化强国”理论的升华。

三、现实逻辑:从“巩固定力”“赓续动力”到“激发活力”上的回应

(一)巩固好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所展现的定力

一方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坚定历史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4]533}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来奋斗史,就是一部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指导,深刻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历史。坚定历史自信的定力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实践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

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建立等,进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国际上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历史自信的底气将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在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先验逻辑中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自信。“没有文化,也就没有理论。”^{[2]1}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与理论支撑。但近代以来,由于受封建制度等落后文化的影响,中国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后面。于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洋务运动探索的器物现代化,到辛亥革命尝试的制度现代化,再到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不断探索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固守原来的传统文化,或者“全盘西化”都不能解决道路的前进方向问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民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寻找新路,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着力筑牢“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在精神上实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最终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需坚持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文化为载体接续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文化自信自强”这一重要命题,并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进一步突出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以强大的理论勇气和文化自信不断开辟新的发展道路。

(二)赓续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呈现的动力

一方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178}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坚持文化领导权,这必然要求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要防止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消极影响。需要指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主义的消极影响是指由于没有区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并在

糟粕的消极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误解”，但在实质上并不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也有效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同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既“中国化”又“不失真”，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指明正确的方向、确立根本的路径，否则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具有唯一性、根本性、制度性的地位，无论何时都不能动摇、不能模糊、不能混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化，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根本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建设的首要内容。

另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批判性继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将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充分挖掘和发展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推动其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一是坚持以大历史观为基础，从整体维度来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既需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察，又需从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将其置于世界文明发展范围中考量。二是坚持以历史辩证法为指导，从历史继承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既需坚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的相统一，实现二者的融通互进，又需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实现二者的转化和发展。正如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相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相互渗透、互相推进，其最终目的都是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通，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双创”方针延续了改革开放后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加深的趋势，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三）激发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代性所彰显的活力

一方面，在对西方文化祛魅的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⁸从“契合”到“结合”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文化主体的自觉和主动努力。近年来，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尺度视之为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体系极大冲击了东西方文明的原初结构，使中国遭受文明的危机与文化主体性的危机，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遮蔽、

扭曲与诋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辩证看待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既不以“普遍”之名来否定各国的特殊国情与民族特色，又以“特殊”逻辑来把握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从而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形成正确认识。新时代，既须自觉反省当下文化实践中“有理讲不出”“讲出没人听”等文化叙事能力严重滞后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问题，又须努力克服二元对立思维，真正地“平视”世界各国发展，在一超多强的世界发展大局中提升话语权，增强对现代性文明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持续巩固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

另一方面，在紧随时代发展潮流过程中坚守中华文化时代性。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关键所在。立足于新时代的“第二个结合”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才能产生现实的物质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既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新典范。此外，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排他性。成功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需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一过程要求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不能对外来文化“全盘接受”，务必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真正践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理念。

伴随着救国、兴国、富国和强国的时代主题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中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集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第二个结合”是一项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事业，这需坚定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接榫创新的特性，巩固好中华文化主体性，使其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赋能，为人类文明走向共同繁荣提供指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列宁.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73.
- [4]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57.
- [5]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66.
- [6] 胡刚.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意涵与历史思考[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0.
- [7] 季羨林. 东学西渐与“东化”[N]. 光明日报,2004-12-23(03).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
- [9] 习近平.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 人民日报,2015-01-25(0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中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61.
- [12]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2.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95.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6.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4.
- [16] 周恩来. 周恩来教育文选[M]. 北京:教育出版社,1984:146.
- [17] 邓小平.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57.
- [1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 [19]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9.
- [20] 胡锦涛. 在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 [21] 张远新. 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有关论述[J]. 兰州学刊,2016(10):27-36.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Triple Logic of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s Another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WANG Haodong, ZHANG Zhenggua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1,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second integration” realizes the similarity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essence, values and spiritual qualitie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second integrat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ultural liberation” of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historical logic,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ot of “cultural salvation”, built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ad of “cultural prosperity”,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ultural enrichment”, and promoted the theory of “cultural strength”. In terms of practical logic, the “second integration” needs to consolidate the strengt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ontinue the momentum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epochal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econd integration; emancipation;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工艺研究及品质分析

李玉玲, 聂卉, 姚虹, 杨昕

(郑州工程学院 食品与化工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牡丹籽油、葛根粉和全麦粉为原料制作的饼干,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同时对人体健康具有保健作用。以感官评价、质构分析和色差分析作为评价方法,利用单因素试验,确定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和白砂糖的最佳添加量,再通过正交试验,得到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佳配方:牡丹籽油 10%、葛根粉 5%、全麦粉 10%、低筋面粉 85%、白砂糖 25%、全脂奶粉 2.5%、黄油 30%、水 10%、小苏打 0.5%、鸡蛋液 25%、食盐 0.5% (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 + 全麦粉 + 低筋面粉 = 100%)。烘焙过程的上下火温度为 170℃,烘烤时间 13min,在此条件下制作的饼干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口感好,符合人类健康饮食需求。

关键词: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正交试验;质构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19

中图分类号:TS21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4)04-0116-07

牡丹籽油不仅包含软脂酸和硬脂酸等饱和脂肪酸,还有亚麻酸、亚油酸、油酸和花生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组成结构合理,营养价值高,食用安全性也比较高^[1-2]。 α -亚麻酸可在体内被多个酶催化生成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3],对人体生长发育和代谢有很大影响。此外, α -亚麻酸还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减肥、降血脂、抑制脂肪形成与累积、抗炎、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有预防作用等功能^[4-5]。

葛根,也叫粉葛、甘葛,是国家认可的药食两用植物,随着人们对其所含物质的深入研究,葛根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面点制品中^[6]。它含有丰富的淀粉、纤维素、蛋白质和异黄酮等成分,其中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可以帮助改善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预防动脉硬化和抗衰老;葛根素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血脂,起到预防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的作用^[7]。实验研究表明,葛根总黄酮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值,还能让人

体的糖耐量得到增强,从而延缓糖尿病的发展^[8]。

全麦是由完整的小麦,通过研磨、筛选(粒度分级),保持与完整的小麦相同的成分,如谷壳、谷壳、谷壳、谷壳等。全麦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如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抗氧化剂等,可以满足人体每日所需的营养,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当人们做糕点、面包时,用全麦粉来部分地取代低筋面粉,可以增加人们对全麦粉的摄入量,同时也可以确保食品的品质。另外,全麦粉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肠道 pH 值,刺激肠黏膜,有利于粪便的排出^[9]。

功能性食品是指具有一定营养保健作用,可以调节人的身体机能,但不能起到治疗作用的食物。由于功能性饼干降低了饼干的糖分、脂肪和热量,同时还增加了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提高了饼干的功能性,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食物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

收稿日期:2024-05-20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2B150021);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就业创业教育指导类)(2021SJGLX1035);2022年度郑州工程学院技术研发推广与转化基金项目(郑工科技[2022]1号)

作者简介:李玉玲(1979—),女,河南信阳人,博士,郑州工程学院食品与化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 MOFs 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及功能食品的研究与开发。

大的改变。国外的食品研究者们把一些尚未被利用的非传统型的、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物质相结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功能食品。Meena Goswami 等^[9]用50%的牛肉粉、10%的橘子浆液和1.5%的瓜尔豆胶分别作为蛋白质、天然纤维素和植物油脂,制成一种可供多种人群食用的饼干。Muhammad Qasim Raza 等^[11]研究表明,Ajwa 籽油可取代传统的植物油,成为一种新的功能性饼干原料,由于部分氢化植物油(HVF)是一种极具致癌性的反式脂肪,对人体有害。赵贵红等人^[12],采用冷粉面团制作工艺,研究出了牡丹籽油海藻全麦饼干;赖华清等人^[13]采用单因素实验与正交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制出了香榧葛根饼干;Comfort Funmilayo Ajibola^[14]按不同比例的全麦面粉、辣木叶和可可粉来研制具有抗氧化性的饼干。

目前我国对牡丹籽油和全麦食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营养价值认识不够深入,导致我们对其副产品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阶段。将牡丹籽油、葛根粉和全麦粉相结合制作饼干,不仅能为牡丹籽油产品、全麦食品提供更多的品种,而且也是对牡丹籽油产品、全麦食品发展方向的一次新探索。此外,这种探索还能为我国的粮食加工业开辟新的道路。

1 材料与方 法

1.1 材料与设备

1.1.1 试验材料

牡丹籽油,菏泽华瑞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葛根粉,安徽燕之坊食品有限公司;全麦粉,新乡良润全谷物食品有限公司;低筋面粉,邹有才食品有限公司;黄油,恒天然集团;白砂糖,上海怡神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奶粉,杜尔伯特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精纯盐,河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小苏打,沧州市华海顺达粮油有限公司;鸡蛋,市售。

1.1.2 主要设备

电子计数秤 ACS-JS-6,五鑫衡器有限公司;SM-603F 型电烤箱,新麦机械(无锡)有限公司产品;KS-938AN 型打蛋器,广州市祈和电器有限公司产品;CT3 质构仪,美国 Brookfield;分光色差仪 CS-412,杭州彩谱科技有限公司;擀面杖,2 mm 模具,烤盘。

1.2 试验方 法

1.2.1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步骤及操作要点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制作主要包括原料选择、调制面团、冷藏、成型、烘焙、冷却包装 6 个步骤。

(1)原料选择:选择品质好的低筋面粉、全麦

粉、葛根粉,以及牡丹籽油、白砂糖。

(2)称量:称取低筋面粉、牡丹籽油、黄油、小苏打、鸡蛋液、食盐、全脂奶粉和纯净水,将牡丹籽油、鸡蛋液、白砂糖混合打发,继续加入小苏打、盐、全脂奶粉及水混匀乳化,低筋面粉、全麦粉和葛根粉过筛加入辅料液,充分揉捏。

(3)冷藏:用保鲜膜包好面团,放入冰箱冷藏 30 min。

(4)成型:将冷藏好的面团擀成厚度为 2 mm 左右的面皮,用模具(30 mm × 15 mm)压印成型。

(5)烘烤:将饼胚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设置好烘焙时间和烘焙温度,开始烘烤。

(6)冷却包装。将烘焙好的饼干自然冷却至室温,为了长期保存和便于携带,采用真空方式进行独立包装。

1.2.2 单因素试验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基本配方为牡丹籽油 10%、葛根粉 5%、全麦粉 10%、低筋面粉 85%、白砂糖 25%、全脂奶粉 2.5%、黄油 30%、水 10%、小苏打 0.5%、鸡蛋液 25%、食盐 0.5% (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 + 全麦粉 + 低筋面粉 = 100%)。预试验研究表明,牡丹籽油添加量、葛根粉添加量、全麦粉添加量和白砂糖添加量是影响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感官评价、质构特性和色泽的主要因素。研究以感官评价、质构特性和色度值为评价标准,采用单因素试验确定上述 4 种原材料的最佳添加量。各原材料的试验添加量如下:牡丹籽油添加量(6%、8%、10%、12%、14%),葛根粉添加量(4%、5%、6%、7%、8%),全麦粉添加量(7%、8%、9%、10%、11%),白砂糖添加量(10%、15%、20%、25%、30%)。

1.2.3 正交试验

在单因素试验基础上,选取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和白砂糖添加量的适宜水平进行四因素三水平的 L₉(3⁴)正交试验,以感官评价、质构特性和色度值为评价标准,并进行数据处理和结果分析,确定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佳工艺配方。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见表 1。

表 1 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设计

水平	牡丹籽油添加量	葛根粉添加量	全麦粉添加量	白砂糖添加量
1	8	5	8	15
2	10	6	9	20
3	12	7	10	25

1.2.4 感官评价方法

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制作完成并冷却后,由

10人(5男5女)组成的感官评价小组进行感官评价,参照《GB 710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饼干》感官要求,根据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特点,制作了一份感官评分表,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进行感官评价,并取平均值,具体的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表2 感官评分标准

项目	评分标准	评分/分
形态 (满分20分)	外形完整,大小厚薄均匀,没有变形,表面光滑	15—20
	外形完整,大小厚薄较均匀,少许变形,表面光滑	10—14
	外形不完整,大小厚薄不均匀,变形,表面粗糙	0—9
色泽 (满分20分)	表面棕黄色,色泽均匀,无焦边	15—20
	色泽基本均匀,有少许焦边	10—14
	色泽不均匀,过白过焦	0—9
质地 (满分20分)	内部组织细腻,断面细致均匀,多孔状	15—20
	内部组织较为粗糙,断面无层次,孔隙大	10—14
	内部组织粗糙,质地松垮	0—9
口感 (满分20分)	酥脆细腻,不粘牙,甜度适宜	15—20
	略酥脆,稍有粘牙,甜度较适宜	10—14
	较硬,不酥不脆,粘牙,过甜或甜味不足	0—9
气味 (满分20分)	饼干香味纯正,有牡丹籽油的香气	15—20
	饼干香味一般,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气	10—14
	饼干香味淡,没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气,有焦苦味	0—9

1.2.5 质构特性

用质构仪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胶着性和咀嚼性进行测定。测定条件:TPA (texture profile analysis)模式,选用TA43探头,预测试速度为2.00 mm/s,测试速度为0.50 mm/s,压缩量为30%,触发力1 g。每个样品重复3次,取平均值。

1.2.6 色度值检测

用色差仪测定饼干的色泽,色差仪开机后先进行黑白校正,校正结束后测量样品的L*、a*、b*值。L*值表示明亮度(0 = 黑色,100 = 白色),a*值表示红绿色度(-a*为绿色,+a*为红色),b*值表示黄蓝色度(-b*为蓝色,+b*为黄色),每个样品重复测3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试验

2.1.1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1—3所示。

由图1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脆度随着牡丹籽油添加量的增加变大后变小。当牡丹籽油加入面粉中后,油脂会把蛋白质和淀粉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层油膜。油脂含有疏水基,它能阻止水分子的渗入,阻止面筋蛋白的形成^[15]。如图2所示,随着牡丹籽油添加量的增加,饼干L*值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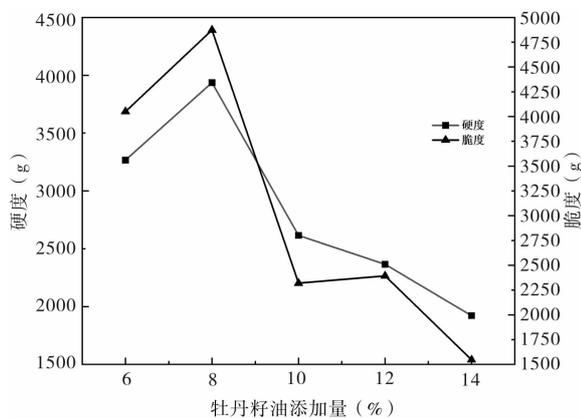


图1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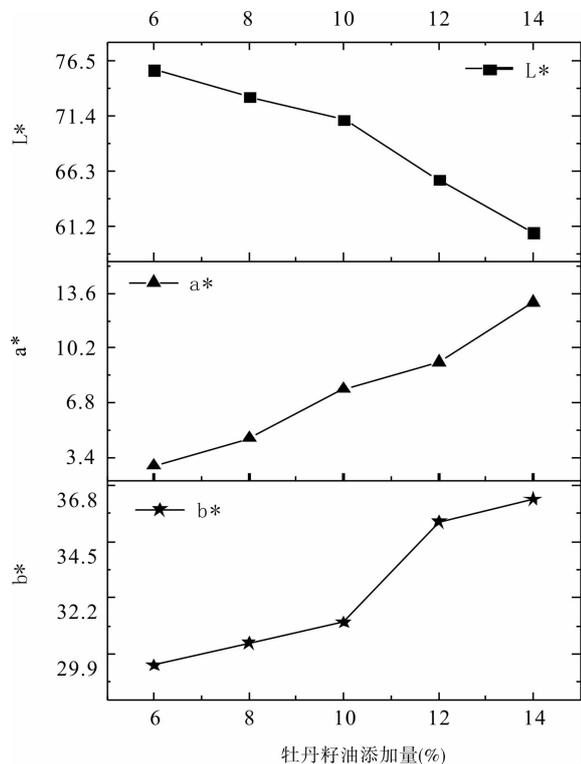


图2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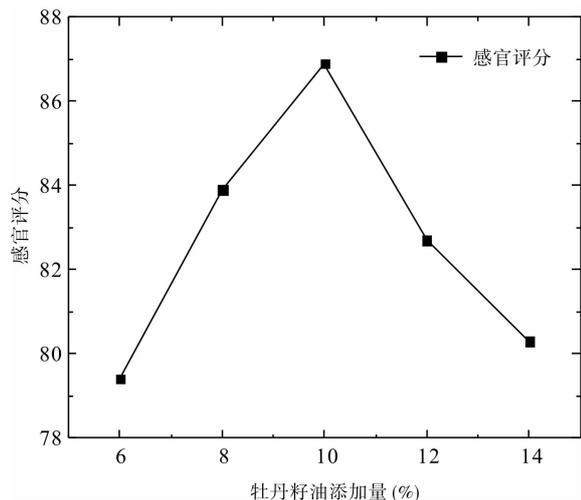


图3 牡丹籽油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饼干 a^* 值和 b^* 值都逐渐增加,且都为正值。由图 3 可知,感官评分随牡丹籽油添加量先增大后减小,当牡丹籽油添加量较小时,饼干表面逐渐变得光滑且口感大大提升;当牡丹籽油添加量较大时,面团变得柔软,十分松弛,很难成型,且牡丹籽油的油脂味过重。综上,当添加量为 10% 时,饼干的感官评分最高。

2.1.2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葛根粉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 4—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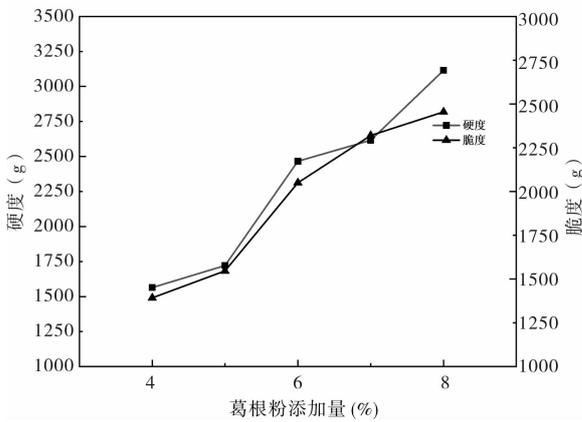


图 4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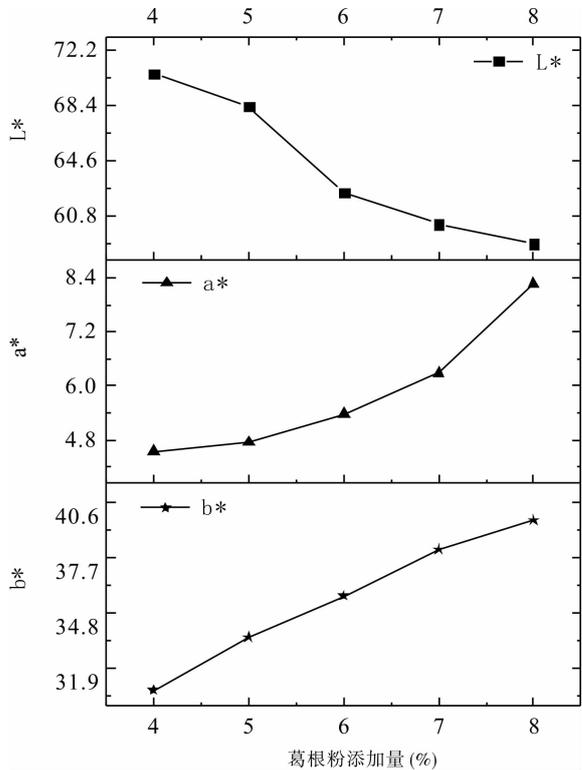


图 5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脆度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可能是因为葛根粉在饼干原料中起淀粉的作用,能降低面粉

的筋力,增加面团可塑性,降低其弹性,硬度增大;如图 5 所示,饼干 L^* 值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小,饼干的 a^* 值和 b^* 值随着葛根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由图 6 可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若葛根粉添加量低于 6% 时,口感偏软,风味较差;若葛根粉添加量高于 6% 时,由于葛根粉添加量增多,面团黏度变大,韧性变差,会造成面团断裂,不易成型,产品容易破碎,影响饼干口感。因此,葛根粉添加量在 6% 时最为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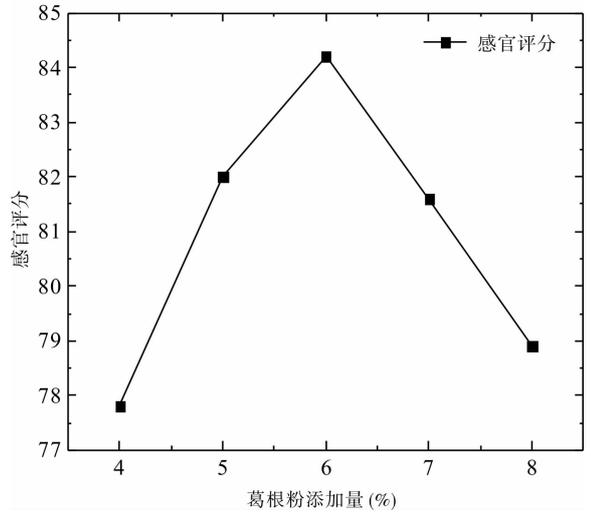


图 6 葛根粉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2.1.3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全麦粉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 7—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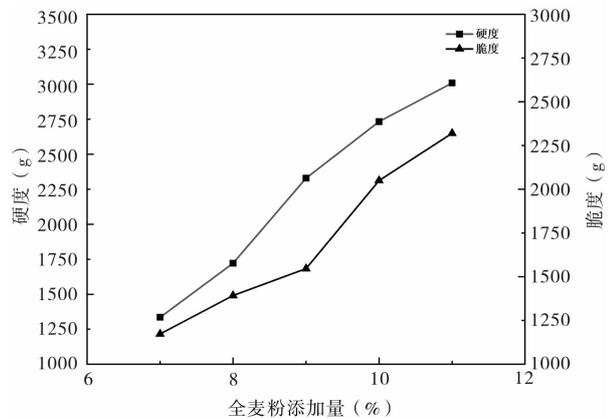


图 7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由图 7 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脆度随着全麦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是因为全麦粉中含有吸水性和持水性较好的膳食纤维,从而影响了面筋蛋白的形成,使饼干硬度和脆度变大;如图 8 所示,饼干 L^* 值随着全麦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小, a^* 值和 b^* 值逐渐增大,且都均为正值;由图 9 可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饼干表面逐渐变得粗

糙。当全麦粉添加量为7%和8%时,饼干的粗糙感不明显;当添加量为9%时,饼干有淡淡粗糙感,质地硬脆,当添加量为10%和11%时,饼干表面过于粗糙。因此,全麦粉的最佳添加量为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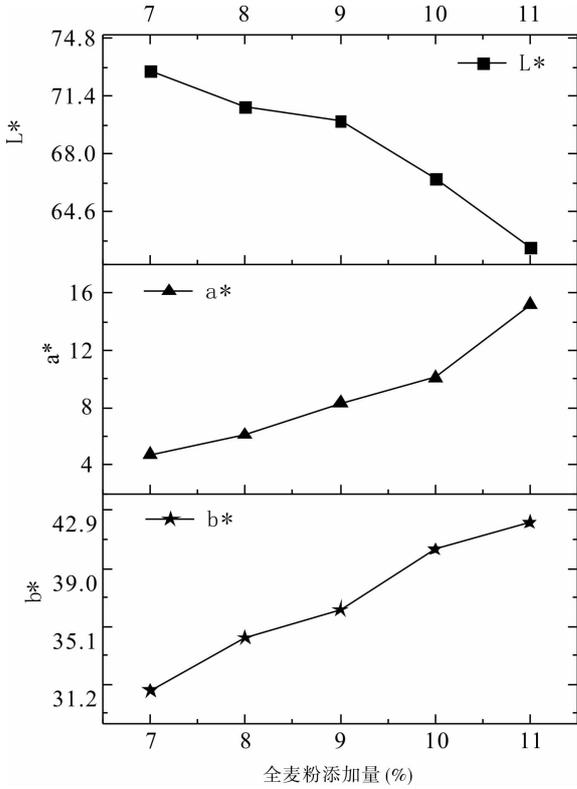


图8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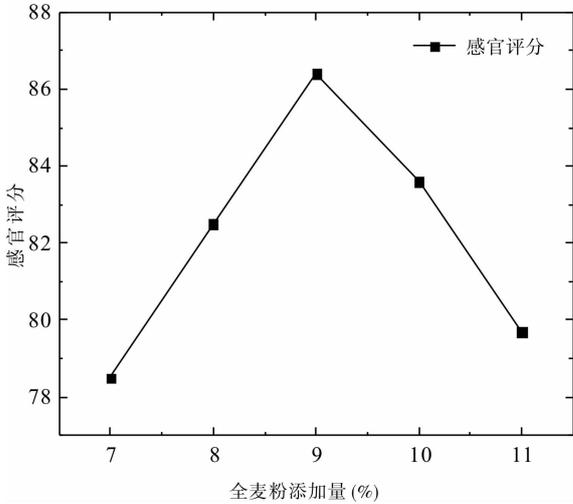


图9 全麦粉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2.1.4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烘焙品质的影响

白砂糖添加量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硬度、脆度、色泽和感官品质的影响如图10—12所示。

由图10可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硬度和脆度随着把白砂糖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变大,这是因为白砂糖的反水化作用,它会影响蛋白质的水化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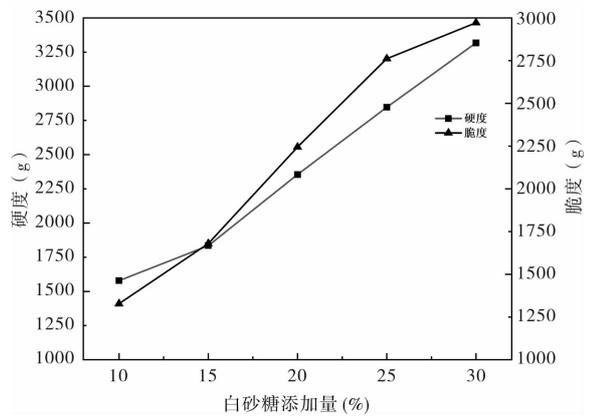


图10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质构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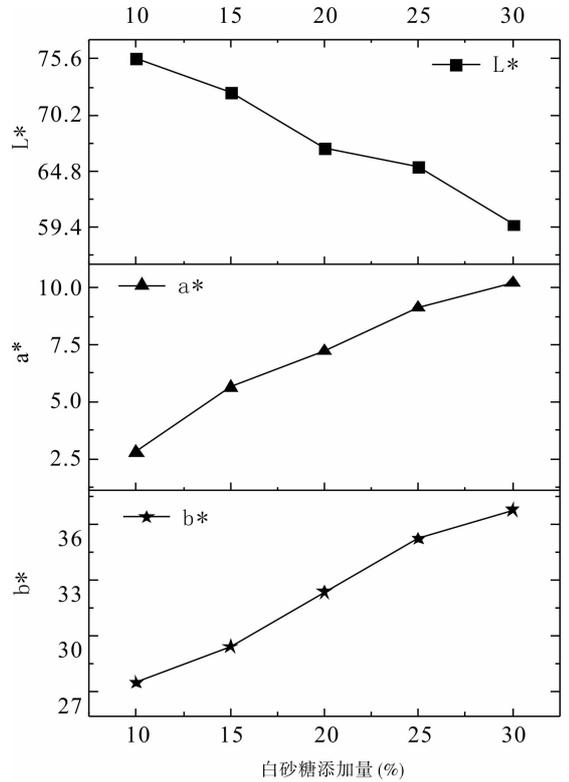


图11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色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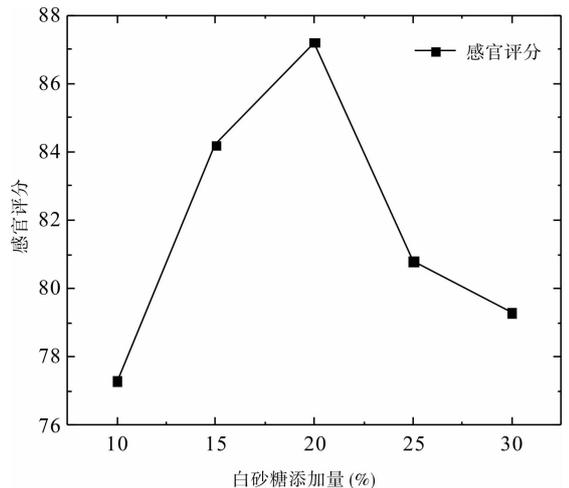


图12 白砂糖添加量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

程,降低调粉过程中面筋的生成率,导致面团弹性减弱,硬度增大^[16];如图 11 所示,饼干的 L* 值随着白砂糖添加量的增加而减小,饼干的 a* 值和 b* 值随白砂糖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且二者都是正值;由图 12 可知,感官评分先增加后减小。在增加糖添加量的时候,可以阻止蛋白质的过度膨胀,从而降低饼干表面起泡、凹低或凸面、收缩变形等现象。但是,当糖加入量过高的时候,焦糖化反应会造成饼干失水过多,从而提高饼干的硬度,使其表面变得干燥、孔隙变少。当白砂糖添加量为 20% 时,饼干感官评价总得分最高,食用品质较佳。

2.2 正交试验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A	B	C	D	评分
1	1	1	1	1	84.50
2	1	2	2	2	83.67
3	1	3	3	3	89.00
4	2	1	2	3	88.40
5	2	2	3	1	83.43
6	2	3	1	2	79.50
7	3	1	3	2	80.46
8	3	2	1	3	82.80
9	3	3	2	1	77.41
K1	257.17	253.36	246.80	245.34	
K2	251.33	249.90	249.48	240.58	
K3	240.67	245.91	252.89	260.20	
k1	85.72	84.45	82.27	81.78	
k2	83.78	83.30	83.16	80.19	
k3	80.22	81.97	84.30	86.73	
R	5.50	2.48	2.03	6.54	

由表 3 可知,采用极差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各试验因素对饼干感官品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白砂糖、牡丹籽油、全麦粉和葛根粉。以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感官评价为评判标准,最佳配方为 A₁B₁C₃D₃。即牡丹籽油 10%、葛根粉 5%、全麦粉 10%、低筋面粉 85%、白砂糖 25%、全脂奶粉 2.5%、黄油 30%、水 10%、小苏打 0.5%、鸡蛋液 25%、食盐 0.5% (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 + 全麦粉 + 低筋面粉 = 100%)。按该配方制作的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表面平整,颜色金黄,色泽均匀,风味独特,消化性好,具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味。

3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牡丹籽油、葛根粉、全麦粉和白砂糖对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品质的影响,

确定了上述原材料的最佳添加量。然后采用正交试验确定了牡丹籽油葛根全麦饼干的最佳配方为牡丹籽油 10%、葛根粉 5%、全麦粉 10%、低筋面粉 85%、白砂糖 25%、全脂奶粉 2.5%、黄油 30%、水 10%、小苏打 0.5%、鸡蛋液 25%、食盐 0.5% (所有添加量均以葛根粉、全麦粉和低筋面粉总量为基准,即葛根粉 + 全麦粉 + 低筋面粉 = 100%)。配方优化后的饼干,具有金黄平整的外观,口感酥松,有牡丹籽油淡淡的香味,营养丰富,具有一定的饱腹能力,适合减肥和寻求健康饮食人群食用。

参考文献:

- [1] 乃妮,王天瑞,刘榜迪,等. 牡丹籽油的提取及应用研究进展[J]. 粮油食品科技, 2019, 27(3): 20-23.
- [2] 侯天兰,王顺利,米生权,等. 牡丹籽油营养成分和功能作用研究进展[J]. 中国油脂, 2021, 46(8): 51-55 + 71.
- [3] KIM K B, NAM Y A, KIM H S, et al. α -Linolenic acid: nutraceutical, pharmacological and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J]. Food Chem Toxicol, 2014(70): 163-78.
- [4] 郭婷. 牡丹籽油抗炎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D].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 11-24.
- [5] ZHANG W, LI R, LI J, et al. Alpha-linolenic acid exerts an endothelial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high glucose injury via PI3K/ Akt pathway[J]. Plos One, 2013, 8(7): 1-7.
- [6] 王娜,武桢峰,王晶晶,等. 葛根粉在面点制品中的应用[J]. 农产品加工, 2022(6): 77-79.
- [7] 谭家林,文颖娟,樊一波. 葛根及其复方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研究进展[J]. 亚太传统医药, 2018, 14(1): 76-78.
- [8] 王兰,蓝璟,龚频,等. 葛根异黄酮降血糖活性及作用机制的研究[J]. 食品科技, 2017, 42(3): 223-226.
- [9] 张瀚文,余秋文,张一凡,等. 膳食纤维的生理功能及改性方法研究进展[J]. 农业科技与装备, 2021(1): 64-65, 68.
- [10] MEENA G, DEV S B, KUMAR M S, et al. Quality improvement of refined wheat flour cookies with incorporation of functional ingredients[J]. Journal of Food Processing and Preservation, 2021, 45(4): 10-15.
- [11] QASIM R M, UMAIR A M, SAJID A M, et al. Consequences of hydrogenated vegetable fat substitution with Ajwa seed oil on physicochemical and nutritional aspects of functional cookies[J].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2020, 8(3): 1365-1374.
- [12] 赵贵红,王波,郭海英,等. 牡丹籽油海藻全麦饼干的研制与开发[J]. 菏泽学院学报, 2021, 43(2): 107-111.
- [13] 赖华清,段灿灿,王启益,等. 香榧葛根饼干的研制[J]. 湖北农业科学, 2022, 61(20): 122-126.
- [14] AJIBOLA C F, OYERINDE V O, ADENIYAN O S. Phys-

icochemical and antioxidant properties of whole - wheat biscuits incorporated with moringa oleifera leaves and cocoa powder[J].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Reports, 2015,7(3): 12 - 15.

cookie dough rheology and baking attributes[J]. Food science, 2011, 32(5): 157 - 166.

[16] 刘宗浩,张嫣妮,于重伟,等. 挤压薏米粉饼干研制及品质分析[J]. 食品工业, 2021, 42(1): 32 - 36.

[15] HUANG W N, LI Z N, OKKYUANG K C. Effects of acrylamide inhibition by asparaginase and sugar substitution on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Analysis of Peony Seed Oil Pueraria Graham Cracker

LI Yuling, NIE Hui, YAO Hong, YANG Xin

(School of Chemical and Food,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Peony seed oil, kudzu powder, and whole wheat flour are all rich in nutrients. Taking sensory evaluation, texture analysis and chromatic aberration analysis as the evaluation method, firstly, the single factor tes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amount of peony seed oil, kudzu powder, whole wheat flour and white sugar, and then through the orthogonal test, the best formula of peony seed oil Kudzu whole wheat biscuits was peony seed oil 10%, kudzu powder 5%, whole wheat flour 10%, gluten flour 85%, white sugar 25%, whole milk powder 2.5%, butter 30%, water 10%, baking soda 0.5%, egg liquid 25%, salt 0.5% (all added amounts were based on the total amount of kudzu powder, whole wheat flour and low - gluten flour, that was, kudzu powder + whole wheat flour + Gluten flour = 100%), the upper and lower heat temperature was 170 °C, and the baking time was 13 min. Biscuits made under these conditions were highly nutritious, unique in flavor, digestible and have a faint aroma of peony seed oil.

Key words: peony seed oil; pueraria mirifica powder; whole wheat flour; orthogonal test; texture analysis

本刊声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篇幅不少于8000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CRTS III型轨道板 C60 混凝土工艺研究

刘秀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2600)

摘要: CRTS III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是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技术,也是目前最先进的高速铁路无砟轨道。轨道板采用 C60 高性能混凝土浇筑,提高轨道板使用的强度和耐久性,轨道板要求工厂化生产。为了提高轨道板生产质量和工厂化生产的要求,结合轨道板生产过程经验,研究了轨道板 C60 混凝土制备和浇筑工艺。主要包括,混凝土原材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计算、混凝土配比确定、混凝土拌和、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

关键词: 先张 CRTS III轨道板; C60 混凝土; 配合比; 掺和料; 浇筑; 拉毛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4.04.020

中图分类号: TU528.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4)04-0123-06

1 高速铁路先张 CRTS III轨道板

高速铁路先张 CRTS III轨道板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结构,是在总结了日本 I 型板、德国 II 型板、国产道岔板以及后张法 III 型板的优点上,开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无砟轨道结构。主要创新点包括:扩展了板下填充层材料、改变了板式轨道限位方式、优化了轨道结构、改善了轨道弹性、实现了轨道板双层双向先张法预应力方式及完善了设计理论体系;预应力钢筋端部设置锚固板,提高轨道板耐久性;改原 I 型无挡肩板为有挡肩板,配套弹性不分开式扣件(WJ-8 型),有利于降低轨道刚度,提高轨道弹性;实现了板下两排门形筋和内设钢筋网片的自密实混凝土填充层之间的一体化连接。

高速铁路先张 CRTS III 标准轨道板为 P5600 型,长 5600 mm,宽 2500 mm,厚 200 mm。先张法 CRTS III 型轨道板为有挡肩设计、板底带门形钢筋、纵向双层横向单层双向预应力先张拉,采用 C60 混凝土浇筑^[1],按 60 年不大修设计。有挡肩设计,承轨面设置 1:40 轨底坡,配套国产 WJ-8 型弹条扣件,可实现钢轨扣件低刚度化。为适应高速铁路在城市地区小半径曲线地段铺设的需要,采用二维可调模板

方法制造 CRTS III 型轨道板,承轨台上下和沿线路方向左右可调节。板底面设置门形钢筋,铺设后与底座板浇筑一体,再与带钢筋的底座限位凹槽一起形成整体复合板结构,防止轨道板与填充自密实混凝土离缝,以及限制轨道板的纵横竖向移动,同时增加轨道质量,有利于减轻轨道冲击振动作用。轨道板顶面中线两端和中间设有观察孔和灌注孔,用于铺设轨道板时,灌注自流平混凝土。轨道板两侧面端部对称设有两对起吊定位螺栓孔。轨道板规格尺寸见下图 1 高速铁路先张 CRTS III 标准轨道板图(P5600)。

2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 C60 混凝土原材料要求及选择

2.1 水泥

轨道板预制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 42.5 级,不能使用早强型。碱含量不得超过 0.60%, SO_3 含量不应超过 3.0%, CL^- 含量不应超过 0.06%,熟料中的铝酸 3 钙含量不得超过 8.0%。

2.2 砂子、碎石

砂子:选用坚硬、干净、级配合合理的天然中粗河砂,II 区中砂(细度模数 2.3~3.0)。细度模数为 2.3~2.8,含泥量小于 1.5%、氯化物含量小于 0.02%。

收稿日期: 2024-04-18

基金项目: 中国铁路总公司重大课题“高速铁路无砟轨道关键技术深化研究”(2014G001-B)

作者简介: 刘秀元(1978—),男,山西繁峙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高速铁路和地铁工程的施工、设计和科研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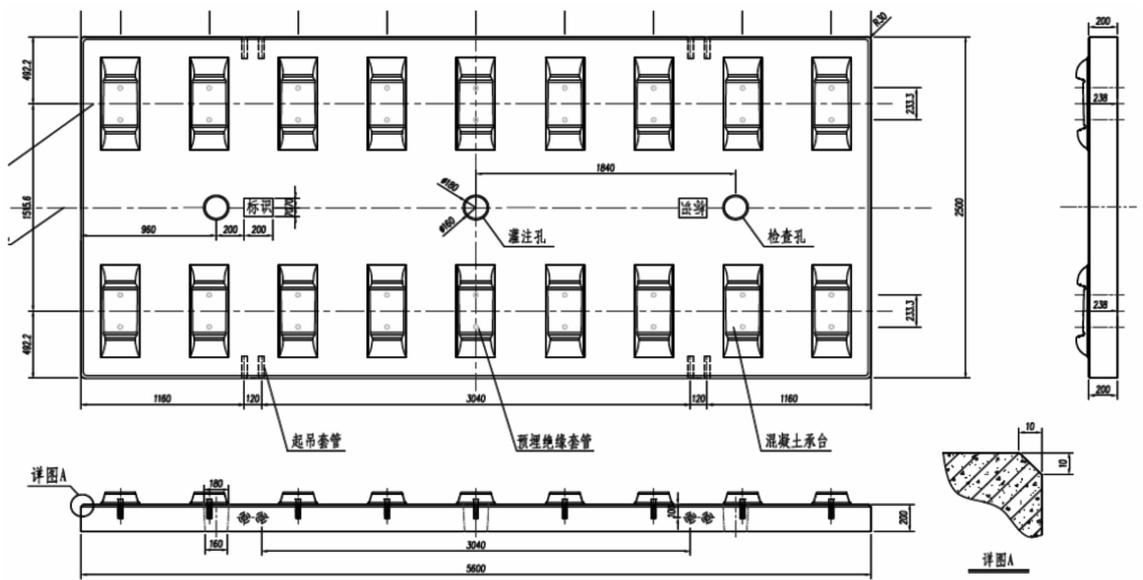


图1 高速铁路先张 CRTS III 标准轨道板图 (P5600)

碎石:采用坚硬、干净的二级或多级单粒级碎石,按最小堆积密度配制而成,各级碎石必须分级储存、运输、计量,最大粒径 20 mm,含泥量按重量计 < 0.50%,氯化物含量 < 0.02%。5 ~ 20 mm 连续级配碎石。

不得使用具有碱 - 碳酸盐反应活性或砂浆棒膨胀率(快速法)大于 0.20% 的碱 - 硅酸盐反应活性的骨料。当碎石砂浆棒膨胀率 $\geq 0.10\%$ 且 < 0.20% 时,需采取抑制碱 - 骨料反应技术措施。

2.3 减水剂

采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减水率较高、坍落度损失较小、适量引气、能明显提高混凝土耐久性且质量稳定的产品,与水泥之间应有良好的相容性^[2]。样品所检项目减水率、含气量、泌水率比、压力泌水率比、抗压强度比、坍落度 1h 经时变化量、凝结时间差、甲醛含量、硫酸钠含量、 CL^- 含量、碱含量、收缩率比经检验符合技术要求;水泥净浆流动度、对钢筋锈蚀作用、pH 值、含固量、密度、相对耐久性符合要求。

2.4 掺和料

矿物掺和料采用复合型掺和料,进行 CL^- 含量、烧失量、 SO_3 含量、含水率、需水量比、游离 CaO 含量、MgO 含量、活性指数的检验。满足表 1 中所列的所有条件^[3]。

2.5 拌和用水

使用饮用水,检验水的 pH 值、不溶物含量、可溶物含量、氯化物含量、硫酸盐含量、硫化物含量、碱含量、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4]。

所有原材料经检验必须符合标准 TJ/GW118—

2013《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暂行技术条件》和 TB/T3275—2011《铁路混凝土》技术要求。

表1 掺和料需满足条件表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
1	CL^-	%	≤ 0.06
2	烧失量	%	≤ 4.0
3	SO_3	%	≤ 3.0
4	含水率	%	≤ 1.0
5	需水量比	%	≤ 105
6	CaO	%	≤ 1.0
7	MgO	%	≤ 14
8	活性指数	1 天	% ≥ 125
		28 天	% ≥ 100

注:需水量比和活性指数检验用水泥需用强度等级为 42.5 的硅酸盐水泥,1 天抗压强度为 11 ~ 15 MPa,28 天抗压强度为 45 ~ 55 MPa

3 C60 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要求

3.1 C60 混凝土配合比的详细技术要求

根据《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Q/CR567—2017)、《铁路混凝土强度评定标准》(TB10425—1994)、《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TB10005—2010)、《铁路混凝土》(TB/T 3275—2011)的要求,该 C60 混凝土配合比的详细技术要求如下:

1. 混凝土初始坍落度应控制在 100 ± 20 mm,混凝土坍落度的保持时间根据拌和站供应的距离与道路运输情况,混凝土拌和物的 1 h 坍落度损失不大于 20 mm,同时保证能够满足施工要求^[5]。

2. 混凝土拌合物初始含气量 2.0% ~ 4.0%,混凝土拌合物的 1 h 含气量 2.0% ~ 4.0%。

3. 质量要求

(1) 设计强度等级 C60 级,16 h 左右放张强度

≥45 MPa,弹性模量 ≥3.65 × 10⁴ MPa,16 h 左右放张弹性模量 ≥3.35 × 10⁴ MPa。

(2)混凝土抗冻性试件在冻融循环 300 次后,重量损失不应超过 5%,相对动弹性模量不应低于 60%。

(3)混凝土抗渗试件的抗渗等级应大于 P20。

(4)混凝土 CL⁻ 扩散系数(L₁)不应大于 5 × 10⁻¹² m²/s。

(5)混凝土电通量应小于 1000C(毫安/米)。

(6)混凝土 56d 收缩率不应大于 400 × 10⁻⁶。

(7)混凝土碱含量不应大于 3.0 kg/m³,CL⁻ 含量不应大于胶凝材料量的 0.06%,SO₃ 含量不应大于胶凝材料总量的 4.0%。

3.2 C60 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步骤

1. 根据 JGJ55—2011 计算配制强度:

$$f_{cu,0} \geq 1.15f_{cu,k}$$

$$f_{cu,0} \geq 1.15 \times 60$$

即: $f_{cu,0} \geq 69.0$

2. 计算基准水胶比,根据 JGJ55—2011 规范查表 $a_a = 0.53, a_b = 0.20$,由于本配合比中不使用粉煤灰以及粒化高炉矿渣粉而是选用复合掺合料,考虑到复合掺合料对胶凝材料 28d 胶砂抗压强度的影响,因此选取影响系数 $r_s = 1.0$,对基准水胶比进行计算如下^[6]:

$$W/B = a_a \times f_b / (f_{cu,0} + a_a \times a_b \times f_b) =$$

$$0.53 \times 1.0 \times 42.5 \times 1.16 /$$

$$(69.0 + 0.53 \times 0.20 \times 1.0 \times 42.5 \times 1.16) = 0.35$$

根据标准要求以及以往生产经验,为更好地确保混凝土强度以及能够满足混凝土耐久性指标要求选定水胶比 $W/B = 0.27$ 。

3. 通过试验确定混凝土单方用水量(参加外加剂时): $m_{w0} = 130 \text{ kg/m}^3$ 。

4. 计算总胶凝材料用量 $m_{b0} = m_{u0} / (W/B) = 130 /$

表 2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理论材料用量表

材料名称	水泥	掺合料	砂	碎石	碎石	聚羧酸减水剂	水
规格	P·O42.5	TL-C	II 区中砂	5-10 mm	10-20 mm	HL-HPC2 标准型	地下水
用量(kg/m ³)	432	48	661	352	822	4.8	130

4 C60 混凝土配合比验证和确定

4.1 C60 混凝土配合比验证

1. 采用表 2 中所提供的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理论配合比数据进行试拌,对混凝土拌

表 3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配合比拌和物性能

水胶比	表观密度	初始坍落度	初始含气量	停放 60min	停放 60min	初凝时间	终凝时间	泌水率	压力泌水率
	(kg/m ³)	(mm)	(%)	坍落度(mm)	含气量(%)	(min)	(min)	(%)	(%)
0.27	2450	120	2.6	110	2.5	165	290	0	0

0.27 = 481 kg/m³,取值胶凝材料总量为 480 kg/m³。

5. 计算胶凝材料中水泥和复合掺和料的用量,根据复合掺和料厂家提供的合理掺量为 10%,计算复合掺和料用量 $m_{f0} = m_{b0} \times 10\% = 480 \times 10\% = 48 \text{ kg/m}^3$,进一步计算水泥用量 $m_{c0} = m_{b0} - m_{f0} = 480 - 48 = 432 \text{ kg/m}^3$ 。

6. 计算外加剂用量,根据外加剂厂家提供的合理掺量为胶凝材料总量的 1.0%,计算外加的用量为

$$m_{a0} = m_{b0} \times 1.0\% = 480 \times 1.0\% = 4.8 \text{ kg/m}^3$$

7. 确定砂率

根据本板场粗、细骨料对应的相应技术指标、混凝土拌和物性能和施工要求,结合本板场之前的生产经验以及历史资料确定砂率为 $\beta_s = m_{s0} / (m_{g0} + m_{s0}) = 36\%$ 。

8. 采用体积法粗、细骨料的用量:

$$\frac{m_{c0}}{\rho_c} + \frac{m_{f0}}{\rho_f} + \frac{m_{g0}}{\rho_g} + \frac{m_{s0}}{\rho_s} + \frac{m_{a0}}{\rho_w} + 0.01\alpha = 1$$

通过试验得出各种材料的密度为:

水泥密度 $\rho_c = 3040 \text{ kg/m}^3$,

掺和料密度 $\rho_f = 2300 \text{ kg/m}^3$,

砂子密度 $\rho_g = 2660 \text{ kg/m}^3$, (紧密密度),

碎石密度 $\rho_s = 2580 \text{ kg/m}^3$, (紧密密度),

水和外加剂密度 $\rho_w = 1000 \text{ kg/m}^3$ 。

因本配合比未使用引气剂或引气型外加剂,因此 α 取 1,结合砂率 36% 计算得出: $m_{s0} = 661 \text{ kg/m}^3, m_{g0} = 1174 \text{ kg/m}^3$ 。因本板场粗骨料选用的是 5~10 mm 和 10~20 mm 两级连续级配^[7],根据试验结果级配比例为 5~10 mm 碎石:10~20 mm 碎石 = 3:7,因此,本配比细骨料用量为 661 kg/m³,粗骨料总用量 1174 kg/m³(其中 5~10 mm 碎石为 352 kg/m³,10~20 mm 碎石为 822 kg/m³)。

最终初步确定理论材料用量表如表 2。

和物性能进行检测,并留置试件对混凝土力学性能及混凝土抗冻、抗渗、电通量、CL⁻ 扩散系数、56 d 收缩率等性能进行跟踪检测^[8]。

2. 试拌混凝土的拌和物性能详见表 3。

3. 混凝土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详见表 4。

表 4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配合比力学性能

水胶比	抗压强度 (MPa)				弹性模量 (MPa)	
	16 h	3 d	7 d	28 d	16 h	28 d
0.27	50.8	62.1	69.2	74.5	4.04×10^4	4.56×10^4

4. 对混凝土抗冻等级、抗渗性能、电通量、 CL^- 扩散系数、56 d 收缩率等耐久性能进行委外检测, 试验结果详见表 5。

表 5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配合比耐久性性能

水胶比	抗冻等级	抗渗性能	电通量	CL^- 扩散系数	56d 收缩率
0.27	F300 合格	>P20	452C	$2.6 \times 10^{-12} m^2/s$	195×10^{-6}

5. 混凝土配合比验证结果分析。

(1) 该配合比的胶凝材料用量满足规范标准的最低胶凝材料用量的要求。

(2) 该配合比的混凝土拌和物性能试验结果满足规范标准要求。

(3) 该配合比的混凝土力学性能满足规范标准要求。

表 6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用 C60 混凝土理论配合比

材料名称	水泥	掺和料	砂	碎石	碎石	聚羧酸减水剂	水
规格	P·O42.5	TL-C	Ⅱ区中砂	5-10 mm	10-20 mm	HL-HPC2 标准型	地下水
用量 (kg/m^3)	432	48	661	352	822	4.8	130
配合比	1	0.111	1.530	0.815	1.903	0.011	0.301

水胶比:0.27。

5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混凝土工艺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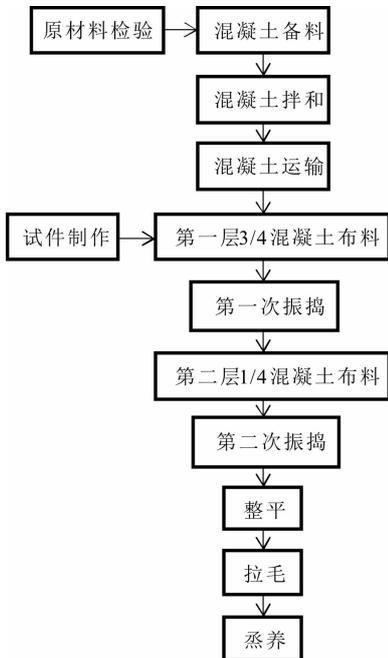


图 2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混凝土工艺流程图

6 混凝土制备

6.1 混凝土施工前检查

检查结构钢筋、预应力钢筋及预埋套管的位置和间距,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检测钢筋骨架的绝缘性能,电阻值须 $>2 M\Omega$ 。确认接地桥的位置和焊接质

(4) 该配合比的混凝土抗冻等级、抗渗性能、电通量、 CL^- 扩散系数、56 d 收缩率等耐久性能满足规范标准要求。

(5) 根据原材料委外检测数据计算该配合比碱含量为 $2.4 kg/m^3$, CL^- 含量为 0.04%, SO_3 含量为 2.3%, 均满足规范标准要求。

以上采用的规范标准为:《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Q/CR567—2017)、《铁路混凝土》(TB/T 3275—2011) 标准要求。

4.2 C60 混凝土配合比确定

根据上述验证试验结论以及混凝土耐久性检测报告,该配合比胶凝材料用量、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耐久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各个方面均满足标准以及设计图纸要求^[9], 可以用于先张 CRTS III 型轨道板现场 C60 混凝土施工, 详细理论配合比数据如表 6。

量满足设计要求,接地端子与模具连接螺栓是否拧紧。道钉孔预埋件是否有漏装、松动、歪斜、破损、上浮等。起吊套管是否安装牢固,张拉杆橡胶锚穴垫是否有脱落、破损、离缝^[10]。灌浆孔内模固定螺栓是否拧紧。钢筋保护层垫块的位置、数量及绑扎是否牢固,是否绑扎安装轨道板电子标签,端侧模安装是否牢固。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轨道板浇筑。

6.2 轨道板场设备配置

混凝土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拌合,搅拌机采用 HZS120 螺旋强制式搅拌机,配置 100 吨水泥罐 6 个,4 个掺和料罐,4 个 10 吨塑料减水剂罐;拌和站建有 3 个全封闭式合格砂石料仓和 3 个待检砂石料仓,中间用砌筑砖墙分隔开,合格仓和储水池设计暖气管道,满足冬期施工需要^[11]。拌和主机全封闭,粉料罐有除尘装置。

6.3 混凝土拌合要求

1. 混凝土配合比应通过试验确定,胶凝材料用量不得超过 $500 kg/m^3$, 水胶比不得 ≤ 0.35 , 含气量在 2.0% ~ 4.0% 之间。混凝土拌和前对所选用水泥、碎石、砂子、掺和料、外加剂等原材料制作电通量、抗冻性试块各 1 组,氯盐环境下 CL^- 扩散系数试件 1 组,进行耐久性试验,由不同原材料带入混凝土内的碱含量、 CL^- 含量和 SO_3 含量符合要求。

2. 各种原材料的最大允许误差:胶凝材料(水泥矿物掺和料等) $\pm 1\%$,外加剂 $\pm 1\%$,粗砂子 $\pm 2\%$,拌和用水 $\pm 1\%$ 。投料顺序:先投入骨料、水泥和矿物掺和料,搅拌均匀后,加水和液体外加剂(外加剂与矿物掺和料同时加入),直至搅拌均匀为止^[12]。拌和时间不小于 120 s,一般不大于 180 s。

3. 拌和物浇筑时,模具温度须在 5 ~ 35℃。当温度过低或过高时,应对模具采取升温或降温措施。拌和物入模温度须在 5 ~ 30℃;当日平均气温低于 5℃或最低气温低于 -3℃时,原材料和拌和物采取保温措施。夏季温度太高时,最高温度高于 40℃时,应采用降温措施,如采用低温水拌和,砂、石料、水泥、掺和料均采用遮阳降温。

6.4 混凝土的运输

混凝土通过中转料斗,由桥式起重机运输至布料机上,倒入布料机内。中转料斗底部有液压控制的出料口,放置在平板轨道车上面接料^[13],拌和机卸料口到料斗口 60 cm。拌和物运输过程中不能发生泌水、离析、外漏,混凝土必须快速使用,防止坍落度损失。

7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预制混凝土作业

7.1 轨道板混凝土浇筑

采用布料机均匀布料,此布料方法可将混凝土定量投入模板,保证了混凝土浇筑的均匀性和底板面平整度及轨道板厚度符合要求。布料机结构双梁结构,布料机在张拉台座两侧的轨道上纵向行走^[14],上面有自动控制的布料料斗,可以在布料机双梁上横向移动,这样布料料斗可以在张拉台座上平面任意方向行走(轨道万向车),布料机料斗出口通过液压控制混凝土出料量,料斗宽度与轨道板宽度相等为 2.5 m。轨道板混凝土浇筑时,拌和物入模温度在 5 ~ 30℃,模具温度在 5 ~ 35℃。分两次布料,从端模开始向另一端模逐步进行,第一次布料轨道板厚度的 75%,第二次布满 100%,混凝土需要高出模具顶面 0 ~ 3 mm,布料必须均匀,严禁混凝土盖过灌浆孔内模顶面,若超出时应及时清理出去。布料时先将模具四边布满。布料要尽量保护门型钢筋。每块轨道板混凝土浇筑应在 15 min 完成,遇到特殊情况 30 min 内完成,夏季最长不能大于 25 min,以保证浇筑在拌和物坍落度降至 60 mm 前完成。混凝土坍落度小于 60 mm 时,不得入模。

7.2 轨道板浇筑振捣

采用模具底面附着式振动器方式,每块轨道板底模下面安装有 8 个振动器,通过变频柜和控制柜集中控制,可无线遥控操作。振动器的频率和振幅

都可以调节,试验振动频率、振幅和振动时间等工艺参数,根据实际情况回归分析确定。第一次布料 75% 后振捣 90 ~ 150 s,当表面出现浮浆停止振捣;第二次布料 100% 后,再振捣 60 ~ 90 s,振捣至混凝土面出现浮浆,并没有气泡时。严禁欠振或过振,避免出现蜂窝或表面水波纹。浇筑过程中监视振动器的运转,出现故障应立即抢修、更换。同时还须监视模具联结螺栓是否松动、变形或漏浆,接地端子、起吊套管、振动器固定螺栓等螺栓的紧固性^[15],随时处理螺栓松动、漏浆等突发事件,及时采取措施处理。

7.3 混凝土收面、拉毛、蒸养

拉毛可以采用人工拉毛,也采用了自行式拉毛机拉毛,在混凝土平整后,间隔 20 ~ 30 min(根据混凝土的情况确定)进行混凝土表面扫浆拉毛作业,拉毛深度为 2 ~ 4 mm,间距 3 cm 左右,混凝土表面不得有浮浆,拉毛后要保护混凝土表面。混凝土拉毛完成后,在每块轨道板混凝土表面洒水、覆盖土工布和塑料布,防止混凝土水分散失过快产生表面龟裂,然后在整个台座上覆盖篷布养护轨道板。车间气温较低时需要在台座内通蒸汽养护^[16]。

8 结束语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混凝土,强度等级很高,质量要求严格,轨道板预制生产精度要求很高,生产过程自动化比程度较高,生产效率要求高,配合比的设计选定、拌和物制备和浇筑工艺至关重要,是能否成功生产制造轨道板预制生产的重要因素和环节。本文结合在轨道板混凝土配合比选定的实际试验和研究基础上,总结了轨道板混凝土原材料选择,配合比设计计算,配合比试验,配合比选定,理论配合比,以及轨道板混凝土浇筑的工艺。对配合比进一步优化,通过试验研究得出了如下结果:

(1)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 C60 混凝土,各种原材料的选用,规格要求,质量要求等。

(2)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 C60 混凝土理论配合比,并通过试验检测确定混凝土质量合格。

(3)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 C60 混凝土制备过程及质量要求。

(4)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轨道板混凝土浇筑工艺及混凝土浇筑和养护过程环节的质量要求。

参考文献:

[1] 铁科院.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设计图[N]. 北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2013: 12.

[2] 中国铁路总公司. 高速铁路 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先

- 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暂行技术条[S].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 [3]TZ 216—2007 客运专线无砟轨道铁路工程施工技术指南[S].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7.
- [4]刘秀元.先张 CRTS III 型轨道板张拉技术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6(9):103-106.
- [5]张维鹏,胡毅.CRTS III 型预制无砟轨道板水养技术改进及应用[J].铁道建筑技术,2015(3):102-105.
- [6]刘晋艳,武敏.混凝土防腐蚀防泛碱影响因素的正交试验研究[J].新型建筑材料,2017,44(6):12-15,65.
- [7]冷长明,郭绍影.一种预制 L 形支挡结构在既有铁路路基整治工程中的应用[J].铁道标准设计,2014,58(1):41-44.
- [8]卢建中.博格式轨道板预制关键技术探讨[J].铁道建筑技术,2007(3):16-19.
- [9]孙世豪.高速铁路先张法 CRTS III 轨道板场规划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5, s1: 11-14.
- [10]刘晋艳,田钰靖,巩天真,等.普通混凝土和高性能混凝土泛碱试验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8(2):243-248.
- [11]何华武.无砟轨道技术[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5:69-73.
- [12]刘秀元.先张 CRTS III 型轨道板蒸养技术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6(9):88-90.
- [13]王新民,李浩宇.CRTS III 型板式无砟轨道自密实混凝土灌注模板技术创新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6(9):96-99.
- [14]宋荣芳,刘秀元.津秦客运专线 CRTS II 无砟轨道先导段施工技术[J].铁道标准设计,2013(7):37-41.
- [15]吴建松.CRTS II 型轨道板成品板打磨技术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12(3):9-12.
- [16]刘秀元,刘晋艳,宋荣芳.活性粉末混凝土(RPC)配合比设计试验研究[J].铁道建筑技术,2022(10):78-8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C60 Concrete Process of CRTSIII Track Slab

LIU Xiuyuan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Pre-tensioned prestressed CRTS III unballasted track slab is a new type of ballastless track on high speed railway with our ow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 is also the most advanced high-speed railway ballastless track at present. Track plate made of C60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can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and it needs factory prod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ck plate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track plate production proces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preparation and pouring process of C60 concrete, mainly including concrete raw materials, concrete mix ratio design calculation, concrete ratio determination, concrete mixing, concrete pouring, concrete curing.

Key words: pre-tensioned CRTS III slab; C60 concrete; concrete mix ratio; mineral admixture; concrete pouring; concrete rough making technology